工农解放报

第一期

工农解放社-原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 2026.5.1发布

创刊词

吹响工农解放的集结号

革命分子普遍地远离工人工作，是我国革命运动不发展的主要原因。工人是无产阶级中最有 组织性和革命彻底性的群体。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特色政府的压迫下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 ， 但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革命者的组织，他们的自发抗争是纯经济的、不持续的。阻 碍着革命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从过去的佳士的脱离工人的冒进，到当 下东风的“小资政治报”、大群的“黑社会组织”等。机会主义者贪恋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不向工人学习、不为工人服务，只是想煽动工人服务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秉着“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信条，工农解放报将扫清各类机会主义、吹响工农解放的集 结号。我们号召一切先进的革命者集结起来，共同完成三项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 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最优秀的 革命者们必须到工人中去，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组织起一般工人、经受 各类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考验。最终我们将依托实践产生的切合我国国情的科学革命方法，建 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革命斗争机器。

在这工人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我们也应重视农民这一重要的同盟军。我国产业工人和底层的 服务业员工中，农民工是绝对的主体。且我国务农人口大多数是小农，他们的承包地狭小， 难以机械化，生产力低，而粮价随着农业企业的机械化和市场垄断而下降。因而小农的生活 越发贫苦，往往因为没条件外出打工才选择务农，他们只有支持工人领导的农业集体化改造 ， 才能从落后的生产劳动和资本压迫中解放出来。

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也正转向革命。改革开放后的很多小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积累了一 定资金，依靠这些资金成为小工商业主、小投资者，或投资教育成为脑力无产者。如今小工 商业和小投资在垄断竞争和经济危机下即将破产，脑力无产者必须靠内卷维持现状、难保子 女不落入体力劳动。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消灭小资本、降低过剩的脑力无产者的待遇，最后中 间阶层只会剩下值得帝国主义供养的工人贵族（如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学生们所说的 “毕业即失业”，也即是说绝大多数人毕业后只能成为无产阶级，而不能成为工人贵族而保 有学校中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我们要改造左转的中间阶层，让他们认识到中间阶层必然 灭亡、他们必须现在就融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否则，他们就要站到机会主义一边，《共产党 宣言》的讥讽对东风、大群再合适不过：“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 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 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首先有着资 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占有生产资料并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生。其垄断性基于对命脉产 业的控制。其官僚性是走资派夺取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果。如列宁所说：

“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帝国主义是对民主的否定”。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和阶级矛盾 发展到极点的帝国主义。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使资产阶级民主不再必要、且对榨取剩余价值 有害了，因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只能采用法西斯专制的体制，这使他们和其他所有渴望民主 的阶级都尖锐对立。中小资产阶级也不堪法西斯专制，但他们想逆转垄断、建立自由民主制 ， 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无产阶级则要粉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有，以公有制 集体地成为垄断产业的主人，建立基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民主制。中小资产阶级违 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斗争注定是徒劳的，一部分认清现实的中小资产阶级，为缓解来自统 治阶级的压迫，也不得不支持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集结起来组成联盟，到工人中去创造无产阶级民主的新世界、发展这个新世界、并用这个新世界取代旧世界！联盟的先锋已经到工人中去了！

革命者要像列宁所说，“以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要在广泛 和工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工人的求知欲、用马列毛主义解决他们的困惑、让 他们认识资本家和特色政府到底是怎么压迫他们的，然后用温情的同志关系组织工人，并在 日常斗争中切切实实的帮助到他们。大群不把工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而想用黑社会的冰冷 纪律领导工人，这是机会主义者妄想工人服务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真正的革命者必须贯彻 毛主席的路线：“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 的需要出发。”革命者必须从工人的需要出发，利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教育工人、把每位工 人作为亲人耐心引导、让工人认识到马列毛主义是契合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从而发展出一批 自愿地拥护革命的工人同志。由于当前我国革命尚在起步，工厂中的主要工作应是发展工人 同志、建立工厂组织。工厂组织的建立和维护，一方面需要厂内发展出的工人同志来参与， 另一方面也急需更多的革命者加入到融工工作中。工厂组织必须成为工人热爱的新世界、让 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感觉在这个世界中如获新生，这样所有同志都会有无尽的热情来发展新世 界、推动新世界取代旧世界！

革命者在工厂内的斗争应服务于工厂组织的发展。资产阶级总是对工人步步进逼、用各种手 段蚕食工人的权益，我们要将工人组织起来，采取合理的斗争形式，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 抵御厂主的进攻，以此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教育和锻炼知识分子与工人同志，又不让统 治者察觉有革命者在其中发挥作用。革命者要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对工厂的具体情况做 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调动群众共同筹备斗争。联盟的先行者已在融工中总结出了斗 争与组织的科学范式：调研厂内矛盾、构建工人组织 → 筹备斗争、争取胜利 → 提升革命意 志、强化组织。这在未来可能被推广到跨工厂的组织中：调研多个工厂共有的与厂主的矛盾 、建立跨工厂的组织 → 统筹跨工厂的斗争 → 深化革命鼓动和组织。革命组织必须以融工为 工作的中心，最优秀的革命者必须投入到建立工厂组织的实践中，并总结经验，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上升，产生出适应我国国情的经受实践检验的科学组织和斗争方法、 培养出有复杂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锻造出一个个隐蔽而又能承担起艰巨 革命任务的工厂根据地！

革命者在融工中不断深化革命实践与理论，必将发展出我国国情下的可工业化推广的斗争和 组织方法。这正如俄国革命者在“手工业”的融工中发展出了切合俄国的革命科学、培养了

大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建立了大量科学组织的地方小组，这些通过彼得堡大罢工的胜利经 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成为可被各地工人复制的模式。列宁这才能依靠这一模式统筹全国的工 厂组织、建立“大工业”的全国政治报。“大工业”的灵魂是融工实践孕育出的科学，以及 掌握科学的革命家与革命组织。 而东风却说工业化就是流水线化地生产鼓动材料、大群说 工业化靠黑社会般的纪律。这些机会主义者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融入工人，就无法发 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所以只知体量不知科学、崇拜力量而不求真理。革命科学产生于无 产阶级在本国国情下的革命实践、可以被千千万万的工人效仿，所以工人一旦掌握正确的革 命科学，就能使斗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 —— 这就是“大工业”。在未来大罢工时机成熟时 、当革命可以由守势转为攻势时，秘密领导核心将统筹有深厚融工基础的各地工厂组织，率先 发起罢工、鼓动各地区的所有其他工厂加入罢工、教授他们经过实践锤炼的斗争策略，将特 色的军警淹没于工人的汪洋大海中！

工农解放社号召一切革命者集结起来，投入到工厂内的实践中去！所有致力于工人工作的同 志、所有愿意加入联盟的组织，都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帮助同志们做好融工的主观和客观准 备，线上工作将服务于融工，做好融工准备的同志们将参加到我们的融工队中。让我们共同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

五一宣言

工人同志们，现在已经是第一百三十五个国际五一劳动节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每到 这个战斗的日子，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都会组织起来，聚集在街头巷尾，作 为一个独立且团结的国际阶级，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力量。工人们在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既 是在回顾国际工人运动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是在展望无比光明的明天。

但是在中国，自从 1976 年，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被反动分子颠覆以来，工人们就再没有组织 中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五一劳动节。在学校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者们，让无产者从 小就误以为五一劳动节是一个劳动者需要为老板们献出更多廉价劳动甚至是无常劳动的日子 。 资产阶级盗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劳动最光荣”的口号，假借雷锋、王进喜等革命工人的名 号，企图为工资奴隶制正名，但却从来不会告诉工人，那个时候是工人领导企业，是工人领 导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个时候工人们忘我劳动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是为 了保卫千万贫贱同洒热血建成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不是为了帮老板赚钱再去炒几十套房子！ 有些自以为老道聪明的人告诉我们目前的一切现状背后都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既然改变不了 现状，那么就应该去改变自己以适应现状。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上述观点都是错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越来越社会 化的生产和越来越严重的私有化。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这意味着多数人的贫困和 少数人占有一切，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不稳定，这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 越发严重。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正如印共毛所说，“世界三大矛盾都在不断激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 民族和国家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在东地中海沿岸，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色列锡安主义暴徒 正在以工业化的方式，对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进行系统的种族灭绝。在越南、斯里兰卡、菲律 宾、泰国、印度和印尼等地都爆发了当地劳工反对中修帝资本入侵的群众斗争。 在一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也在升级。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在疫情期间采用反人类的方式封锁上海和许多城市，使无数工人面临难以获取基本生存 资料的暴行我们还历历在目；统治阶级强制所有劳动者进行一天数次的无意义“检测”（许 多检测试剂几乎是立刻就被扔进垃圾桶），限制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等等经历我们绝不会忘记。数万河北工人，被迫千里跋涉，无以为家的痛苦，我们仍感同身受。同时，从南京开始 ， 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最终促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选择立刻解封的斗争令我们深感振奋。河南、 重庆等地的工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自发组织的英勇斗争，不但体现了工人们勇气， 更是预兆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无限辉煌的未来。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都爆发了过去已经很久都没见到过的工人斗争行动，德国交通工人在社民党工会和基督教工 会的阻扰下，在几乎没有任何革命工人组织或政党领导的情况下，都还是坚持了数月的斗争 ， 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显示出哪怕是在最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都蕴含着无可估 量的潜力。美国汽车工人在去年进行的全国大罢工也显示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走出 长达几十年的沉睡，同时也显示出逐渐衰落的美帝国主义已不能再从容地在本土维系

全面资 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再次激进化美国工人阶级的身影，正在与 141 年前首创国际劳动节的 劳工战士们相重合。

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向着战争发展。在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工人，作为各自 国家资产阶级的棋子已经自相残杀了两年有余，而无论是在基普还是莫斯科，资产阶级却都 仍在歌舞升平之中，甚至军火商们还借此大发横财！与此同时，全世界最大的两大帝国主义 国家—美帝国主义和中修帝国主义也在摩拳擦掌准备着下一场世界大战。在过去的几年中， 美帝国主义已经逐渐远离了上一个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重新投资本土工业，尤其是 军事工业，并把大量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国统治阶级一方面企图通过所谓的经济 内循环，来准备战时经济统制，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军备，和核武库，准备拿亿万无产者的生 命做赌注，争取和美帝国主把太平洋一分为二。

当然，还有一对潜藏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现在也越来越从历史概念重新 变成现实。在印度，印共毛顶住了印度婆罗门法西斯越来越疯狂的攻击，在好几次游击战和 遭遇战中取得了胜利，得到了无数群众的全力支持，正是来自于群众的真切支持，使印度同 志们获得了无限的激情与勇气，能够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在许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 义国家中，马列毛主义者也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组织工作，现在他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这 件事的全部意义可能要到许多年后才能显现，但现在，这至少说明了一点：革命社会主义的 幽灵正在重回人间！

既然现状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工人绝不会永远放任阶级敌人扭 曲伟大的国际五一劳动节，绝不会永远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中国工人再次作为一个自为 的阶级团结起来，去战斗、去争取，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以及其他 一切本就属于我们的权益。要想把这样的未来变成现实，靠的不是等待，我们需要的是马列 毛主义者到工人中去组织，去宣传，去研究。只有这样，属于革命阶级的思想，才能真正为 革命阶级所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扫清目前笼罩在中国工人运动上的一切阴霾，才能帮 s助中国工人，重新组织成一个战斗的阶级以及它的先锋队。只有马列毛主义到群众中去，特 别是到工人中去，马列毛主义者才能接触到自己的阶级基础，只有这样马列毛主义，才不至 于变成某些庸人手中的空洞话术。

为了在中国重铸战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向全中国的进步工人和马列毛主义者呼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

到工人中去万岁！

国际五一劳动节万岁！

第一部分：阐述我们的路线及路线斗争

斗争无方浇灭融工热情，星火灭于小资立场——用到工人中去 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融工故事

> 本文用 到工人中去 的《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一文总结的科学的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的《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 年左翼 》与《融工故事（二）：少年壮志今何在，星火还需柴助燃》中的融工失败案例， 指出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缺乏公开斗争的意志和策略，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新十月原 本的分析与革命南辕北辙，若不坚决批判，必然使更多星火灭于小资产阶级的“厂外灌输” 和“政治报”！

到工人中去 在《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中提出，科学的融工分为四步：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而新十月两篇融工故事中，A 同志与 B 同志的融工，“第一步是 交朋友”，“第二步是个人灌输”。可以看到，AB 同志在交朋友前缺乏对厂内矛盾的科学 调研，并且个人灌输并不是基于厂内矛盾、以斗争为目的开展的，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 调研厂内矛盾，一是从工人切身感受出发，分析工友普遍关心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二是 分析厂内各阶级，哪些是工人的朋友，哪些是工人的敌人。缺乏调研的 A 同志，在第一个工 厂的文娱组织遇到问题：“很难跟工作对象发生联系。因为参加这些娱乐活动的主要是办公 室文员、班组长和年轻工友，普工少、班组长多”。A 同志认为其他厂内班组长等，都是普工的敌人，这是没有进行阶级分析的结果！ 到工人中去 在他们厂的分析中就提到“班组长的工资比普工高不了多少，班组长和普工在大多数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班组长在本 条产线的普工中威望较高，如果能争取和团结他们，是可能在工人斗争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 的”。B 在第三个厂的斗

争有进展，也是“班组长的反抗意识强，对厂里满腹抱怨，不怕与 厂里对抗”。而 A 同志没有分析班组长是否会在斗争中支持工人，因为”普工少、班组长 多”，就觉得接触不到工作对象了！失去了联系班组长的机会！所以， 到工人中去 指出 ， “调研分析的结果为下一步交朋友的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帮助我们将交朋友的工作 进一步深化，更好地进行工友的组织（圈子）建设。”

另外，对于交朋友的目的，AB 同志与 到工人中去 也是截然不同的。 AB 同志都是在筛选 其中对政治法律感兴趣的工友，为灌输做准备。而 到工人中去 重视建立在工厂各区域都
遍布的、有代表性的朋友圈，从而“掌握工厂的全方面信息”，以及“交流法律知识，分析 工厂的动向，为搬迁补偿的斗争做准备。”交朋友已经是在建立服务于斗争的组织！而 AB 同志的交友仅仅是在挑人组织学习。这种缺陷导致 A 同志所在的第二个工厂发生自发罢工时， “罢工的核心部门和 A 所属的不同，A 同志接触不到核心人员，认为也不好去罢工现场，只 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试想，如果他们在交友时注意的不是工人原本的素养，而是要 建立与厂内各区域广泛的联系，那么怎么会接触不到其他部门的人员呢！怎么会“认为也不 好去罢工现场，只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呢！

交朋友后，AB 同志直接开始劳动法学习，并空谈维护权益。这种空谈很快使工人积极性丧 失，而工人学习后问“我们该怎么做，能做些什么“，A 同志却答不上来。最后 A 同志吐槽 工人中“能够达到认可斗争和工会程度’也就 2-3 人，而且层次不怎么样’”；B 吐槽”这 个过程没有发现太好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对组织斗争完全无能的，却还吐槽工人不怎么样 ！ 真是小资的傲慢！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引述道：“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 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 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 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 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AB 同志不懂工人们需要的是组织，在科学的组织下任何 工人都能发光发热，而是从知识分子角度，以为工人自身素质最重要，所以把精力放在挑选 人，而非组织工作上！

A 同志在四个工厂中都是没有开展斗争的，一是受到厂外工作的拖累而无力组织厂内斗争， 二是缺乏调查研究，发现不了矛盾。无论多“良心”的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都是尖锐对立的 ， 怎么可能没有斗争！新十月的《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也说他们扎根厂内 “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还搞不起来经济斗争，他们是先在厂外做调研，进厂 就只埋头交朋友。这些只能说明新十月和其融工故事中的组织，根本不会在工厂现实中应用 唯物辩证法分析与利用厂内的主要矛盾！

B 同志在其第二个工厂调研则是自大的脱离工人的，也必然导致了小资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他主观地“确定投诉公积金的诉求后，号召工人签联名信，工人没有响应。自己就带头投诉 公积金”，最终只是导致自己处罚。工人“认为是送死”，他是小资，有退路，就真的自己 去送死！与 AB 同志及新十月相反，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则是在第一步调研中，就“从
工友的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出发”，“找到了工友普遍关心的两个重要问题”，判断该厂 “会围绕着补缴社保/公积金以及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着手开展交朋友和筹备斗争的工作”。与他们的预测相符，4 个月后工厂果然因为搬迁 问题向工人发动进攻！这充分体现了使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分析厂内主要矛盾的科学性与巨 大力量！这与纸上谈兵的小资空耗 4 年的无能斗争，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个工厂的斗争失败后，B 同志在第三个工厂转向了厂外，厂外组织联系到了其他厂的斗 争，进行尾巴主义的法律支持（在完全不了解厂内情况时，怎么可能领导组织厂内斗争）。 然后 B 同志又跑回自己工厂，去“通过写联名信等方式鼓动工人争取公积金的斗争”。B 同 志被厂外灌输路线拖累了！导致他没有进行本厂的调查研究与斗争组织！虽然恰巧得到班组 长支持，但他本来也已经打算离开工厂，就只是在厂内会议演讲鼓舞大家团结，最终被开除 。 这种小资的鼓动表演，竟被新十月说成“经济斗争取得了成绩”！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成绩：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调研，以及四个月
的以斗争为目的的交友、组织、法律学习，用怠工击退资方初步试探、然后反复拉锯斗争与 警察劳动局资方斗智斗勇、最终通过五天的集会斗争为 60 多名工友争得共 100 多万元的补 偿！这是科学的公开的非秘密的斗争！而新十月从 AB 同志无能的斗争中学到的却是工人的 维权只能是“非法的、不公开的”！新十月说 AB 同志所在组织“着手鼓动经济斗争之后就 迅速被政治警察破获和打压”，但举出的故事中，他们甚至连警察的面都没见到！提出政治 报”秘密“斗争路线，只是说明他们和 AB 同志一样，是对斗争无能或完全恐惧斗争的小资 产阶级！

最后 到工人中去 “将沉淀下来的五六个核心工友继续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灌输，告诉
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事业，最终“几名核心工友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愿意与我们一道前 往下一个工厂继续开展工作”。在准备斗争的过程，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人作经济斗争的 教育。经过斗争的实践，再水到渠成地灌输给他们长期的政治事业。知识分子和工人共同习 得了与资本家斗争的组织方式，共同成为了更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难道不比 AB 同志空洞的政治灌输强百倍吗？新十月将 到工人中去 批判为经济主义，只能说明他们不
但不理解经济斗争，更不理解政治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说，政 治斗争是要“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在我国，如对劳动法的真正 执行）。为此，要使得“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用公开斗争的实力逼迫 政府“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要使工人获得这种“不容忽 视的力量”，只能像 到工人中去 和俄国革命先驱一样，一开始先锻炼小范围的和资本家

与警察的斗争，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对抗统治阶级的工厂组织。只有 当组织壮大到不惧特色政府的军队时，工人才能逼迫政府真正执行劳动法，这将是我国政治 斗争的里程碑！

而想着靠厂外和政治报作政治灌输的新十月、前进报、东风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无力帮助工 人建立有斗争力量的组织，却鼓动工人去造反，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难道工人只要有了政 治意识，不需久经考验善于斗争的组织，就能对统治者发动进攻？往轻的说，这正是屈从于 工人的自发组织；往重的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让工人去做炮灰！我们已经 在《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指出了他们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实质。正是他 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对 到工人中去 取得的远超他们的成绩、
以及已经总结出来的科学的融工范式视而不见！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 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害怕厂内斗争的后果的 - 如故事中 B 同志所说 “担 心自己以后的生存和工资收入问题”！

拓展与总结

到工人中去 的融工，已经能开枝散叶了。 3 名同志，花五个月时间，培养出五六名有斗 争经验的工人骨干，跟他们去下一个厂。如果他们下次融工又把人数扩大一两倍，组织就越 滚越大。他们把唯物辩证法与工厂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灵活运用，他们已经总结出了在单 个工厂内融工的科学的范式：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 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当他们发展出多个工厂的工人组织时，自然就会产生 更高级的组织架构。自然也能通过调研发现多个工厂共同存在的与资方的矛盾，以此预测未 来多个工厂矛盾共同爆发的节点 → 提前为此建立跨工厂的圈子 → 筹备跨工厂的斗争 → 在 斗争后继续深化革命政治鼓动，这就自然把融工范式扩展到更高级的组织。东风在《俄国社 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中总结道：列宁 1895 年的彼得堡组织有 20-30 个工人小组。难道我们不能想象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靠他们的科学融工范式，可能建立
起和彼得堡组织一样的、统合 20-30 个工人小组的组织嘛！

可能东风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让他们连自己的文章都忘了。因为自己斗争的无能就害 怕公开斗争了，就要去搞秘密的政治报了，好像可以不用直面警察就能“秘密地”和他们斗 争！东风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对列宁基于彼得堡组织成立的“斗争协会”总结道：“由于群 众性的鼓动开展地广泛，在工人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传单的出现甚至被工人看作是罢工 的信号，以至于只要发出一两份传单，吓得惊慌失措的企业主还不等工人宣布罢工就连忙满 足工人要求。甚至沙皇的大臣们都被传单弄的惊慌失措”。当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就自然有 对抗国家暴力机器的力量！正如 22 年富士康工人击退军警一样。富士康工人因为没有先锋 队领导而在斗争后解散了，当 到工人中去 的组织发展到能够领导富士康那样规模的斗争时，他们的组织也就开始成为先锋队的雏形！正如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所说 ： “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 ， 决不搞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 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源泉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吗？”

要实现这个愿景，靠什么？靠培养能够和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工人革命家，靠建立能够和 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革命组织，这正是在 到工人中去 正在做、且已经开始学会做的。
他们做到这些，靠什么？靠的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工厂斗争的具体情境中去！资产阶级是 不可能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荒谬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的世界观中充斥 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对人类社会、对世界正 确的认识，才能以此进行最为科学的群众组织，靠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组织，打败官僚资产阶 级的腐朽的靠蛮力的组织！而 AB 同志的小资产阶级组织、以及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鼓 吹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报，只能是比资产阶级的组织更加不科学、脱离实际、斗争无能的组织 ， 即使做得再大、纪律再严密，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号召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放弃自己 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加入我们。如果越来越多革命者像 到工人中去 一样，去研
究、去组织工人，去实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抛弃小资产阶级利益去和工人融为一体，那我们 一定能产生任何资产阶级都无法抗衡的强大组织，我们在战略上是可以藐视敌人的！让笔者 用列宁的话结尾：“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 资本政权（还是腐朽的我国官僚资产阶级），都是支撑不住的！”

斗争无方浇灭融工热情，星火灭于小资立场——用到工人中去 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融工故事

> 本文用 到工人中去 的《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一文总结的科学的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的《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 年左翼 》与《融工故事（二）： 少年壮志今何在，星火还需柴助燃》中的融工失败案例， 指出缺乏科

> 学的调查研究、缺乏公开斗争的意志和策略，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新十月原 本的分析与革命南辕北辙，若不坚决批判，必然使更多星火灭于小资产阶级的“厂外灌输” 和“政治报”！

到工人中去 在《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中提出，科学的融工分为四步：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而新十月两篇融工故事中，A 同志与 B 同志的融工，“第一步是 交朋友”，“第二步是个人灌输”。可以看到，AB 同志在交朋友前缺乏对厂内矛盾的科学 调研，并且个人灌输并不是基于厂内矛盾、以斗争为目的开展的，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 调研厂内矛盾，一是从工人切身感受出发，分析工友普遍关心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二是 分析厂内各阶级，哪些是工人的朋友，哪些是工人的敌人。缺乏调研的 A 同志，在第一个工 厂的文娱组织遇到问题：“很难跟工作对象发生联系。因为参加这些娱乐活动的主要是办公 室文员、班组长和年轻工友，普工少、班组长多”。A 同志认为其他厂内班组长等，都是普工的敌人，这是没有进行阶级分析的结果！ 到工人中去 在他们厂的分析中就提到“班组长的工资比普工高不了多少，班组长和普工在大多数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班组长在本 条产线的普工中威望较高，如果能争取和团结他们，是可能在工人斗争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 的”。B 在第三个厂的斗争有进展，也是“班组长的反抗意识强，对厂里满腹抱怨，不怕与 厂里对抗”。而 A 同志没有分析班组长是否会在斗争中支持工人，因为”普工少、班组长 多”，就觉得接触不到工作对象了！失去了联系班组长的机会！所以， 到工人中去 指出 ， “调研分析的结果为下一步交朋友的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帮助我们将交朋友的工作 进一步深化，更好地进行工友的组织（圈子）建设。”

另外，对于交朋友的目的，AB 同志与 到工人中去 也是截然不同的。 AB 同志都是在筛选 其中对政治法律感兴趣的工友，为灌输做准备。而 到工人中去 重视建立在工厂各区域都遍布的、有代表性的朋友圈，从而“掌握工厂的全方面信息”，以及“交流法律知识，分析 工厂的动向，为搬迁补偿的斗争做准备。”交朋友已经是在建立服务于斗争的组织！而 AB 同志的交友仅仅是在挑人组织学习。这种缺陷导致 A 同志所在的第二个工厂发生自发罢工时， “罢工的核心部门和 A 所属的不同，A 同志接触不到核心人员，认为也不好去罢工现场，只 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试想，如果他们在交友时注意的不是工人原本的素养，而是要 建立与厂内各区域广泛的联系，那么怎么会接触不到其他部门的人员呢！怎么会“认为也不 好去罢工现场，只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呢！

交朋友后，AB 同志直接开始劳动法学习，并空谈维护权益。这种空谈很快使工人积极性丧 失，而工人学习后问“我们该怎么做，能做些什么“，A 同志却答不上来。最后 A 同志吐槽 工人中“能够达到认可斗争和工会程度’也就 2-3 人，而且层次不怎么样’”；B 吐槽”这 个过程没有发现太好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对组织斗争完全无能的，却还吐槽工人不怎么样 ！ 真是小资的傲慢！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引述道：“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 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 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 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 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AB 同志不懂工人们需要的是组织，在科学的组织下任何 工人都能发光发热，而是从知识分子角度，以为工人自身素质最重要，所以把精力放在挑选 人，而非组织工作上！

A 同志在四个工厂中都是没有开展斗争的，一是受到厂外工作的拖累而无力组织厂内斗争， 二是缺乏调查研究，发现不了矛盾。无论多“良心”的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都是尖锐对立的 ， 怎么可能没有斗争！新十月的《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也说他们扎根厂内 “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还搞不起来经济斗争，他们是先在厂外做调研，进厂 就只埋头交朋友。这些只能说明新十月和其融工故事中的组织，根本不会在工厂现实中应用 唯物辩证法分析与利用厂内的主要矛盾！

B 同志在其第二个工厂调研则是自大的脱离工人的，也必然导致了小资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他主观地“确定投诉公积金的诉求后，号召工人签联名信，工人没有响应。自己就带头投诉 公积金”，最终只是导致自己处罚。工人“认为是送死”，他是小资，有退路，就真的自己 去送死！与 AB 同志及新十月相反，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则是在第一步调研中，就“从工友的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出发”，“找到了工友普遍关心的两个重要问题”，判断该厂 “会围绕着补缴社保/公积金以及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着手开展交朋友和筹备斗争的工作”。与他们的预测相符，4 个月后工厂果然因为搬迁 问题向工人发动进攻！这充分体现了使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分析厂内主要矛盾的科学性与巨 大力量！这与纸上谈兵的小资空耗 4 年的无能斗争，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个工厂的斗争失败后，B 同志在第三个工厂转向了厂外，厂外组织联系到了其他厂的斗 争，进行尾巴主义的法律支持（在完全不了解厂内情况时，怎么可能领导组织厂内斗争）。 然后 B 同志又跑回自己工厂，去“通过写联名信等方式鼓动工人争取公积金的斗争”。B 同 志被厂外灌输路线拖累了！导致他没有进行本厂的调查研究与斗争组织！虽然恰巧得到班组 长支持，但他本来也已经打算离开工厂，就只是在厂内会议演讲鼓舞大家团结，最终被开除 。 这种小资的鼓动表演，竟被新十月说成“经济斗争取得了成绩”！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成绩：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调研，以及四个月的以斗争为目的的交友、组织、法律学习，用怠工击退资方初步试探、然后反复拉锯斗争与 警察劳动局资方斗智斗勇、最终通过五天的集会斗争为 60 多名工友争得共 100 多万元的补 偿！这是科学的公开的

非秘密的斗争！而新十月从 AB 同志无能的斗争中学到的却是工人的 维权只能是“非法的、不公开的”！新十月说 AB 同志所在组织“着手鼓动经济斗争之后就 迅速被政治警察破获和打压”，但举出的故事中，他们甚至连警察的面都没见到！提出政治 报”秘密“斗争路线，只是说明他们和 AB 同志一样，是对斗争无能或完全恐惧斗争的小资 产阶级！

最后 到工人中去 “将沉淀下来的五六个核心工友继续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灌输，告诉
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事业，最终“几名核心工友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愿意与我们一道前 往下一个工厂继续开展工作”。在准备斗争的过程，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人作经济斗争的 教育。经过斗争的实践，再水到渠成地灌输给他们长期的政治事业。知识分子和工人共同习 得了与资本家斗争的组织方式，共同成为了更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难道不比 AB 同志空洞的政治灌输强百倍吗？新十月将 到工人中去 批判为经济主义，只能说明他们不
但不理解经济斗争，更不理解政治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说，政 治斗争是要“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在我国，如对劳动法的真正 执行）。为此，要使得“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用公开斗争的实力逼迫 政府“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要使工人获得这种“不容忽 视的力量”，只能像 到工人中去 和俄国革命先驱一样，一开始先锻炼小范围的和资本家
与警察的斗争，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对抗统治阶级的工厂组织。只有 当组织壮大到不惧特色政府的军队时，工人才能逼迫政府真正执行劳动法，这将是我国政治 斗争的里程碑！

而想着靠厂外和政治报作政治灌输的新十月、前进报、东风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无力帮助工 人建立有斗争力量的组织，却鼓动工人去造反，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难道工人只要有了政 治意识，不需久经考验善于斗争的组织，就能对统治者发动进攻？往轻的说，这正是屈从于 工人的自发组织；往重的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让工人去做炮灰！我们已经 在《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指出了他们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实质。正是他 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对 到工人中去 取得的远超他们的成绩、
以及已经总结出来的科学的融工范式视而不见！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 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害怕厂内斗争的后果的 - 如故事中 B 同志所说 “担 心自己以后的生存和工资收入问题”！

拓展与总结

到工人中去 的融工，已经能开枝散叶了。 3 名同志，花五个月时间，培养出五六名有斗 争经验的工人骨干，跟他们去下一个厂 。如果他们下次融工又把人数扩大一两倍，组织就越 滚越大。他们把唯物辩证法与工厂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灵活运用，他们已经总结出了在单 个工厂内融工的科学的范式：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 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当他们发展出多个工厂的工人组织时，自然就会产生 更高级的组织架构。自然也能通过调研发现多个工厂共同存在的与资方的矛盾，以此预测未 来多个工厂矛盾共同爆发的节点 → 提前为此建立跨工厂的圈子 → 筹备跨工厂的斗争 → 在 斗争后继续深化革命政治鼓动，这就自然把融工范式扩展到更高级的组织。东风在《俄国社 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中总结道：列宁 1895 年的彼得堡组织有 20-30 个工人小组。难道我们不能想象 到工人中去 的同志，靠他们的科学融工范式，可能建立
起和彼得堡组织一样的、统合 20-30 个工人小组的组织嘛！

可能东风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让他们连自己的文章都忘了。因为自己斗争的无能就害 怕公开斗争了，就要去搞秘密的政治报了，好像可以不用直面警察就能“秘密地”和他们斗 争！东风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对列宁基于彼得堡组织成立的“斗争协会”总结道：“由于群 众性的鼓动开展地广泛，在工人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传单的出现甚至被工人看作是罢工 的信号，以至于只要发出一两份传单，吓得惊慌失措的企业主还不等工人宣布罢工就连忙满 足工人要求。甚至沙皇的大臣们都被传单弄的惊慌失措”。当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就自然有 对抗国家暴力机器的力量！正如 22 年富士康工人击退军警一样。富士康工人因为没有先锋 队领导而在斗争后解散了，当 到工人中去 的组织发展到能够领导富士康那样规模的斗争时，他们的组织也就开始成为先锋队的雏形！正如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所说 ： “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 ， 决不搞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 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源泉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吗？”

要实现这个愿景，靠什么？靠培养能够和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工人革命家，靠建立能够和 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革命组织，这正是在 到工人中去 正在做、且已经开始学会做的。
他们做到这些，靠什么？靠的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工厂斗争的具体情境中去！资产阶级是 不可能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荒谬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的世界观中充斥 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对人类社会、对世界正 确的认识，才能以此进行最为科学的群众组织，靠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组织，打败官僚资产阶 级的腐朽的靠蛮力的组织！而 AB 同志的小资产阶级组织、以及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鼓 吹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报 ，只能是比资产阶级的组织更加不科学、脱离实际、斗争无能的组织 ， 即使做得再大、纪律再严密，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号召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放弃自己 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加入我们。如果越来越多革命者像 到工人中去 一样，去研
究、去组织工人，去实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抛弃小资产阶级利益去和工人融为一体，那我们 一定能产生任何资产阶级都无法抗衡的强大组织，我们在战略上是可以藐视敌人的！让笔者 用列宁的话结尾：“在这

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 资本政权（还是腐朽的我国官僚资产阶级），都是支撑不住的！”

星火何以燎原？知识分子与工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兼驳机会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 编者按：机会主义者的政治报，是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手工业路线，其根源是形而上学的 发展观、是小资产阶级拒绝工人改造的单向鼓动灌输。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同志放弃机会主义 路线，和我们一起到工人中去，基于否定之否定的组织建设路线，发展 21 世纪我国革命科 学、建立科学的工厂组织、改造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并最终建成大工业的 革命家组织、成星火燎原之势！

我们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新十月的同志们高呼“星火还需柴助燃”，求诸工厂之外的“政治报”，仿佛遍地的工人都不能助燃他们的星火。这不是咄咄怪事？本文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观，分析星火燎原的原理，梳理统一战线的组织发展路线，兼驳斥机会主义政治报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望星火终成燎原之势。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指出，事物演变的规律在于:

> 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基于这一辩证发展观，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组织要发展为革命家组织，须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1. 厂外组织主导的“肯定”阶段，目的是培养出有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这一阶段目前已基本完成
2. 厂内组织主导的“否定”阶段，目的是培养出经受当代实践考验的革命家、发展出适应于当代革命的组织科学、建立广泛科学的工人组织。
3. 厂外革命家组织主导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目的是建立工业化的组织、在更大规模运用上一阶段探索出的科学革命方法。

三阶段螺旋上升，后一阶段基于前一阶段，而又否定前一阶段。只有经历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知识分子与工人才能成长为革命家，历史上的革命科学才能发展为当代的革命科学。

一. 各小组已完成厂外组织主导的“肯定”阶段

目前大多数小组以工厂外（校内或线上）组织中的理论学习写作为主，辅以很有限的与工人的接触和厂内的实践。在此过程中培养出了大量有革命热情并基本掌握了马列理论与历史实践的知识分子。但由于缺乏厂内的实践，他们掌握的是百年前的理论、尚未发展出指导当代实践的理论，所以往往在当下工厂实践中碰壁；由于缺乏来自工人的改造，他们往往也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固守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新十月的三篇融工失败案例充分证明了上述两点。所以，**目前在厂外抽象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尚未成长为革命家，目前也缺乏在特色政府情境下的、被实践证明的组织工人的科学方法。**

二. 当前任务是步入厂内组织主导的“否定”阶段

要解决上述“肯定”阶段的局限，知识分子必须到工人中去，将历史上的马列理论与当代工人现实结合，把马列理论发展到特色政府下的实践中去，在改造工人的同时，接受工人的改造。这是当代实践“否定”历史理论的局限，是工人生活“否定”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性，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否定”工人的自发性。当代的革命科学的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成长为革命家，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相互改造、螺旋上升的结果。这充分体现在教员所说：

>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到工人中去↗融工的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应用了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第一步运用所学理论做厂内调研，是对马列理论的“肯定”；第二步交朋友，是做工人的学生，接受工人对自己的“否定”，从而获得对厂内矛盾的科学认识；第三步知识分子与工人共同准备斗争，工人在厂内实践中有优势，知识分子在科学理论上有优势，两者数月内相互指正、水乳交融、螺旋上升，从而发展出科学的斗争方法而取得胜利，同时培养出更具革命素养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难怪最后知识分子革命意志更坚定、工人也接受政治灌输加入革命队伍。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难道能在厂外完成吗？所以本阶段组织的领导者必然是厂内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而厂外部门为他们提供后勤和写作辅助。

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的反面，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这充分体现在新十月的三篇融工失败案例中。他们的工作是高傲的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单向的灌输：他们是不代表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就想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学生就要做群众的先生。缺乏知识分子和工人相互改造的螺旋上升，那么知识分子泄气、工人不服，不是必然的吗？

在俄国，彼得堡斗争协会逼迫政府修改法律，标志着适应于俄国的革命科学被真正发展出来了；彼得堡斗争协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相互学习，螺旋上升，培养了巴布石金这样的工人革命家，也培养了列宁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的隔阂已经消除。如《列宁回忆录》所说：

> 当时的问题并不在于建立英雄的功勋，而在于怎样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怎样接近群众，学会表达群众的良好的愿望，使群众了解而且感到亲切，学会领导群众。正是在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锻炼成了一个工人群众的领袖。

如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也在厂内扎根、发展出革命工人、然后在其他工厂开枝散叶。在实践中，他们会不断总结出科学的融工范式，以此不断改造厂外的附属组织，使其摆脱纸上谈兵、更好地服务于工人。最终他们将经受住如同俄国彼得堡罢工的斗争的考验，**至此适应我国当代的革命科学才真正被发展出来。**
知识分子和工人长期相互改造，螺旋上升，最终将共同成长为相互没有区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至此我国首批革命家才真正产生！** 此即《怎么办》所说的：

> 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三. 以上一阶段产生的工人组织、革命家与革命科学为基础，步入厂外革命家组织主导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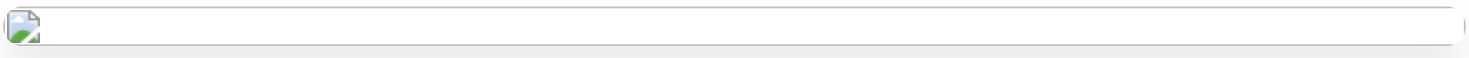
第二阶段中，知识分子和工人螺旋上升，他们组建大量的厂内组织、发展切合当代的科学革命方法、培养经受实践锤炼的革命家，这才为建立《怎么办》中所说的革命家组织创造了条件。知识分子从厂外起步，然后进入厂内与工人相互改造而成长为革命家，最优秀的革命家最终回到厂外领导全国的小组——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正如彼得堡的“手工业”发展出了切合时代的革命科学、建立了科学组织的地方小组、培养了掌握科学的革命家，然后才孕育出政治报的“大工业”。**“大工业”的灵魂是科学。**
不同时代，政治斗争的具体方法不会相同。在特色情境下进行大工业斗争的科学、掌握这种科学的革命家，只有到工人中去，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才能产生。

同时，政治报阶段，被供养的职业革命家仍是极少数的，他们离不开已广泛建立的工人组织，以及其中同样掌握了革命科学的非职业革命家们。而且因为掌握了科学方法，政治报与工人组织可以直接鼓动整个地区所有其他工厂、并散布罢工教程
—— 这就是“大工业”！革命时机到来时，政治报直接领导的工人组织将率先发起总罢工，带动整个地区的工厂加入罢工，将特色的军警淹没于工人的汪洋大海中！

四. 对比机会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下图左侧总结了辩证发展观下，“否定”阶段的手工业，以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大工业；右侧则是大群《融工路线是什么》中的机会主义政治报路线。



在手工业阶段，辩证发展观要求厂外知识分子小组接受工人小组的改造和领导，通过厂内知识分子和工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改造知识分子和工人为革命家、发展适应当代的工人组织的科学方法、并以已有工厂据点为基础将人员扩展到更多工厂。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起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为革命

家。他们不愿接受工人改造，就要当工人的教师爷。如《融工的战略与策略》中所说，他们通过厂外或轻度的厂内活动接触工人，建立“熟人网络”，然后欺骗工人接受小资产阶级“政治报”的领导，建立有“黑社会”的“纪律”的联络、工作网。

在大工业阶段，辩证发展观基于手工业阶段探索出科学的工人组织方法，选取极少数革命家组成职业革命家组织，领导有深厚扎根基础的众多工厂组织，并能鼓动未扎根的其他工厂、教授他们经过实践锤炼的罢工策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无法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出革命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工业，而充其量是“大手工业”。所以随着他们“黑社会”的扩大，运维“熟人网络”的小资产阶级厂外组织也必须越来越大。这与《怎么办》要求的尽量减少职业革命家人数背道而驰！

> 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

大罢工开始时，辩证发展观建立的政治报-
工人组织网络，先由工人组织带头罢工，带动被鼓动的当地全体工厂。全程以负责任的、科学的方法组织运动，在保证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取得罢工的胜利。形而上学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报，大概率是无疾而终，否则他们会鼓动“熟人”们在工厂自发斗争（这是真正的屈从工人自发性的经济主义，斗争是小资知识分子们所不会、也不敢的），让工人们做炮灰去冲击政府。但工人不会上他们的当，只会一哄而散，知识分子只有为工人服务、接受工人的改造，才能在斗争中得到工人拥护、得到工人保护。而没有无产阶级支持的臃肿的小资产政治报最容易受到镇压、重蹈佳士的覆辙。

五. 总结

机会主义者的政治报，是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手工业路线，其根源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小资产阶级拒绝工人改造的单向鼓动灌输。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同志放弃机会主义路线，和我们一起到工人中去，基于否定之否定的组织建设路线，发展21世纪我国革命科学、建立科学的工厂组织、改造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并最终建成大工业的革命家组织、成星火燎原之势！

“党”、“纲”岂是儿戏？机会主义者不会得逞！–从苏共党史分析建党条件驳虚空建党的先生们

目前有些同志患有一种“建党迷信”，在讨论当前的革命工作应该如何开展的时候，大肆鼓吹要先建党，要有纲领，把建党和制定纲领作为革命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我们不否定建党和制定纲领的必要性，但是党是怎么建起来的，纲领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是不是像有些同志所简单想象的那样，还没有经过密切联系工人阶级的深入工作，仅仅依靠一些坐在书斋里面躲在线上的知识分子就能够拟定出正确的纲领，然后就依靠这个去号令全国小组，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武林盟主一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呢？

现在左派小组林立，但是力量分散，是因为没有人提联合，提建党，提制定纲领？或者是因为没有像列宁当年那样去“办政治报”，所以不能把力量集中起来？

本文试图从苏共党史中寻找到答案。既然先生们句句不离列宁，那我们不如从列宁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来具体分析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建党和制定纲领的任务的？列宁对于建党和纲领到底是怎么看的？

1、组织和纲领自“工人协会”时期就有了

俄国工人阶级是依靠西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起来的，先进工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促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思考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

俄国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由来自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革命家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的工人中宣传而在1875年成立。加入协会的有60人，影响的工人有150-200人，而且有“代表会议”的组织架构。“南俄工人协会”提出了自己的章程，宣布必须实行革命变革，目的是消灭统治阶级的特权，把工人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成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基础。

1878年伟大的工人民主主义活动家哈尔土林建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协会本身是在一些建立了长期牢固联系的小组的基础上、吸收了经过考验的工人革命家的优秀分子而成立的。协会有200个固定会员，

其中多半是工厂工人，还有同样数目的同情者。协会的组织架构是各区委员会同时也是工人中心小组的成员领导各区工作。

“北方工人协会”制定出了自己的纲领，强调了工人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了组织的作用。纲领中广泛阐明了政治斗争的任务，提出争取政治自由，废除等级和特权等要求。当然，纲领中还有一些局限，例如没有资本主义的概念，没有对无产阶级阶级本质的说明，还有受民粹派影响的色彩等等，也没有完全理解政治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途径也不清楚。

协会不仅进行宣传工作，还力求进行公开的积极斗争，成员们参加并领导罢工，印发传单，号召工人联合罢工和互相支援。

俄国早期的工人协会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驱。他们已经通过工人工作建立起了工人小组，在联合各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工人协会，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开展起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的行动。当然由于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真正深入传播，他们的纲领有一些局限性。

但是，我们当代那些高呼“建党”的先生们连“工人协会”的深入联系工人和参与斗争的水平都远远没有达到，还没有发展出工人小组，而仅仅依靠一些自称掌握了“马列毛主义”原理的连书斋都没有走出的知识分子、依靠自己孱弱松散的线上“组织”去“建党”，想要号召别人，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勇气？

很显然，**即使有了联系工人、展开实际工人工作、制定了纲领的组织（虚空建党的先生们连这个都没有做到）还远远达不到“建党”的标准。**

2、叫做“党”的小组和只能称为“宣言”的纲领

当然了，我们的虚空建党的先生们要如此为自己辩解：“工人协会没有明确提出建党，只是一个协会而已。”“工人协会哪里像我们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能够制定出最正确的纲领。”那么接下来的俄国革命史就要再次狠狠抽他们的耳光。

1884年，彼得堡大学生、未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始人布拉戈耶夫就已经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小组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他也制定出了一个纲领，承认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指出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这一革命力量，认为自己活动的目的是对城市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从而为创建社会主义政党奠定基础。但是，这个纲领中还有民粹派和拉萨尔思想的残余，比如没有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根本区别，比如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能够转变为“人民国家”并由它来实现社会主义。

布拉戈耶夫小组虽然主要由医生和大学生组成，但是“没有忘记他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工人阶级，他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小组与多个地区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工人们一起“按照小组事先拟定的大纲进行相当有系统的学习”。

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小团体的纲领的基础上，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内容，包括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任务、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斗争的国际性质等，同时还说明了俄国的特点是劳动群众遭受着“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衰亡中的宗法式经济”的双重压迫，提出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在实践部分包含了一般民主改革、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和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三方面。

然而，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份纲领草案的评价是“原则是对的，错误在于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所以“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宣言”。列宁还说“纲领起草人阐述这些原则是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

请问虚空建党的各位先生们，高声喊叫自己建党有什么用呢？喊着建党就真的是党了？就能摆脱自己工人工作没展开，仍然处于小组阶段的现实了？

从工人协会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除了布拉戈耶夫小组，苏共党史书中还举了大量其他小组的例子），即使还远远未达到建党的阶段，俄国的革命组织也时刻不忘把自己的宣传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然而你们却远远脱离工人，还没有做脚踏实地的工作就在虚空中叫嚷着要建党，**你们思考过即使就小组而言你们还处于多么低的水平吗？**

你们还提什么制定纲领，好像只要亮出党的招牌，亮出纲领，自己就可以以党中央自居。就凭借你们脱离工人的苍白无力的实践水平，以及目前所见捉襟见肘的理论水平，也**无非制定出“最一般的马列毛主义宣言”罢了。**

你们把建党、把制定党的纲领看的过于简单幼稚，就凭这样的水平也想号令别人，实在是有一种夜郎自大的美。

3、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列宁的实践活动

如果要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过程，列宁在彼得堡斗争协会时期的实践活动是不得不提的。线上建党的先生们张口闭口“政治报”，却从来回避谈这一时期的实践。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如果没有这

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通过工人工作把自己的理论、实践和组织都与工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就跨越不了小组阶段，“一大”也开不成，后面的政治报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列宁绝不是一个脱离工人阶级的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而列宁领导的“老年派”马克思主义小组在1893-1894年的冬天即小组阶段就开始扩大和加强和工人的联系，帮助工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工人讲课，在工人小组中进行宣传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中最复杂的问题也能向工人阐述得简单明了。列宁小组的特点就是把理论斗争同实际斗争中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一手理论斗争，一手工人工作的实践，从而做到了在思想上加强团结，组织上得到了巩固，并且扩大同彼得堡工人小组及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

请注意，列宁的“彼得堡解放斗争协会”没把自己叫做什么党，定性仍然是小组阶段，但是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做了初步的准备。

我们就拿这个最接近党的小组的标准来审视一下我们虚空建党的先生们的组织。既然他们要建党，想必自己的小组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吧？

在某频道开篇文章中这些先生们是这么说的：
“如果没有一个纲领，一个统一的党，我们就很难对工人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教育——一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的路线，不明白我们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又怎么去组织工人呢？”

看了这句话我顿时眼前一黑，随后无语凝噎：如果虚空建党的先生们连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又怎么去组织工人都不知道，也就是理论水平还不达标，他们怎么去向别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们开展宣传工作让他们加入？“加入我们的党吧，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工人，但是等我们建党了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这是什么话？真的有人敢加入这样的党吗？不，实际上连党都不用谈，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恰恰是先生们觉得“不是建党的基础”的小组阶段应该达到的要求。在小组阶段，正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或者工人首先明确了“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同时把这些以小组的形式向其他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进行传播。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清楚，意味着**先生们连小组都搞不起来，那还侈谈什么建党？**
这难道不是儿戏吗？先生们还大谈特谈什么“政治斗争”？难道这些不正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吗？难道先生们的“政治斗争”就是讲一些空泛的革命道理却不跟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就是告诉工人你们应该怎么做但是自己却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这种还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紧密结合的人也能叫做革命者？

我们就更不用提到虚空建党的先生们从来闭口不谈自己离工人有多远，自己的“政治斗争”离工人有多远，离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有多远，离革命工作的需要有多远？他们觉得有了党和纲领就有了工人工作，却无视了这样的事实：**党和纲领都必须经过把理论与实际的工人工作的实践结合才磨练出来的。**

列宁的彼得堡解放斗争协会的核心是一些最有经验的和最有威信的成员组成的。这里的最有经验当然是有丰富的工人工作经验，威信也是在这些工人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威信，在工人中间的威信。我们的虚空建党的先生们既然从来不谈实际的工人工作的经验的，他们的威信又从何而来呢？靠自己线上“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可怜的成果吗？这个威信甚至没有得到工人的承认，这种党如何能自诩代表工人阶级？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经在首都的大工厂都取得了联系，有了自己的人，并在工人的自发斗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彼得堡几乎所有的工人小组都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虚空建党的先生们还没有去做联系工人的工作，没有能够在工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证明能力，这个时候就心急火燎地去谈什么“建党”，**自以为克服了什么“手工业”的缺点和“小组习气”，实际上自己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连一个革命者的标准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组织水准连小组应该有的标准都没达到。**
然后这几个都没有达到标准的小组的联合就能实现标准提高到党的标准了？那就等于说几杯50摄氏度的水加起来能够超过一百度那么可笑。实际上**这种全部脱离实际工作的低水平的小组联合不过是变成一个大号的小组而已，哪怕自称叫党都改变不了仍然是小组、甚至还是个大一号的低水平的小组的事实。**

4、列宁对于党的任务和党纲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谈一谈建党和党纲的问题。

列宁在1895年末1896年初写出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的分析了俄国革命的形势和条件、党的任务和党的实际要求。在纲领草案的说明中，列宁明确提出了党的任务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列宁在说明中花了最大的篇幅来解释，工厂工人和厂主的斗争是如何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党的活动就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
“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
这种帮助具体来说，首先重要的是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自觉，而工人的阶级自觉正是通过已经开始的、日益扩展、日益尖锐、日益吸引更多工人的斗争来认识这一切的。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党的任务就是真正

参与到工人运动、工人的斗争中（这个斗争包括平时的小冲突，也包括一些大的罢工），“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在这个基础上，列宁提出党要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因为这种斗争要求工人组织起来，同时党要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也就是向工人指出
“什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剥削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怎样使工人群众陷于赤贫境地，怎样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把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以外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白白送给资本家，其次要向他们解释，这种剥削怎样必然地引起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条件及其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
，也就是要做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

列宁在这里花最大篇幅去强调的是党要做斗争的参与者，要把自己的工作与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是工人最好的学校，因为斗争
“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条件或者那种条件上”，斗争“引起工人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认清这些条件，弄清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怎样进行压榨，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同这种压榨进行斗争”。
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斗争和促进这个斗争上面”。**
有过实践的同志都能够深刻体会到一场斗争前后工人能够受到多少的锻炼，**深刻吸收到多少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灌输内容。**

我们再来读一读列宁在之后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因为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列宁非常详细地解释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践层面的实际任务，是每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的实践指南;同时列宁本篇文章的目的也是为了解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为什么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就是详细阐述列宁对于建党和党纲的理解，是解开所有关于这方面争论的关键。**

“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派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普遍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他们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的情况，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取的态度，了解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重要的非法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军队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他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央组织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印发工人刊物，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工作人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以上文字是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原文中的一段。可以明显看到列宁在这里区分了宣传工作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是向少数先进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鼓动正是与参与斗争密切联系的，“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一切冲突”、“把自己的活动与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很显然，**宣传工作面向少数先进工人，主要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鼓动正是由于参与了斗争（这个斗争的参与者显然不限于少数工人）、与广大工人群众的实际日常生活结合而有了广泛的群众色彩，从宣传到鼓动的变化就在于群众工作，尤其是参与群众的斗争。**

那么，参与群众的斗争的形式到底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呢？列宁在这里很细心的做了详细说明：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经历过实际的工人工作的列宁同志，不会幼稚地像有些先生那样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割裂，而是强调他们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参与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只是在斗争之外空洞地去宣讲，如果没有斗争作为启发工人觉悟、提高阶级自觉的助推作用，所谓的“鼓动”是苍白的无力的，而且是做不到群众性的。**

我们再回头去看看列宁的传单都是什么时候散发的。

1894年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因迟发工资而发生工潮，工人们和哥萨克和消防队发生了斗争冲突，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为此次事件散发了第一张传单，经工人小组讨论，抄写了四份发到工人中去;1895年7月港口

工人因因工作日延长和工资降低而举行了罢工，列宁小组的成员在工人小组的帮助下收集情况，起草了«港口工人应该争取什么？»的传单。1895年11月托伦顿工厂罢工，列宁写了通俗易懂的传单并产生巨大影响。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斗争协会”传单对于罢工的发生和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能看到**这种鼓动是紧密结合着斗争而开展的，而且在斗争中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我们也能看到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有机结合的方式。**

同时我们不可忽略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平时已经展开了密切联系工人的行动，还有详细的工厂调研的情况，并组织起了各种工人小组。**
斗争协会让工人小组来讨论传单，从而让传单从形式上是工人最容易读懂的方式，从内容上最能够清楚反映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诉求，从渠道上能够到工人手上、被工人信任。

那么，我们虚空建党的先生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经济斗争带动大家培养工人的政治意识当作主要的融工方法”是“本末倒置”的，这不是在否定列宁的这两篇文献？他们说«巴布什金的回忆»和«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这两本书都是用直接的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锻炼培养的工人，实际上是**他们把“用政治意识宣传启蒙先进工人”和“结合斗争做群众性的鼓动”这两件事情混杂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不理解宣传和鼓动的区别，搞不清楚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的关系。**

更不用说在实践上，我们虚空建党的先生们做到了什么呢？他们在平时已经能够密切联系好各厂的工人，详细深入了解各厂的情况，组织起工人小组吗？他们已经敢于参与工人的斗争吗？他们的鼓动能够做到形式、内容和渠道上都跟工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吗？

实际上他们联系工人、组织工人的基础工作都没有做，只会空谈“鼓动”（更不用说把线上的宣传称之为鼓动这种愚蠢的观念了），他们的“鼓动”是狭隘的、与“经济鼓动”割裂开的所谓的“政治鼓动”，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与斗争紧密结合”了。

实际上以他们的水平就算想做也做不了鼓动。“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的路线，不明白我们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又怎么去组织工人呢？”请问下列宁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连这么基础的水平都不明白么？你连这些都没想清楚你去做工人的工作能做好吗？

最奇葩的是我们的先生们建党的理由正在于这个！好像建了党，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了。他们说不认可建党是在小组的基础上，然后说“何况没有政治鼓动，没有纲领，不注重政治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如何组建的起来？”

我们的先生们对于小组、建党的认识到了何种无知的程度？对于斗争和鼓动对于从小组向党发展的理解又是多么的愚蠢？小组阶段正是先让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明白这些道理，然后去结合斗争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从而使得小组向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现实任务更加明晰、纲领在实践中磨练成型。

实际上，**我们的虚空建党先生们的实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连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必备的素养、连小组阶段的任务都不明白，错误理解并夸大所谓“政治鼓动”的作用，脱离工人，逃避斗争，幻想出一个“建党和纲领解决一切问题”的空想路线，并千方百计回避做工人工作、参与斗争、展开鼓动的融工路线。这是一条理论错误、实践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

当我们谈小组联合的时候，是要求认同正确的路线、并达到一定的理论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小组间进行联合，而且这种联合是围绕着参与斗争、进行鼓动的目标进行的联合，这是融工路线的真正意义！

5、列宁的政治报路线不是架空而是以过去的工人工作为基础的

我们最后再去分析一下虚空建党的先生们对于政治报路线的误解。他们以为不做工人工作，仅仅凭借一个架空的政治报仅仅依靠报纸的代办员网络就能够搭建“党的脚手架”，仿佛政治报是个什么召唤魔法，只要有了报纸就可以召唤出党的一整套骨架、血肉来。

列宁的政治报网络是凭空搭建出来的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去看一下列宁在决定办政治报后的活动、看一下政治报的通讯员网络是如何建立的就很清楚了。

列宁在着手创办政治报前先后访问了乌法、莫斯科、彼得堡、下新城、萨马拉、塞兹兰、波多尔斯克、里加、斯摩棱斯克等城市，会见了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这些地区的活动家们形成了«火星报»的代办员网络，后来就是«火星报»组织的骨干。

列宁不是魔法师，他的政治报做的事情是把原先已经充分展开工人工作、同时又没有被经济主义路线所占据的那些正确路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起来。
只学习“政治报”却忽略了这个条件的虚空建党的同志们想在沙堆上用空想的召唤魔法召唤出美丽的城堡，注定只是美梦一场。

6、线上建党的先生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组织（党）的理解与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理解的区别，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当理论工作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理论工作的成果在工人中间得到宣传、理论工作帮助工人组织起来时，社会民主党人才能避免那些孤立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团体常犯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为学说的最高和唯一的标准，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认为任务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同志们，脱离现实生活的需要、不把理论工作的成果在工人中间宣传、不能帮助工人组织起来的是谁呢？我们目前现实生活的需要，难道不是要求革命者投身融工事业从而在工人中宣传理论、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吗？是谁脱离现实生活妄想着什么8小时融工、甚至冒出经济危机会使得工厂降到8小时工作制的笑话奇谭？是谁找了种种借口逃避融工这个最迫切的需要，实质上是在顺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是谁教条式的理解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却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历史条件呢？

这些脱离工人，脱离现实条件空谈着建党、制定党纲，把党、纲当成儿戏的先生们把自己当成正确的化身，当成最革命的代表，大肆推销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抹黑融工路线，不能够光明正大地大辩论，而采取诡辩、扣帽子、动用管理权限打压不同声音，并指责别人在搞宗派的时候，谁又是真正的宗派主义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机会主义路线长不了。在线上他们辩论不赢，到线下更会处处碰壁，机会主义者一定不会得逞！我相信历史和实践都会给出证明。

马列毛主义者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其中自然包括各种民族利益和地区利益。特色党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论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这样的一个先验的论点，是很经不起实证分析的。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到台湾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分析台湾海峡两岸究竟处于哪个“历史范围之内”，接着才可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在当前的要求。换言之，我们要先分析两岸的社会性质，才能真正理解台湾问题。

至少在今天，全世界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已经很明确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我们在此只需再强调一次，目前整个中国都完全掌握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现在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的统治阶级显然也是资产阶级，但中国和台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是非常不同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台湾的表现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1976年复辟后，才真正开始在全社会流行起来。而在台湾，资本主义是从日据时代开始发展的。那个时候的台湾在理论上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经济结构主要由农业矿业和轻工业这些服务于日本工业制造的初级产业组成，少数不成体系的重工业还在二战期间被美军摧毁了许多。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归还中国时，不论在政治上、社会上或经济上，都跟中国大陆有极大不同。为了维持内战，国民党在台湾横征暴敛，这更进一步恶化了岛内经济社会状况。1949年之后，国民党的注意力全摆在防备中共犯台上面，很少管台湾这个“临时基地”的经济行政。当时国民党买办政权带着大量的黄金和百万大军到了台湾，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在岛内却并没有实体产业，也就缺乏再生产的能力，他们带来的黄金最多只够两年开支。与之相比，日据时期留下的台湾本土买办，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却依然拥有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虽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台湾本土的产业资本家以及地主阶级共同构成了台湾社会的统治阶级，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全部建立在所谓“反攻大陆”之上，为此他们推行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工业建设计划和军事计划；而对台湾本土的资本家而言，没有什么是比维持自己的产业更重要的了。统治阶级尖锐的内部矛盾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大制约。加上台湾工业资源极其匮乏，除了煤矿和木材以外，绝大多数工业原料和化肥都需要进口，我们很难想象台湾能够自己实现工业化。不过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进行了大量的“援助”，这才使得台湾经济免于彻底崩溃。

“1950年代末期，台湾的安全已获得保障，此时国民党才开始认真地考虑岛上的工业发展。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策略：就是拿本地制造的小型消费品取代依赖进口的货物。但是到1960年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经济学者、世界银行专家以及其它西方顾问，建议台湾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加入全球性生产线，成为其中的一员。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得到同样的建议。国民党对此反映非常热烈，贸易的种种限制解除了，外汇管制放松了，同时提供外国投资者关税优待和百分之百的利润回收。1965，高雄成立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自1950年开始，国民党政府一直是压榨农业，以补贴工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因此而降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非农业活动增加。1966年，一年收入不到三万新台币的农夫，应缴的税是非农夫的4.15倍。而所有农家的平均收入，还不到非农户的70%。由于这不利的因素，大量人口移向城镇和都市。在这段期间，从事农业的工作人口比率持续降低：“由1950年的50%到1970年的36.7%，降到1980年的19.3%。另一方面，投身工业的人口比率由1950年的16.9%，到1970年

的28%，上升到1980年的42.4%。同时，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人口比率由1950年的27%到1970年的35.3%，上升到1980年的38.1%。此些工商业的进步在台湾造就了较庞大的工人阶级”

总之在蒋介石和美国的扶持之下，台湾产业资本迅速壮大，但这又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政权和台湾本土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后者为了自保一边向国民党官僚妥协，一边又向台湾本本土居民寻求支持，而这又加深了台湾本土居民和大陆移民间的矛盾。不难理解，他们最支持台湾彻底独立，取消“中华民国”统治。之后随着技术官僚的崛起和台湾产业经济的发展，台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相对缓解。到现在，台湾显然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了，但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和企业基本都掌握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毕竟对美国而言，台湾在是对付中国的一座重要前哨站。（无论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今天的帝国主义中国）

同志们，我们谈了这么多台湾历史，无非就是想要指出资本主义在台湾海峡两岸是相互独立发展的，而正是因为这点，而且也只是因为这点台湾才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台湾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相反，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台湾人和中国人依旧同属于汉族）所以，在今天，谈论中国和台湾要如何统一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诚然，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也经常提出统一台湾的问题，但那个时候的情况和现在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都知道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事情在台湾可并不是这样。1951年，国民党迅速而残暴地对付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团体领袖，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抓就是处死。一些在台湾山区活动的左翼游击队，也同时被消灭。此次镇压除掉了左派运动的领导人，将左派连根拔起，使得台湾此后的反对团体，较倾向自由主义，而不像社会主义。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又使得解放军不可能在当时直接解放台湾。无论如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未在台湾取得过胜利，因此当时人们谈论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第三次中国革命战争能否推进到台湾，社会主义能否在台湾胜利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社会主义中国统一台湾实际上是非常有可能的，绝非后来邓小平式的空谈。在1970年代初期，中国曾向关心台湾的人士说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部署，分国际、国内和岛内三个方面。

1.国内：

首先，立足于中国自己，国内的准备是最基本的。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是基础。中国有实力，在国际上有利于逼美国退出；在对台湾谈判上也容易使国民党妥协。在经济与军事上，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中国越来越具备统一台湾的能力。在意识形态上
“一定要解放台湾！”和“社会主义统一中国“等口号，已经在全国宣传普及。这些都是统一台湾的准备。

2. 国际：

在国际上，统一台湾的关键是美国的彻底退出台湾。只要美国彻底退出台湾，国际上就不存在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的阻力了。美国当时陷在越战中不能自拔；又面临苏修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很难再与社会主义中国爆发大规模公开对抗。美国为重建美中关系，必须放弃原来的反华政策，退出台湾。但对中国来说，美国的退出必须彻底，任何的不彻底，就留下了漏洞，美国就会继续插手台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就是要达到一次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问题。不能分两次成交。

3. 台湾：

一旦国际干预清除，台湾已经变成中国内部问题时，中国对台湾回归的条件是可以很大松动的。为了减少流血，必须同当权的国民党谈，这就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从来是走群众路线的，台湾的未来，最根本的是依靠台湾工人阶级推翻国民党统治，这就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只有台湾人民真正认可社会主义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才会顺利。可笑的是，今天某些小丑，不知道是从布哈林那里还是匈牙利的那个库拉•贝恩那里又或者是秘鲁共产党那里讨要到了所谓的“进攻理论”，非要把一百年前国际共运在德国和波兰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在他们看来，毛主席没有派军队去直接攻打台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未来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也只能靠战争手段。
总之社会主义中国对台的总方针是：立足于武力，争取和平解决。中国当时同香港、台湾和海外来的华人都一再提起两个模式：一个是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方式；一个是和平解决的北平的方式。在谈到北平解放时，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提到，当时傅作义的决定，他身边的人，包括他女儿，都是左倾亲共的，这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坚持到八十年代的话，台湾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

在今天，连资产阶级政治评论家都知道台湾问题的本质上是中国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争霸的问题。没有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支持，台湾统治阶级是无法与中国帝国主义对抗的。而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还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中国甚至一度成为美国准盟友的那个时候，台湾问题则远没有后来那么尖锐。那个时候邓小平等叛徒曾经向美帝国主义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即使是从朴素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都无法理解的妥协。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到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中国基本把台湾问题搁置了，除了作生意外一概不问。那个时候提统一台湾的口号，其实不过是邓小平等叛徒用来欺骗中国人民感情的空话。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真正动力去征服台湾。这也符合资产阶级的交往逻辑，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永远都是实力最雄厚的一方具有话语权。

今天任何人提出统一台湾的口号，客观上都只能有利于中国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如果我们中国马列毛主义者不去积极反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台湾政策的话，那么就是放任中国工人被沙文主义征服，去为加强自己的敌人而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工人兄弟自相残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国际工人运动的叛徒了。所以对我们而言，在台湾问题上压根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只要不是积极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台湾政策，那么就相当于是在支持中华帝国主义，而反对工人阶级。

不过目前看来，至少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对台湾问题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真正最急于攻台的是习近平以及他背后的政治集团。但是对技术官僚集团和海军而言，攻打台湾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一旦特色攻台，面对的就一定不可能只是台湾，而很可能是整个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意味着无论战争进程如何，中修帝都很可能面临全面的经济封锁，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对出口的依赖，单单攻下台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于中国统治阶级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中修海军认为要攻台湾，必先炸琉球，进而将整个美国势力逐出东亚和东南亚，最终实现与美帝二分太平洋的战略。结合2016年以来中国海军的疯狂扩张，以及中国统治阶级前几年提到的“经济内循环”，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军的战略恐怕才是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准备的。近年来日本政府基于“台湾有事”的前景，多次组织琉球人进行疏散演练；美国海军也有在模拟假如琉球基地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将如何应对战争。可见，特色的对台湾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是半公开的秘密。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台湾政策，但这显然不意外着我们就支持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资产阶级。我们非常清楚现在的美帝国主义是要利用台湾作为对抗中华帝国主义的前哨站，是要把台湾和整个太平洋变成战场，我们自然和美国以及台湾的同志一样是反对这一切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美国同志、台湾同志和中国同志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台湾政策时，只是各自在形式上的侧重点不同罢了，而在政治原则上我们是一致的。而且，中国进步工人“反对中国帝国主义入侵台湾”，与美国进步工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操控利用台湾”事实上是一件事，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

至于中国和台湾未来能否统一的问题，我们自然坚持人民群众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原则。目前在台湾，只有12.5%的人支持和中国统一，但假如现在的一切情况基本不变，而这个数字却突然飙升许多，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事实上，当我们说到遵循“多数人”意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指遵循群众在目前状况下的投票结果，而是指的遵循自由人民的选择。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台湾，中国还是美国，劳动人民都处于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之下，因此并不存在自由的人民。工人们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奴役，而且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也屈从于统治阶级。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目前并不具备阶级意识，并不清楚自己的阶级利益何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屈从于所谓“多数民意”而支持统一，就好比叫美国的革命者去支持多数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政府而放弃阶级斗争一样。当然我们也绝不是说需要靠“干部”来定义人民是否自由，因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标准就是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而假如未来中国工人阶级成功推翻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台湾工人阶级也成功推翻了台湾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选择和中国统一的话，那么中国工人一定是会非常支持的。笔者相信其他中国同志和自己一样，其实也非常希望社会主义的台湾与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统一为一个国家。但一切国家终将消亡，只要无产阶级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和台湾能不能统一其实也无所谓。
稍微衍生一下话题。德国和奥地利是否合并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对的台湾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当时人们的一些看法。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曾发表过希望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建成大德意志的言论；但是在1871至1918年间，无论是在德意志帝国还是奥地利帝国都并没有认真的德奥合并运动，所以他们也仅仅只是发布意见而已。在1918至1933年间，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共产党都是支持德国和奥地利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统一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德国”的，而且不能因此导致和其他民族工人阶级的矛盾。同时德国和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都反对两国立刻统一在资本主义的德国下。有意思的是，当年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则都是支持两国立刻和平统一于魏玛共和国下。

第二部分：工作方法——工人工作和学生工作的经验

从刘司墨近期的举报事件反思学生工作的路线和方法

刘司墨——这个欲被招安而不得的投机分子，最近他和他的粉丝就像苍蝇涌向粪坑一样找到了新的炒作热点。一个自封的“学生领袖”，出了自己的选集，在微信上大谈特谈全国大串联，创了个抖音号来炒作，最终被刘司墨当成了新的靶子，一场对上峰叼骨头、摇尾巴的表演又开始了。我们对刘司墨的态度是明确的，不再赘述。我们对这位新近冒出的学生领袖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有投机主义的倾向，也许是一个做得不聪明的刘司墨而已，因为侵犯了刘司墨的生态位被他举报。但这位领袖表现出来的路线和方法的问题，的确值得好好反思。学生小组由于脱产的属性，很容易犯下这些错误。

路线方面，尽管从那本东拼西凑、乏善可陈的“选集”中很难找到系统的论述，但能够发现比较流行的几种错误路线的痕迹。

1）融工路线。
尽管这位领袖口口声声说要融工，但仔细一看，就发现底色是非常精英主义的，无非是换了左皮的自由派“开启民智”那一套。当然，他们也考虑到空口白牙讲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别人未必愿意来听，于是想到可以通过给工农做慈善来吸引群众。做慈善本身是没人反对的，但如果指望仅仅依托于做慈善就能完成政治灌输的任务，这就是极为错误的路线。所谓融工，就是指彻底融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不是把无产阶级当作政治背景板；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进而完成宣传乃至鼓动、组织、培养方面的工作。

虽然的确是艰苦的道路，但俄国、中国的革命经验，韩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道路。学生小组的工作也应该以此为目标，把最终的着眼点放在融工上，而不是单纯地在学校环境反复打转。

2）左翼联合路线。
长远来看，左翼是必须走向联合的，否则就不能有组织地参与到全国的政治运动当中。于是我们的一些“革命家”，就提出了各种联合的方案。有的非常低劣，比如这次这位学生领袖，在微信号召大串联最后被刘司墨盯上；有的非常搞笑，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俄国的革命党，要在腾讯会议上开大会；还有的形式上显得更严肃，也更有迷惑性。总体来说，这是只看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只看到了列宁的号召力；没有看到之前有多少时间是“二十年等于一天”，没有看到列宁在彼得堡做的长期的基层群众工作。现阶段中国左翼各小组在各自的阵地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形势上也没有联合参与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背景，仓促之间搅在一起，只会互相拖后腿，甚至造成安全风险。

我们认为联合是有必要的，眼下探索联合的方式也是有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小组的联合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I.**
有实际的协同工作的需要，主要是指同区域的线下小组，线上协同工作就仅限线上，涉及到线下情况需要非常慎重 **II.**
经过一段不短时间的沟通，双方确认彼此还比较靠谱 **III.** 对齐组织的规划、人员标准等，以免实际接触后产生安全风险。

3）宣传工作路线。
有的同志还在设想，如果能在墙内多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帮助更多人认清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效率会更高。但必须指出的是，如今这是非常天真的幻想。首先，在网络上表态本质上是非常廉价的行为，观众的点赞什么也不能说明，如果仅仅只是写文章、做视频，效果没有那么显著；其次，墙内的言论审查已经登封造极，如果持续在墙内输出，要么是彻底销声匿迹，要么是蜕变为红皮老保。还有些人就是冲着引流出名赚钱来的，对这种人没必要说什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小小螺丝钉而已，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宣传工作的重心，最好还是放在身边线下。不求多，只求精。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少数派，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彻底动摇的阶段，我们没必要追求主流的认可，只要能找到真正的同志就行。更重要的是，做宣传要持续跟进，不能一锤子买卖。做宣传还需要有后续的目标和计划，不能仅仅追求“你说得对”，而是要及时把身边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聚拢起来，开拓群众的工作面，在实际工作中改造别人、改造自己。

工作方法方面，这里强调两点，也是初创学生小组很容易犯的。

1）安全方法。
在微信上讨论工作问题，在实名制墙内平台上炒作，搞大串联等等，这些行为都属于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没有组织的人，其实说什么都无所谓，像白纸运动期间很多人也就是写个保证书或者拘留几天就出来了。而有组织的人，就必须谨言慎行，不能使自己的公开言行特别突出于身边群众，否则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就很容易引来调查，进而暴露整个组织。对于有组织的人，惩罚也是更严厉的。

至于安全技术细节这里不赘述，总之微信qq绝不能用来讨论工作。这也是线下小组的一个优势，讨论工作聚在一起吃个饭就可以，当局再如何丧心病狂也是很难禁止大家聚众吃饭的。

2）组织方法。
从这位领袖在微信群大谈串联，还被刘司墨的眼线截屏，就能够看出来毫无组织意识。做学生小组工作需要分级处理，需要团结的积极群众、有可能发展的积极分子、核心小组的成员，是完全不同的，并不是说看到谁感觉还行，就立刻邀请加入小组，这期间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考察和培养时间。要确认他的品性，比如是不是可靠、有没有信用；还要确认有没有额外的安全风险，比如参加了很多冲浪群或者在社交账号上经常发表危险言论；培养方面，要让他真正认同马列毛主义的道路，并有志于参与其中。这样才能足够放心地发展为核心小组的成员。

当然，初创的小组可能没有这么多挑挑拣拣的余地。但之后小组做起来，要在长期的组织工作过程中，让进步的同志占主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任何时候都一团和气、搞大杂烩，那只能说明小组没有长进，或者主导小组的路线是落后的。

这里讲了这么多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同志觉得做群众工作太难了。其实不是这样，只要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认真踏实做事，大部分问题甚至不经意间就能避开。不过总结经验教训总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创办烈火频道的目的之一，希望有经验的同志多分享一些经验出来，让刚开始做工作的同志有章可循，而不是看着有些网上热衷于自吹自擂的人天天胡闹，最后对社会主义运动失望。

《巴布什金的回忆》带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

巴布什金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者、党的骄傲、一个忘我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工人事业的同志。他的回忆录回忆了自己从一个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醒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入，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我们了解如何做工人工作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一)早期工友感性的阶级情感的启蒙

巴布什金出身是个农民，十四岁之前都生活在远离城市、四周都是树林子的的乡村村庄里面。这段时期的生活他甚至都忘记了，显然对于他的影响微乎其微。

从十五岁（即1888年）开始，他在喀琅施塔得的鱼雷工厂里面做了将近三年的工人。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最初的阶级情感的启蒙。这种启蒙的形式是一堆人在一间屋子里面进行一些关于“政治犯”的谈话，但是这种谈话的内容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他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些政治犯是因为阅读了什么犯法的东西，而且他们不是蠢汉，而是袒护工人的。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对于巴布什金来说政治还是遥远的、跟那些政治犯相关联的事情，与自己的关系还远远谈不上密切。

在18岁（1891年），巴布什金遇到了一个彼得堡的工人，结交了一种特殊的友谊。这个工人把自己对厂里的资本家和一帮渺小的寄生虫的部分本能上的憎恨和反抗感染给了他，使他具备了初步的、朴素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接下来巴布什金就去了彼得堡，在塞棉尼可夫工厂里面做工。在这个工厂里面旁边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时常保护他，从而结下了感情。这位工人常常向他说一些从前遇过的各种风潮，牢记着民意党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并对散发这类书籍的人表示明确的同情。他把对沙皇在内的吸血鬼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的仇恨心理传染给了巴布什金。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巴布什金受到的是一些感性的阶级情感的启蒙，会听到一些话，但是不明白它，也不会分析它。总而言之，他还仍然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二）工友小组逐步建立自觉的斗争意识

在这样的阶级情感的铺垫下，真正谈得上政治启蒙首先是一位工友柯斯嘉开始的。柯斯嘉应该是观察巴布什金很久，早已发觉他是一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所以刻意跟他搭话交朋友，同时以读书为由让巴布什金去他家。在那里，巴布什金、柯斯嘉及柯斯嘉的朋友传看了一张民意党的秘密读物的印刷纸头。看完巴布什金觉得“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他立刻领会了柯斯嘉邀请他的来意，同时下定决心为这份事业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也许有同志会被下面的这一段所迷惑，那就是柯斯嘉的觉悟的启发似乎是一种偶然，他对巴布什金说他的印刷纸头是有一天晚上下班在厂门口被别人叫住了就被硬塞了纸头。不过从上下文推断，这位硬塞纸头给柯斯嘉的同样是一位工人，这位工人正是厂里面领导在工人中宣传的φ,随后巴布什金就被介绍给了φ。巴布什金、柯斯嘉和φ还在继续着厂内的宣传工作，他们扩大着交友的范围，寻找那些能够谈的很投机的工友并向他们推荐书籍。

在这段时期，巴布什金和柯斯嘉的工作方法还比较粗糙，比如选择对象的范围十分狭窄，不敢接近有家室的工友;比如不知道应当根据工友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灌输。他和柯斯嘉逃避做夜班，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他在回忆中坦承“我和柯斯嘉虽然在工厂做工，却丝毫也不明白工人的生活情况。”

这时，同志中的一位年青小伙子，“一举一动都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他对巴布什金他们谈过一席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巴布什金开始注意找工厂里的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认清了工厂里现存的制度，并对工人展开宣传。

巴布什金甚至有一次和柯斯嘉一起调研过一个工厂，那里条件恶劣，工人们衣着简陋，住的地方臭恶的气味令人窒息，所得到的工资甚至仅仅刚好抵得上房租，而工厂老板还骄傲地认为他对待工人是乐善好施的。这是巴布什金第一次有意识地去了解工人的生活，激起的阶级感情更加强烈，同时也越来越希望通过读书和提高觉悟去改造自己，磨练斗争的武器，最终去终结这种丑恶。巴布什金终于开始走向把整个阶级的命运与自己的人生道路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的斗争阶段。

（三）逐步接受社会民主党思想

然而,尽管有着自觉斗争的意识，巴布什金和柯斯嘉却还没有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只是一些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时候在争论的过程中会被对话人提出的机灵问题弄得走投无路，哪怕自己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公正的，却没办法清楚地说服别人，还是觉得自己失败了。这个时候φ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个新的同志，能够读到更多的书，对于很多问题的争论有了解答，同时还学习到了一些安全纪律，对于组织的情况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φ的家里他们遇到了第一个知识分子П·И，后来在夜校也碰到了女教师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去教工人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报之以非常崇敬的态度，后来就转变为平常的真诚的感情了。

虽然早期政治启蒙跟民意党人有关，但是在φ、П·И等人的影响下，以及巴布什金自己也觉察到了民意党人的路线是不靠谱的。

（四）不断摸索工作方法

当φ被捕之后，巴布什金不得不再次面临独立开展工作的状况。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着手启发年岁相仿甚至更年青的人，同时揭发厂方施行的某些剥削行为。虽然遇到了挫折，“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

后来运动逐渐高涨，处境有所好转，同时又交了一个新的朋友Н（В·А·谢尔贡诺夫），参加了他组织的学习小组，也就是列宁作为讲解员的小组，列宁要求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了解和观察工厂的生活情况，也就是注意把自己的工作与工人的实际日常问题结合起来。巴布什金利用一切机会，在列宁小组，在女教师组织的工人星期日学校，在П·И的小组学习。

当柯斯嘉被逮捕后，巴布什金仍然继续坚持工作。伴随着运动高涨期的到来，工作比以前更好做。巴布什金写道：“同帮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了解我的观点，猜想能从我这里弄到秘密书报;别的帮里的老师傅还会跑到我的虎头钳床上来，直截了当的要我跟他们谈一些什么。”显然，这是客观形势变化，以及巴布什金在内的所有革命者做工作的共同结果。

（五）从宣传小组到鼓动工作展开

在这一时期，巴布什金也在思索一个矛盾的问题：他总是迫切的想把他们都发展为向他一样完全献给事业的人，但是群众的思想转变不会在一天之内全部扭转过来，但是又会在某些特别的时机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宣传和鼓动的差别，鼓动需要时机，这个时机就是群体性的工潮。

当工潮发生的时候，大家发现“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于是立即着手从这个问题开始试着进行鼓动工作。他们编写了传单，并绞尽脑汁思考能够使传单发放到所有车间的方法。他们的方法甚至很快传到了彼得堡港的工厂。

巴布什金在接下来的回忆录中，强调了工人对于理论知识的渴求与书籍、知识分子严重不足的矛盾，没有知识分子推动时好的书籍是最好的领导。

1895年秋天，运动逐渐高涨，知识分子纷纷从各地赶来，每个小组都可以以一个知识分子和五个工人的形式开展学习，甚至要求建立新的小组，大家也等待散发新的传单。

虽然在学习小组中知识分子的参与比较简单，但是巴布什金发现知识分子在做其他工人工作时必须克服一些障碍，比如当托尔东呢绒厂发生工潮的时候，工人们不愿意去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知识分子谈话，但是当根据结合该厂实际情况的传单能够发出去的时候鼓动就能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再比如知识分子在弄清楚传单和小册子应该在什么地方散发，在什么日期散发，需要多少份，怎么去散发的时候，这些地方上的工作必须要本地工人来完成。巴布什金还发现学习小组与宣传鼓动的活动必须结合进行。如果只进行宣传鼓动活动，而不注重学习小组的建设，那么就会转向不正确的道路，不仅不能培养出有觉

悟的工人，而且知识分子也会在不参加学习小组的情况下逐渐变成修养很差的人，同时也不能深刻了解工人的心灵。

巴布什金还谈到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经历打击后不同的恢复情况，知识分子方面不能迅速地恢复元气，但是工厂工作的人员损失较轻，而且在那些群众工作比较深入的地方，工作上了轨道，很短时间内就能够恢复。

（六）巴布什金的回忆给我们的启示

(1)巴布什金的政治启蒙的条件

1861开始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时期进入平民知识分子阶段，民粹派代表人物赫尔岑在«钟声»杂志向那些因为学潮而被赶出大学的大学生们发出呼吁，“到民间去！走向人民！”随着巴黎公社的出现，俄国社会主义“走出了书斋和私人集会场所而进入农村和作坊”，到了七十年代“到民间去”的第一步被确认为是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宣传，作为在大城市的民粹派小组们接近农民的准备工作。民粹派本来只是认为不久前来自农村的“轻工业工人”会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好中介，但实际的效果远远超出他们的意料。接受能力很强的工人热烈响应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宣传，一些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就这样被唤醒而被吸引到解放斗争的轨道上来。七十年代中期，彼得堡、莫斯科等十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大工厂里面都有了民粹派的小组。民粹派及其有联系的工人还组织了1876年彼得堡喀山教堂前游行示威、1877年彼得堡工人抗议游行等活动。

我们在巴布什金的早期政治启蒙的经历里面能看到这样的影子，不管是在喀琅施塔得听到的袒护工人的“政治犯”的秘密谈话，还是后来与来自彼得堡的工人交流乃至于自己亲自去彼得堡听到彼得堡工人讲起民意党的小册子，都是这样的影响。

（2）巴布什金思想转变和改进工作方法的过程

真正带动起巴布什金思想转变的是柯斯嘉，其本人是被厂内的一个领导宣传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成员φ所宣传带动的。正是前面的那些铺垫，使得巴布什金读到柯斯嘉给他的印刷纸头就立即转变到革命立场上，但是这一种革命立场是带着浓厚的民意党色彩的朴素的斗争意识。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学习，以及认清楚民意党人的那些斗争路线是多么不靠谱，他们才逐步转变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来。

他们早期的工作方法也很朴素，还不深入了解工人的状况（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工人），也不懂得结合身边工友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灌输。在厂里的另一位年青人的启发下，巴布什金和柯斯嘉调研探访了其他工厂，加深了对于工人生活困苦的感性认识。在列宁的启发下，巴布什金开始关注从身边工人的实际日常问题的角度来改进工作。在随后的斗争事件中，大家开始结合工人的斗争事件发放传单进行更大规模的鼓动工作。

（3）结合现实谈谈巴布什金的回忆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想我们不用花费大段篇幅去讨论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是怎么样分离的条件。

既然存在着这样的分离，那么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必然是要到工人中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带给他们。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传播呢？

民意党人提出“到民间去”（后来到农民中去受阻，实质上就是“到工人中去”），就是实实在在地到工人中去传播思想，民意党人的工作做得如此深入，以及俄国工人确实具备很高的觉悟，最终在工人中建立起了工人小组。这些工人小组是巴布什金思想转变的重要条件。

民意党人是怎么做的呢？在做农民工作时他们“换上了农民服装，学习某种手艺”，随身带着宣传小册子，这就是“融农”。那么，做工人工作，难道不应该“到工厂中去，穿上工人的衣服，从事工人的生产”的“融工”吗？

一些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同志，以为只要做一些泛泛的外围工作，做一些空洞的政治宣教就能够很快抓住一批有很高政治觉悟的先进工人，然后就能够展开工作。他们甚至把巴布什金拿出来做例子，好像巴布什金是通过知识分子一点就通而发展的“天降神人”。

这是何等的无知和何等的幻想呢？民意党人启发工人政治意识花费了数年的时间，付出了多少鲜血和人力，才建立起了工厂的工人小组。你们现在居然梦想着什么辛苦都不做在毫无基础的背景下靠外围的泛泛的工作马上就启发出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工人，这个美梦如果那么容易做，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们仅仅从巴布什金被φ和柯斯嘉发展也能看出来，他们是经过一段时间在平时工作、交谈中的考察才慎重选择发展巴布什金的，φ看似偶然的塞传单实际上必然是背地里考察的结果，柯斯嘉也是很谨慎的以到他家看报为由头逐渐邀请巴布什金的。如果不去融工，以工人身份去仔细考察，你们的“工人夜校”靠什么去筛选出“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呢？靠撞大运吗？

当巴布什金去做自己身边工友的工作，也要能够像另外一个年青小伙子一样“一举一动都和真正的工人一样”，他要去扩大交友范围，要结合工厂的具体的剥削行为来展开工作，那么跟工人差异那么明显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才能取得工人的信任开展起灌输工作呢？

巴布什金能够去上“工人夜校”（实际上是星期日学校）是因为身边的工友早就与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你们那个知识分子的圈子又怎么去联系工人？怎么去取得信任呢？

巴布什金能够克服上大夜班和小夜班的压力，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努力学习和做工作，他也没有被磨灭了革命斗志，这是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怎么到小资那里，就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了呢？

巴布什金在回忆中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宣传、什么是鼓动，你们那种把宣传和鼓动混为一谈的思想、脱离工人的日常实际生活进行鼓动的思想、脱离斗争进行鼓动的思想与巴布什金的认识完全不同。你们真的仔细读过这本书、了解过他的思想吗？

自以为“接触工人不是问题”，实际上连真正的接触工人都没有做过;脱离工人，连工人小组都没有建立，空谈什么宣传鼓动、空谈建党和政治报？这难道不是脱离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吗？

巴布什金和柯斯嘉的交友、访谈调研、揭发厂内的剥削行为是“经济主义”吗？结合工人的日常实际情况展开鼓动是“经济主义”吗？

顺便提一下，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里面，尼基福罗夫的启蒙也是由他的工头斯庇利董进行的，这同样是有深入工人工作铺垫的结果。我们应该得到的结论是先做好这些铺垫，而不是形而上地觉得不靠铺垫就由知识分子外围做一些泛泛的启发就可以实现。当尼基福罗夫想在酿酒厂做工作而受挫时，斯庇利董让他用心观察和研究工厂工人的生活，火夫头勃鲁易对他的教导是教给工人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斗争，结果他成功的领导了一场罢工。这些是仅仅通过“谈论政治、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行政治鼓动”就可以做到的吗？很明显斯庇利董和勃鲁易都是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革命者，而不是只会夸夸奇谈的空想家。他们找尼基福罗夫时让他加入政治小组，是宣传工作;让他发动斗争是进行更广泛的鼓动工作。这样的鼓动经验显然是从彼得堡那里学过来的。

有些读书读的不深的同志居然能够根据«巴布什金的回忆»和«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利用经济斗争来灌输培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而是先谈论政治，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行政治鼓动，组织大量工人，之后再利用经济斗争扩大影响力。”恰恰是不理解当时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做了大量深入工人工作的背景，不理解工人的实际思想转变的过程，更不了解宣传和鼓动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谈到另外一点，巴布什金和尼基福罗夫以工人身份去做工人工作本身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更能够扛住专制政府的打击，所以巴布什金说工厂的工人损失不大而且很快恢复，而知识分子被打击就元气大伤，好久才恢复过来。

对于这些小资产阶级而言，恰恰提融工路线在知识分子圈子内部的意义是如此重要，因为只有融工才能够打破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身份隔离，在融工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小资立场，真正能够从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使得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路线都在工人中得到检验;另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和工人建立长期深入的联系，加强工人小组急需的系统的理论学习。从而逐渐产生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小组。在结合工人实际生活需要、与斗争结合起来的鼓动中，能够逐渐壮大革命队伍，从而为建党产生真正的组织基础。

不走融工路线，仅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想依靠做外围工作来做工人工作的路线，连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到工人中去”的功力都达不到，连工人小组的基础都没有（也搞不起来），还要再去空谈什么建党、政治报。读书能够读成你们这样，把先进革命先辈的思想历程通过自己的小资立场的偏狭理解成为了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工具，这简直是对革命前辈的侮辱！

第三部分：社评——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分析与批判时事热点

张宝山事件的意义

1 月 24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一名高中生的死因引发了民众的质疑和抗议。官方用专制回应群众，群众则用斗争来回应专制。这场斗争中，除了当地许多群众参与外，全国各地更

是有数千名网友赶来，他们聚集在死者家乡要求官方公开调查结果，并揭露警方的不作为和 隐瞒。这场斗争的结局是失败的，但这次斗争的经验也是极有意义的。
张宝山事件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但就其他方面的意义来说，张宝山事件是自宁陵事件后第二起因学生死亡而造成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也是这类型运动中第二起有大量网民跨地区参与的运动。这两个基本特征说明：一方面，我国部分人民在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学会了把学生的利益和其他一般群众的利益结合了起来，把学生运动和一般群众运动结合了起来（虽然只是最极端的形势下）；而另外一方面，大量网友参与斗争的事实则说明网络成为了推动群众运动发展的有利武器，网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领域，网民也成为了各 地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宝山事件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但就其他方面的意义来说，张宝山事件是自宁陵事件后第二起因学生死亡而造成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也是这类型运动中第二起有大量网民跨地区参与的运动。这两个基本特征说明：一方面，我国部分人民在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学会了把学生的利益和其他一般群众的利益结合了起来，把学生运动和一般群众运动结合了起来（虽然只是最极端的形势下）；而另外一方面，大量网友参与斗争的事实则说明网络成为了推动群众运动发展的有利武器，网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领域，网民也成为了各地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斗争本身

事件中死去的学生叫张新伟， 17 岁，是一名高三学生，即将参加高考。去年 12 月 9 日凌晨，他从一座大桥上跳下，一个月后，他的遗体才被打捞出水。和宁陵事件中的官方回应相似，当地警方称：张新伟是因为个人感情问题跳河自杀，没有发现校园暴力的迹象。但这根本没有得到张新伟父母和其他亲戚的接受。死者家属和网友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学生生前遭到了校园暴力，警方存在失职甚至故意掩盖真相的嫌疑，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向官方提出了七 个问题：

1. 为什么发现尸体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家属知道情况还是从好心人口中得知？
2. 为什么到达现场之后还要阻拦家属？
3. 为什么打捞孩子遗体的时候有数百名警察将家属围起来不让家属看？
4. 为什么打捞上来之后仍不让家属看，难道其中有什么？
5. 为什么打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有锦旗送到某救援队手中，难道是早有准备吗？
6. 为什么孩子舅舅正常停车下车的时候将其带走？
7. 为什么到达殡仪馆之后数百名警察将家属拒之门外，难道是有什么不可以让家属知道的 吗？

张宝山事件中的群众也遇到了和宁陵事件中的群众同样的问题，当统治阶级和暴力机关的言行明显疑点重重的时候他们却根本没有合法有力的追究手段，如果沉默、如果追求合法斗争、 放弃非法斗争那就只能接受各种来自官方的直接侵犯和污蔑的可能。

而我国统治阶级则早已习惯了用专制和流氓手段来对付群众。所以，官方没有对家属和网友的质疑做出回应，反而对提出问题的家属进行了打压。张新伟家属表示，他们在开直播求助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断播；张新伟父亲称他们在通过网络求助的过程中，手机都被陌生人抢 走。甚至有十多名戴口罩的男子在 1 月 19
日晚闯入他们的家中，对他们进行了威胁。

结果，对死者和死者家属的专制引起更广范围内对专制不满的群众的斗争。

我们只需要根据油管、抖音、微博上现成的斗争经历材料就发现它和宁陵事件许多相似的地 方：

首先，张宝山当地警方蛮横专制的处理方式引发一场上的网络舆论风暴，数以万计的网友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上发声，要求公开真相，追究责任。还有一些网友自发前往张新伟 跳河的附近桥上送花，但很快就被当地政府派来的环卫工人清理掉。

从 1 月 20 日起，陆续有网友前往张新伟家所在的灌云县张宝山村，慰问、声援家属，但他们发现，通往张新伟家的道路都被警察封锁，要进入村子，必须出示身份证、驾照。网友们 开始怀疑，张新伟的家人已经被当地政府控制。

1 月 24 日，这场网络运动升级为现实的抗议，来自各地的网友陆续聚集到张新伟家所在的村子门口，希望进入张新伟家中，但遭到警察的阻拦，至少有一名网友被抓捕。中午，到达现场的网友达到数千人，在现场，来自外地的一大批网友们挥舞着国旗，高呼“还张妈妈自由”、“公开真相”、“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等口号，试图冲破警察的封锁，进入村庄，解救出被当地政府控制的张新伟父母。与此同时，大量增援的警察到达现场，拉起人墙，将网友阻拦在村子的入口处，导致该路段交通大堵塞。期间，网友一度与警察发生轻微冲突，一 面国旗被一名警察折断。

而另一小部分网友，通过步行走小路绕过了警察的封锁，成功到达张新伟家，但未见到其家人。有网友通过无人机拍摄的照片发现，张新伟家的院子里，竟然藏匿着一名陌生男子。

傍晚，由于维稳警察不断增多，迫于压力，网友陆续离开现场。当地警方也在当晚发出通告， 要求当地人不得去张宝山围观，也不得留宿外地人。

1 月 25 日，警察在张宝山村周边 20 公里范围设置了多处卡点，禁止外地车辆进入该地区。
大量尝试进入张宝山村的网友遭到拦截，一些提出异议的网友遭到警方约谈。

通过部分网友的试探得知，直至春节时期，张宝山附近依然保留大量的警力在各个关键路口戒备。而直到现在，张新伟父母、姐姐全部失联，张宝山村依旧封查，并禁止一切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

“ 张宝山事件”是继 2023 年“杨大召事件”、“锡场事件”以及“宁陵事件”后，又一起 跨地区的网民联合行动。这些网友基本是 80-00
年代的年轻人，他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 表达观点、组织行动，他们对我国统治阶级的愤恨、不满已经积累了很久，而张新伟的死亡
只是一个导火索，只是他们借以进行斗争，借以维护像死者、死者家属以及和他们一样的被压迫阶级共同利益的突破口。他们通过网络表示：“张新伟这次事件只是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这次赢了，以后他们就不敢这么猖狂，天下的爸爸妈妈，孩子在学校里就有一份安全， 所以家人们一定顶住，不要热度下去……”。

虽然这场斗争依然是自发的斗争，但已经多了许多自觉的因素。斗争的结局虽然是失败的，
但斗争可以使我们学到更多。参与斗争的群众也许还没有“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那样清楚的阶级意识，但他们在认识上、行动上已经和我国的统治阶级进行了相当的斗 争，而这种斗争就包含着促进成长的因素。

正如一个微博群众的言论：“江苏省连云港灌云县张宝山张新伟事件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三观、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太没有天理了，那么优秀的孩子被人家害死了不给人家一个说法还把 父母给人家软禁了让屈服我的国太让人失望了。”

二 总结

就和宁陵事件一样，张宝山事件仍然是自发的斗争。

自发首先体现在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式领导上的。群众的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讨个公道，
没有更明确的和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斗争目的、没有明确的斗争诉求、没有斗争到底的 打算和准备、也没有进行有
计划性斗争的有力组织。这就决定了，斗争很可能会失败、斗争 缺乏继承性、斗争不具彻底的革命性。

群众们就是以这样的条件向政府讨要公道的，但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定不会给他们公道的，因为斗争不够有力量。而斗争体现出的这些不足，恰恰只有革命无产阶级的参与和领导才能彻底的解决。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有斗争到底的觉悟，才有把一切斗争都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现实准备，才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进行每一个具体斗争的素养，才有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给其他社会阶层的彻底意愿，才有把整个斗争严密地组织起来所必备的长期经验和生活习惯。因此，我们应该积极的推动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在尽早把工 人革命事业和我国整个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

但就其他方面的意义来说，张宝山事件是自宁陵事件后第二起因学生死亡而造成的广泛的群 众运动，也是这类型运动中第二起有大量网民跨地区参与的运动。

这两个基本特征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

A 我国部分人民群众在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学会了把学生的利益和其他一般群众的利益结合了起来，把学生运动和一般群众运动结合了起来（虽然只是最极端的形势下）。

在我国部分学生进行学运和其他范畴类的学生斗争的时候，其他群众已经探索出了新的斗争类型，进而把学生和其他群众联系了起来，把学生、家长、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联系在增加每一个具体斗争的力量的同时又保护了各个群体的共同利益，也在更大、更彻底的范围了教育了群众的斗争意识。至此，我国群众就已经发展出了一个新的 群众斗争类型（至少对于我国社会当代来说是这样）。

这首先表明，我国各个受压迫的群体都有共同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形成一整个联盟。同时这也证明，即使在专制的条件下，我国的群众运动也完全该 往跨群体、跨部门联系的方向发展。

同时张宝山事件和宁陵事件表明：一个学生的死亡可以引起上万人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每一个具体压迫事例都可以唤起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广泛斗争，每一个不幸都能成为整个阶级进行 阶级斗争的突破口。

而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后的学生工作、群众工作中注意地方，我们在未来组织工作中和可 能遇到类似的斗争时候要有意识的这么改善斗争。

B 而另外一方面，大量网友参与斗争的事实则说明网络成为了推动群众运动发展的有利武器，网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领域，网民也成为了各地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对交通工具、交流工具的巨大改善使得网络在最近的时代成为了我国人民群众的重要生活内容和生活手段，网络是我国整个政治、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因此网络就发展出了新的范畴的斗争，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对网络也的专制，当我国的幼年左翼运动还在由于专制故而在网络进行在一些微不足道的领域内活动时，我国群众已经在大踏步的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网络中更广泛领域内的斗争了。所以群众在现实斗争中，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也必要把线下斗争和网络斗争通过最广泛的方式结合起来，使力量变得极其强大。不得不说，我国群众是有勇气、有毅力、懂得团结大多数力量的，他们只是还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的理论、自觉进行整个斗争的关键 力量和必要的组织武器。

因此，及时我们在未来要重点开展线下工作、开展工人工作，但同时我们仍然不能放弃线上工作，在线上工作上，我们未来也要把群众工作的方面做好。同时，对于积极进行线下斗争的群众和网上积极的网民我们也要用安全和恰当组织起来，我们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 使他们更好的进行斗争、并引导他们更进一步。

什么样的社会创造了凶手？

最近河北邯郸的惨剧震惊了全中国，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如此恶劣的暴行居然是三个初中生干 出的。在众多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人出于本能的正义感都在呼吁严惩凶手；资产 阶级的诉棍们则只是冷漠的告诉我们这些凶手在先行法律框架下最多只会被判几年；还有一 部分有正义感的人剑指法律体系，认为必须要让法律声张正义。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反复诉说资产阶级的法律有多么虚伪。毕竟现在人人都知道法律在面 对烂尾楼业主的时候只会维护银行的资本；在面对成千上万因为反人类学校制度而消逝的青 年时，法律压根就不存在。在这里，我们主要应该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把人变成了鬼？把 孩子变成了杀手。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在邯郸发生的恶劣杀人事件绝不是孤例，这次事件的几个凶 手皆为留守儿童，根据 2019 年“共青团”的数据，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高达 17%。根据最高 检察院的数据，2020 到 2022 年，14 至 16 周岁（本次邯郸事件的几名凶手就在这个年龄 段）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年年上升，2022 年受理审查逮捕、受理审查起诉人数较 2020 年分 别上升了 30.2%和 42.8%。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犯的抢劫罪和强奸罪等重罪。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那些孩子们之所以犯下暴行，是因为他们生性邪恶。我们非常清 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伟大的创新就在于证明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 的本质”（这种观念源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宗教和超验哲学）。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在分析 任何具体的人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在分析造成这个人做出某些特定的各种行为实践的原因。

而这些原因一定是由一定客观环境造成的。换言之，归根结底，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具体 的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被认为是人的本质。在中国中部，特别是华北内陆地区，由于 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入大城市打工（有些资产阶级评论家认为可以依靠视频等技术手段解决留 守儿童问题，但是那些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12 小时乃至 14 小时，他们压根就没有任何时 间陪伴孩子成长），直接导致了大量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根据 2023 年 8 月的统计数据， 那怕在 2023 年，据保守估计，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就有 1550.56 万人；而根据 2020 年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 （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达 1.38 亿，占中国儿童总数的 46.4%，流动儿童规模达 7109 万人， 留守儿童总数高达 6693 万人。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还是给了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机 会的，但实际上对那些孩子们而言资产阶级指出的那条读书“改变命运”的”正道”从一开 始是毫无希望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垄断，教育资源也只是集中于一些大城市，这导致 绝大多数地区的教育资源异常贫瘠，所以那些孩子们即使想要好好读书也几乎不可能真正改 善自身状况。

结果就是，这些留守儿童既得不到父母的管教（当然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并不是在鼓吹家庭秩 序，我们这里只是描述客观实际），也不会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与驯 化。他们只会漫无目的将时间浪费在网络世界中，将精力浪费通常没有结果的恋爱以及滥交 上。当然还有不少人会成为“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不过相比起每年九百名因涉嫌毒 品被捕的孩子而言，酗酒或许也没什么大不了。

显然，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正在向流氓无产者发展，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符合（或者是潜在的 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流氓无产者的定义。在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当中，他谈到了资产阶级从无产者阶级当中组建其在巴黎的临时军的做法，其专 注对象就是那些流氓无产阶级，“流

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 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专靠社会餐桌（应当尤指 资产阶级的）上的残羹剩屑生活…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保持着拉查罗尼（原指一种 意大利流氓无产者农民，代指不务正业的、投机的、总可被反动派利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 特点”，而且他们总会是不过二十五岁的年青流氓无产者（而一定的社会进步与集体运动可 使之现代无产阶级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孩子们由于其年龄较小，使得他们并不能像真的流氓无产者那样 掌握那么多的社会联系和物质手段，所以他们还只是流氓无产者的后备军。

诚然，官方也在打击包括这些孩子在内的流氓无产者集团，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从本质上讲 绝不是他们说所的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不排除部分服务于官方的个人真诚地怀抱着为人民 服务的理想），而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准确地说是为了为资本主义社会再 生产以及阶级再生产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流氓无产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 理想的那种绝对稳定环境的一种消极否定。但很遗憾，我们的资产阶级朋友恐怕并不能如愿 实现一个“绝对纯洁”的社会。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自己，为了不断获取更多的利润，迫使工 人们每天干 12 个小时的活。而资产阶级提供给工人的那点工作（在许多“先进的”国际大 都市也不过 4000 块一个月），以及极为反人类的歧视性户籍政策，和天价住房，也使得一 般中国工人难以将孩子安置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几十年的 发展，不但导致劳动者和生产关系分离，还导致劳动者与自己后代分离。而在现有社会秩序 下，这种分离构成了不断形成流氓无产者的基础，以及相应的各种青少年犯罪的基础。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会断崖式下跌了，毕竟对于无产者而言，与 其让孩子生下了受苦，让自己背上沉重的经济&道德双重负担，还不如不让孩子降生。

总而言之，目前的中国各种青年犯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龄化问题，中部空心化问题和 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问题没有一个是孤立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和中国垄断资本这几十年来血 腥的扩张息息相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宏观的意义上讲，发生在邯郸的事情，其实 是整个社会性的悲剧，是垄断资本对于全体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系统性的劫掠与谋杀的一个缩 影，我们强烈谴责统治阶级为中饱私囊，强行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分离劳动者及其子女， 并将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抛弃到非常容易成为罪犯的环境中；我们还要谴责资产阶级事后利 用所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借口，让许多严重的罪犯人间逍遥，并接着舆论分化群众 ， 制造内斗的恶劣勾当。但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只满足于要求严惩罪犯，或 者修改虚伪的限行法律。当然，社会上要求严惩罪犯，声张正义的呼声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使大量劳动者提出诉求，但说到底这还是在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我们如果要为产业无 产者为首的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张目，要对整个既有秩序进行积极否定（是的，马列毛主义运 动同样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但我们是为了让人类社会进步，而对资本主义进行 的积极否定），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团结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去争取各种能够改善工人生活 的权益。在这种有组织斗争的道路上，我们如果能首先争取到落实《劳动法》，那就算是非 常重大的胜利了。唯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人的子女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既不被别人欺负， 又不去欺负别人。（其实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并没有成为留守儿童，而是成了被欺负，又毫无 还手之力的可怜孩子）。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是可以改变流氓无产者的，这从理论上讲当然没有错，但在实际上，这并 不在可见的日程表上。归根到底，流氓无产者毕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产物，只要资 本主义还在，他们就不可能被大范围改造，何况我们目前即使是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都还刚 刚起步，去改造流氓无产者，这个社会中最消极腐化，而且相当程度上并不属于劳动人民的 成分实在是太遥远了。当然，我们完全不排除他们有可能在革命高潮时被裹挟着前进，但这 种人人都知道，而且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就没必要再展开了。真正想要尽可能缩减流氓无产者 对运动的负面影响，只能是在斗争中塑造强大的群众组织力量，来应对包括流氓无产者和统 治阶级在内的各种反动势力。但是靠合法途径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在佳士事件破产以后 就基本没有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接下来再展开就实在是太远了。

第四部分：理论文章——无产阶级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列毛主义

当代中国帝国主义分析

在中国的“左圈”中曾经有过这样一场争论：当代的中国到底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什么“半外围”国家、“二流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国家。不难看出，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更重要的问题：对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关乎着革命的性质、目标、道路。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本文意图从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出发，列举数据表明当代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符合帝国

主义的定义，展现中修帝国主义在近些年的扩张，揭露其丑恶嘴脸，并对一些持“半外围”论调的人予以回击。

我们都知道，列宁同志在其不朽的名著《帝国主义论》中，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在这本书中，列宁同志写道：“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可以说，列宁同志的论断到了今天仍然没有过时，至多是一些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如公开的、露骨的直接殖民主义被较为“温情”的、软性的新殖民主义所取代，“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1]但“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没有变，垄断资本、金融寡头

首先我们来看当代中国资本的垄断程度。

列宁同志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产业上的垄断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今日中国的垄断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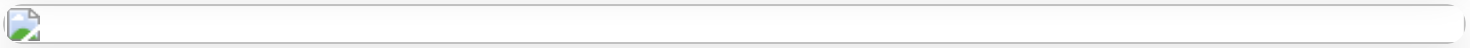
我们先来看几个列宁列举的反映垄断程度的例子：“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
”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的统计结果，我国工业单位总数为3450649个，营业收入为1185269.9亿元，从业人员有11521.5万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374964个，占到工业企业总数的10.8%，但其营收却占据了所有企业89.2%、资产占到了82%、员工总数占到了72.5%。而“规模以上企业”的标准是其主营业务营收超过2000万，这样的企业显然已经不算小了，至少比列宁口中说的“雇佣工人人数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大得多，中国工业的垄断程度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那些雇佣工人人数超过300人的中、大型企业（标准参照2017年《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仅仅占到了工业企业总数的1.4%，其营收却占据了全部企业的59.2%，这样的集中垄断程度，甚至超过了列宁时代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正是“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此外，2020年《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有124家企业入榜（不含台湾地区企业），首次超越美国的121家，可见中国垄断资本的实力之强，在世界上也属于领先地位。尽管在2023年《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企业数量首次出现下降，有135家企业上榜（不含台湾地区企业），比2022年少了一家，但也仍然仅次于美国的136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2023年中国上榜的135家企业中有97家是国企，其中光是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央企就有47家，剩下的还有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地方国企，以及财政部出资的企业，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企业事实上都直接受到中帝官僚集团的控制，这是通常互相之间独立运营的美、欧、日资本集团所难以比拟的。这种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经济实力实际上超越了欧美日的任何单一企业、公司乃至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可以说，中国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综合实力是世界罕有的，不能说是后无来者，至少说是前无古人。红中网的远航一号先生曾经拿实行“新国家体制”的巴西瓦加斯政权、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赫鲁政权、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埃及纳赛尔政权这些国家的国有垄断程度也很高来反驳“中帝论”，但是，这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权有能力对外输出吗？他们的垄断资本集团在国际上又居于何种地位呢？和当代的中帝官僚资本集团相比，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来看看当代中国金融资本的现状：





2022年，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六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合计就有164.11万亿元，占到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51.21%；实现净利润1.36万亿元，占到了总利润的58.96%。而中国的民营银行至今仅有19家，截至2022年年底，其总资产也不过1.78万亿元，不过是“六大行”的1%多一点，更不用说其他指标了。显然，国有银行在全方位的实力都要强过民营银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金融领域，国有银行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其中最大的几个银行几乎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以国有银行为首，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并且实际上中国的所有大型国有银行几乎都是直属央行和财政部的，其股权又牢牢被中央汇金公司、中投总公司所持有。所以说，别看表面上银行有这么多家，实际上绝大部分都受到官僚资本集团的直接掌控。可以说，中国的金融垄断程度也是非常高的。而这种金融垄断又是以官僚集团的行政命令为基础的。

那么中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没有紧密的结合呢？答案自然是有的。虽然中国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禁止投资非金融企业[1]，但是政府却鼓励非金融企业参股商业银行，在2013
年底，参股银行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就已经有470
余家。这样的“产融”结合当然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成利益的共同体。此外，中国的产业资本还积极涉足金融领域，如作为粮油领域最大的央企的中粮集团就涉足了期货、信托、股权基金、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并战略入股了龙江银行。还有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京东的京东金融、腾讯的腾讯金融科技等大型民营企业试图涉足金融领域。不过，中帝统治集团最近已经收紧了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名义上自然是为了金融安全云云。实际上呢？P2P暴雷不正是统治集团政策的后果吗？“原油宝”的条款违反多条金融规定，为什么能名正言顺的大举吸纳资金指导暴雷呢？河南村镇银行的背后又是谁呢？归根结底，这套管制措施也是“管上不管下”，官僚集团对金融资本有着绝对的控制力，金融领域是官僚集团权力变现，攫取财富的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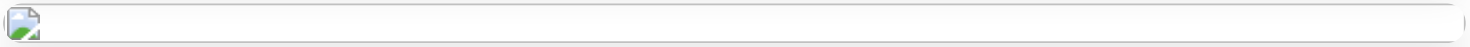
我们来看看当代中国对外资本扩张的现状：

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过去20年里，中国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目前，在该地区的全部货物出口中，有五分之一流向中国。该地区对中国出口的约五分之三都是金属、矿产品和燃料，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非洲国家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向非洲国家供应工业制成品和机器设备。这样的贸易结构的背后，不正是中帝国主义掠夺原材料，输出商品的体现么？



自中修完成复辟资本主义、深度参与全球资本市场、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也成为非洲各国政府的主要融资来源。00年代后期，中国对该地区的贷款（主要用于修筑基础设施）迅速增加。因此，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05年之前的不到2%上升到2021年的17%左右。这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但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贷款常常施加了相当苛刻的条件，且经常要求自然资源作为抵押——这和百年前的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借款又有多少区别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国家最大的双边官方贷款国，超过了美英法等一众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当然，以私人公司为名义的商业债务并不包括在内，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帝在非洲势力扩展的迅猛。2006年以来，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增加，从2006年的几近于无到2021年占该地区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3%左右（约30亿美元）。当然，由于中国的投资只是在近期才快速增长，其投资存量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小，2021年约为4.4%，资金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和采矿业，虽说仍比不上英、美的百年经营，但其资本输出的势头已经显露无疑。不过，自2017年以后，中帝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和贷款都有所缩减。如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宣布首次削减对非洲的资金支持，三年内从600亿美元减少到400亿美元，尽管其中减少的100亿是由直接的对基础设施的融资转换为各种形式的贷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对于掠夺原材料的需求略有下降，而非洲各国又在长期的帝国主义剥削下背负着承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中帝的金融资本缺乏输出的意愿，最终导致这一阶段中帝的资本输出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帝在非洲放缓了争霸的脚步，实际上，中国凭借着在非洲各国公共债务中的庞大占比，在一系列债务重组和缓债谈判中都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不难推断出中帝能凭借其经济优势地位来达成对非洲国家经济上的控制，乃至政治上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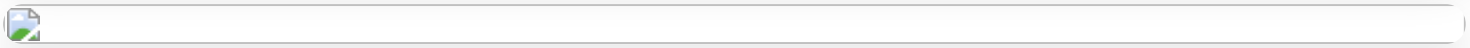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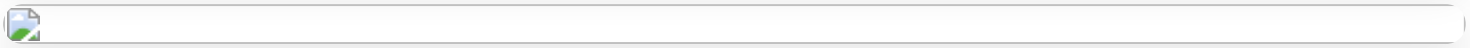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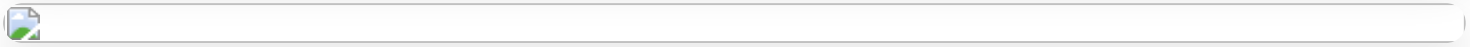
我们又来看中帝所谓“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地区中亚。自2013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说法后，中国开始加大对中亚地区的商品输出力度。同时采取直接投资、提供贷款等方式提升其经济影响力。可以说中帝在中亚的影响力的确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占中亚进口、出口的份额都逐步提升到20%以上；中

亚诸国都欠下了巨额债务，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有约40%和50%的公共债务来自中国，而更多的隐性债务难以计算。自2008至2023年期间，中国在中亚拨款近360亿美元用于能源互联互通项目、约410亿美元用于矿产和石油勘探开采项目，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着中国资本去攫取开发中亚庞大的油气资源，尤其在土库曼斯坦，中国已经成为土库曼斯坦油气资源的最大买家，超过了在这里有着传统影响力的俄帝。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普遍由前苏修官僚、新贵寡头掌握政权，贪污腐败横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中帝的投资、“援助”往往被统治阶级侵吞，加之帝国主义竞争中其他对手的有意利用（不仅美帝，甚至俄帝也对中帝在中亚的扩张保持警惕），这就不能不使得中亚人民涌现出反对中帝的情绪。此外，俄帝在中亚的传统经济影响力始终没有被中国超越，欧盟资本在中亚也仍然总量居于第一，“一带一路”战略推行到现在，中国的商品输出并未有显著的进步，近几年直接的投资甚至略有衰退。看来，中帝在中亚的帝国主义扩张有所进展，但仍然受到严重的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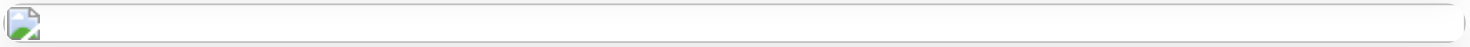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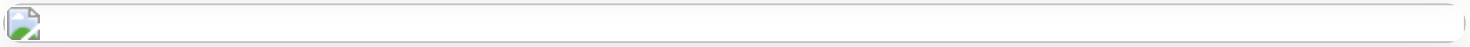
再来看中帝在拉丁美洲的扩张：2022年，拉美地区与中国贸易额再创新高。拉美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1840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2650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占该地区GDP的1.4%，连续两年创下新高。虽然拉美在中国市场的几类核心大宗商品（包括铁、铜和牛肉）份额持续增长，但其购买中国商品的速度增速更快。过去20年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规模暴增了26倍，中帝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冲击了欧美传统列强对当地的控制。例如，2001年，智利、秘鲁和巴西主要都向欧盟出口，但到2021年中国成为了其第一大出口国。不过，中国在拉美的地位远未达到独占的地步，拉美国家往往在中国作为其第一大出口国时与美、欧也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中国资本也在拉美攻城略地：南美的秘鲁首钢、阿根廷货运铁路、首都地铁更新、大水电站巴拿马铜矿以及港口、地铁。中国收购智利桑普拉能源发电站，以及巴西最大私营电力企业CPFL公司54.64%的股权，甚至租地签约大规模种植农作物。此外，从委内瑞拉港口重建、厄瓜多尔公路建设，到巴拿马运河大桥、科隆港口、发电站，到处是中国资本的身影。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也从2000年的排不上号到了今天的位居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明显减少，但2022年开始中帝加紧了对拉美地区资源采掘业的资本输出，连续收购了多家锂矿，中帝意图在新能源领域垄断原料的列强争霸意图明显。此外，尽管在疫情期间中国放缓了在拉美的资本输出，但拉美各国对中国的金融依附却日益增加，如厄瓜多尔、苏里南等国因对中国欠下大量债务就被中国主导了债务重组。可以说，美帝批判中帝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并非空谈——这不正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玩弄的老伎俩么？当然，美帝这么说不会是为了拉美各国人民出头，但其抛下帝国主义各国的心照不宣而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帝的行为也暴露出两国争霸的形势趋于白热化。总而言之，中帝在拉美这个“美帝的后花园”的扩张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这一区域的争霸意图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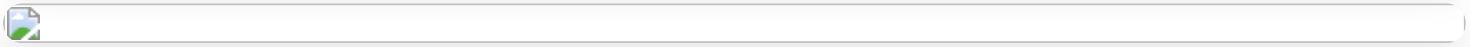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3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万亿美元，年末存量39.9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0.9%和
6.9%，流量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二位，存量列第三位。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中帝近几十年来其资本扩张速度、资本扩张规模都是世所罕见的，尽管疫情几年来投资份额有所缩减。但总体而言，中帝近年来对外投资流量仅逊色于美帝，对外投资存量仅逊色于美、荷——而荷兰的对外投资存量又有绝大部分是各国资本为逃税而在荷兰设立的皮包公司/“特殊金融机构”贡献的。所以，实际上中帝对外输出的程度仅次于美帝，远远超过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这正应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的论断，中帝的高速崛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衰弱，疫情以来中帝发展脚步的放缓，都说明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而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速扩张、积极进行争霸的帝国主义新兴国家，再蒙上眼睛谈什么“半外围”的陈词滥调，只能说是非蠢即坏。

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上述六项行业占据了当年投资的8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首位，制造业由上年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而在2020年，投资超过百亿美元的还只有商务租赁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这四个行业，可见中帝的投资并不局限在某一领域，而是愈发的多元化，交错成网。

为了加速对外资本输出的扩张，中帝还鼓励其境内的私人资本向外扩张，2022年的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塞里斯私人资本对外投资709.4亿美元，占50.3%，同比增长1.5%;赛里斯的官僚资本对外投资706.9亿美元，占49.7%，下降14.7%。可见，私人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在对外扩张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在帝国主义争霸扩张的层面上说，私人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不仅没有矛盾，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同盟军。

红中网的一些先生们曾说：“我们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订下这样一个定量门槛：第一，其在国外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要大于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即帝国主义性质的海外资产约为
5766 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约为
9493亿美元，外国在华的帝国主义资产远超过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所以，中国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事情果真如此吗？首先，这位先生的数据似乎不甚精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6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13573.9亿美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存量似乎也远远超出这位先生给出的数据。不过，我们姑且抛开数据问题不谈，让我们回到这位先生的结论上来：其在国外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要大于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才算帝国主义国家。看起来似乎颇具几分道理，可是我们一旦把现实世界的数据套上来，就让人哑然失笑了：2022年底，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10.4万亿美元，而202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8万亿美元左右——原来红中网说的“美帝”也是一个半外围国家！英国呢，2022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2.70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2.2万亿美元，看来，也是一个“半外围”国家，没想到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强权，现在竟然当买办了。当然，中国2022年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3.82万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2.7万亿美元，自然上不了这位先生“帝国主义”的标准，不过，考虑到疫情结束后中国对外投资的回升和2023年开始的外国在华投资负增长，看来中国迈向“帝国主义”倒是指日可待，美英等半外围国家则难有机会了。那么帝国主义到底在哪呢？2022年，荷兰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2.68万亿美元，对外直接存量则是3.2万亿美元左右，原来，荷兰才是残酷剥削英美半外围国家的帝国主义强国！读到这里，相信读者也已经了解到了这位红中网先生的逻辑的荒谬之处了。

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时代，沙俄尚且有着庞大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其工业实力、资本输出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北美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在俄资本显然比俄国在英法的资本多得多，甚至可以说俄国的工业发展深度依赖于英、法的资本，那么俄国就是“半外围国家”吗？俄国革命中应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斗争“买办”吗？（或者按红中网在明面上的说法：幸好俄国是个半外围国家，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力量对比永远都不利于工人，便也永远也没法革命了）。但在列宁那里，他就从来把沙俄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革命前途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此外，二战前的日本（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甚至说日本是“无产阶级民族”，要打破“资产阶级民族”，这跟今天中国形形色色的“入关学”、法西斯主义者是多么相似！），一战战败后的德国，也都曾经对欧美垄断资本存在一定依附性，“对外输出”少过他国投资，但这影响其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吗？可见，红中网认为当代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正如赤眉同志在《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分歧》一文中所说：“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从来不否认帝国主义内部也有强弱之分。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掌握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定依附性，但这种依附性并不否定其本身的帝国主义性质。因为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进行资本输出，也争夺世界市场，也压迫剥削被压迫民族人民——在根本上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并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他们之间是黑社会小头目和黑社会老大的关系——他们根本上都是黑社会——而不是普通群众和黑社会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冲突、有竞争、有合作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常态”，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应该给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去选出“更进步”的一方。

最后，我们来看一些中帝海外扩张的实例：

2017年1月7日，大批斯里兰卡民众抗议政府将港口及临港土地交由中国企业运营，并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警方则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炮还击。包括3名警察在内的至少21人在冲突中受伤，52名示威者被捕。冲突的起因是，斯里兰卡政府拟将该国南部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全部交由中国企业运营，并把临港土地交由中方开发建设产业园。租期为99年。

冲突发生时，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正在出席该产业园的开工仪式。

2017年12月，由于斯里兰卡无力偿还债务，根据一份有效期长达99年的租约，斯里兰卡正式将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

2018年9月5日，斯里兰卡的数万名抗议者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带领下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租期“99年”，作为中国人，想必大家对这个数字都并不陌生，历史上，德、英、法等国正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了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99年的。所谓“99年期限”本身是欧洲不动产租赁的最长时间，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赋予了“99年期限”强取豪夺的色彩，使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蒙受民族屈辱。亚非拉很多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受过这样的待遇，因此对此也非常敏感。讽刺的是，经受过这样屈辱的中国却在一系列大型海外投资项目中使用这样的租期。尽管中帝政权的吹鼓手努力“澄清”说这符合国际法的准则，是完全公平的交易，但可别忘了，百年前的西方列强在清政府面前不也是一副“遵守国际公法”的嘴脸吗？只不过硬性的逼迫式的条约变成了“柔和”的债务陷阱罢了。在吉布提的租期99年的军事基地究竟和美帝在全球各地广布的军事基地又有什么区别呢？帝国主义行径，可见一斑。

2023年初，在印尼的一个中资镍矿厂，两位工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一名是印尼工人，另一名是中国工人。这起事件大多被媒体描述为工人暴动产生的悲剧，出资的德龙公司则声称这是印尼工人的反华行动。这个厂里有从中国招聘的中国籍工人，也有在印尼招聘的本地工人，但他们“享有”的是同样的低工资、无安全保障、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有管理人员的打骂、扣工资。工人们在冶炼炉爆炸中死亡、在高空坠落死亡、在传送带中被夹死、在绝望中自杀……还有更多的工人持续遭受污染的折磨、被拖欠工资的痛苦，公司为了追求利润，不给工人发工作服，迫使工人穿着牛仔裤和凉鞋上班。印尼人的工会站出来要求公司保障工作安全、改善工作环境，公司的管理层却告诉中国工人：“印尼人发动了排华暴动，你们快去保卫公司的财产”，于是，无辜的工友逝去了，工人阶级的营垒分裂了，老板的产业安全了。最后，印尼警方逮捕了罢工的参与者，一切尘埃落定。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镍加工工业区定为“国家重点对象”，并将其列为国家战略项目，以确保投资生产的安全。工人的抗议或与当地的纠纷被视为“威胁”而予以重拳出击。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资本扩张受益的只能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各国的统治阶级，而使得中国和当地的无产阶级陷入悲惨的境地。

根据以上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的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中国的金融资本高度垄断且和产业资本紧密融合，中国已经对外进行了大规模资本输出，积极参与争霸，因此，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1.九评（其四）新殖民主义的辩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农村家庭的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问题

编者按：1.该文章的作者利用假期时间走访中国乡村进行调查，从中作者看到了一种与大银幕上“ 家和万事兴”
截然相反的农村家庭伤痕文学。熟悉中国历史的应该有所了解，中国的“ 土改” 和“ 土革” 是当代庞大小农家庭形成的基础，而“ 改开”
则是中国小农经济在中国复苏的关键阶段。第一次土地制度的重大革新为中国人口再生产创造优势，而第二次的修正则是为中国家庭如今的逆转埋下了根。

2.家庭通常被渲染成人们精神上的港湾和物质上的靠山，而如今这种印象则被慢慢重构，传统家庭本身作为私有制的伴身物，有其历史性，必然会顺着时代而被再次塑造。

一.家庭关系

目前笔者观察到的农村家庭关系基本为3-4代组成一个小型家庭，一部分地区的小型家庭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成一个比较大但是松散的小家庭联盟。一般情况下都是20-40岁左右的壮劳力外出打工。家庭中只有还在上学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留守，而这些人在家庭关系里实际上是被压迫的一方——由于无法提供收入，他们的收入基本来自于壮劳力（一般是父母亲），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被压迫者。以笔者访谈的一位对象（以下简称Y）为例，在上学的时候他只能依赖于家中来动力的收入来源来维持生活以及学费，作为妥协，他自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学业来维持自己一个相对压迫不那么严重的地位。Y后来前往中职学习厨师，有了劳动换取报酬的能力。
当之前处于被压迫地位家庭成员有了劳动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时候，那么此时的压迫关系就会变得很微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此时一般会被尽快驱逐出原来的家庭，被迫建立自己的家庭（常见的催婚）。Y目前并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想法。

二.经济基础

目前的农村家庭关系都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的。农民一般通过耕种自己的土地获得收入来源。笔者目前不了解资本下乡的具体情况，但是从比较长期的观察以及交谈中得知资本下乡目前在当地是比较失败的，除了一部分作为特例宣传的其余基本延续着改革开放后的小农经济模式。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扩大剪刀差的需要，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员。随着近期经济危机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工资都出现了停滞甚至下调。

笔者只找到了2022年所在省份的一部分收入，而且表中只统计了非私有企业的收入。





表中看似收入蒸蒸日上，然而笔者所在的城市私营企业占据比例高达60%，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是根本没有达到表中的平均。以Y为例，他自己承认在春节期间加班并且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加班工资。Y同时还承认了自己开始工作的非常认真，却被老板在企业内评价为“最差”，与一些消极怠工的同事一起几乎只有底薪（3000块人民币）；同时Y也承认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希望能等公司主动开除他，自己不仅能休息，有机会还能去劳动局举报，有更多的工资到手。

三. 文革时期对家庭制度的改造

早在三大改造的时候，教员就预见到改造旧家庭的必要性。于是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农村就是合作社的形式，将家庭这一私有制的基础开始打碎。到了文革时期，在原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又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改造。人民公社制度得到了加强，家庭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结合的产物。农民和工人分别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和单位）里互相联合起来，原先的家庭私有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原本的个人联合起来，工、农、商、学、兵在这个社会中分别发挥作用，又互相联合，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此时的家庭早就失去了私有制的细胞的作用，成为了仅仅是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

四. 如何改造今天的家庭

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原先的无产阶级联合的社会已经被打散。虽然目前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先从改造自己的家庭开始，把自己的家庭从一个私有制的经济联合改造成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教员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结婚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二人没有互相给对方任何的彩礼和嫁妆，都是互相结合后一起从事工作，同时也一起参与到革命组织中，成为了同志。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虽然不可能会让伴侣也成为一起革命的同志，但是可以互相拒绝一切形式的彩礼、嫁妆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可以在互相的工作中一点点地改造思想。至少在面对地下工作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会因为家庭关系遇上困难。

***人民公社通过社会化抚养改造私有制的家庭* 关系**：

家庭作为私有制的象征，它是私有制社会下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将人们从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解放，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从而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原始概念中的“家庭”也会在这种改造中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化抚养来完成人口再生产。

而人民公社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化抚养”的伟大尝试，人民公社，初心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从根上解决农村治理问题，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进而解决历史周期问题。而这种模式在20年来，在工业积累、水利建设、公共医疗、文化教育、集体企业、民生工程、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

在医疗卫生方面。1969 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 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 1978
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 82% 的生产大队建立 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
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 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

当各地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有一定经济积累后，便为后来农村发展医疗合作社提供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后10年，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在全国90%的农村建立了农村医疗合作社，有近500余万赤脚医生在服务，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
传染病被消灭。1977 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 66 岁，比 1949 年 提高了 31 岁。

这种庞大而健全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给农民带来基本医疗保障，值得称道的是，农民医疗支出的压力很小。因为当时农村医疗合作社，建立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基础上，通过集体资金补贴方式实现医疗合作社持续运营。农村基层卫生员“赤脚医生”，也是依附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上，才得于生存发展。

毛时代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成为世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解决医疗卫生的成功样板，曾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

在教育方面：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扫盲运动，取得巨大成绩。1966至1976年间，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突飞猛进，构建了日趋完善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三级布局，覆盖全国80%以上的乡村，基本做到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

根据教育部统计：1965年中学只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1976年，普通初中学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

在新增长的学校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学校，这一切受益于毛主席对中国教育的革新，同时也得益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经济上支撑了农村教育事业进步。

人民公社体制，或许不尽完美，但他具有许多优越性。在集中力量做大事时，也提供各种福利保障，降低农民生活总成本，不同程度地上照顾了老、弱、孤、寡、残的社员，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障。没有留守儿童，没有空巢老人，做到了社会化抚养。

五．对马前卒（社会化抚养）的批判

提到社会化抚养，想必会有人联想到前些年出自b站著名社论博主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一论，仔细想想，笔者还是需要将此论与上文的“社会化抚养”做出一个区分。





马前卒（原名：任冲昊）所提出的社会化抚养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动力不多，新增人口少，人口结构异常；加之房价高，教育难，看病难等问题增加了当代人各方面的生活成本，使得新生人口无法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高中生，大学生在体育方面如山体崩塌，抑郁症、自闭症、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更加地普遍地存在于当地青少年群体中，所以“人口危机”一论那时便是甚嚣尘上。于是马前卒苦思良久的，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社会化抚养就出现在公共视野：

1. 基本服务上，以政府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节约总投入
2. 在参与方式上，自愿进出和强制参与结合，和刺激生育愿望，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保证未来人口质量的下限。
3. 数据监管，解决公立机构的工作风险的问题，让人民建立社会化抚养的信任。
4. 保险托底，免除教师的担心，刺激社会化抚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5. 家校联动，接触抚养压力，给亲戚更大的发育空间。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国家机关公信力托底让政府一碗水端平的，目的在于减少家庭教育成本、提高“人口质量”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意见。

> 第一：所谓“人口问题”的实质

从实际上看，中国到底有没有面临着这样的“人口危机”？总所周知，如今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城乡之间的劳务流动依旧巨大，但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按照马前卒对于目前人口结构的看法和估计：越来越少的青壮年劳动力将会让社会因为这异常的人口结构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社会的养老问题也会愈加困难。但如今无比戏剧化的一点却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面临“不足”却首先出现了“过剩”，而政府的养老福利方面的支出却在劳动力依旧庞大的情况下率先出现了财政赤字，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维权事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前卒会习惯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是说社会问题的源头归结于一种相当形而上的机械指标，它可以是工业党所追捧的抽象现代化形式，也可以是建制派大肆吹捧的城投基建，又可以是这里他所提出的“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质量”。

中国的所谓“人口问题”首先不是当今“大失业”、“大裁员”、“大降薪“等阻碍劳动力再生产的罪魁祸首，其次导致这一“人口问题”的根源本质上还是目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恶果—它是被专家教授归结于新一代的叛逆（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但却是和全老百姓毫无相关的罪责。

现在谁才是最在乎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那一批人？就是那些靠房地产、土地财政敛财的开发商和官僚集团。房屋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刚需”却被他们当作投机的工具，房屋被大量商品化后价格便水涨船高，首先被投入大量资金的城建行业会带动建材、家居的需求端，从而消耗掉过剩产能，接着房地产所辐射的教培、零售等行业也会被带动，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者会首先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而被获得更多的薪水和发展机遇，超发的通货也会因为这些人的消费而广泛流通从而造成全社会的通胀。

这就像是一种对未来疯狂透支债务的行为，这些债务被转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等到新生一代面临着天价的房价等一系列过高的生活成本时便会望而却步，慢慢地便放弃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打算，房屋便

会慢慢地不再是刚需，被城建所带动的产业会因为房地产的衰落而没落，地方政府也会大量减少财政的来源。

因此，与其说中国面临着“人口危机”，倒不如说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土地财政危机，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集团面临的利益危机。

> 第二.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马前卒着眼解决的“人口危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利益危机，只不过马前卒之流把广大老百姓绑架过来，再粉饰一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戏码，让广大老百姓为达官显贵的利益着想罢了。

所以显然，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广大人民利益上的“谏策”。为了细致地辨别这种冠之以福利之名谎言，我们还需要再做详细讨论

首先，笔者需要在此提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工资”，另一个是“福利”，但是都是需要再加一个定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是维持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足够填补一个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成本、用于教育和技能培养的成本、以及抚养下一代并支撑下一代生活资料供给与教育培养的成本。

对于一个从事普通体力劳动力的工人而言，他原本成长所需的再生产成本低—吃住所需也许就是廉价的出租屋和白面淡汤，教育方面不少是读了初中就出来打工，而在于生儿育女方面的需求更不必多谈；而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白领则有些不一样—从小到大的吃住质量必须得足够支撑他受长久教育的需求，教育方面付出的资金从小学到大学再到额外技能培训都是天文数字，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不得以背负起巨大的债务勒紧肚子过日子，这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在培养上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财力会比一般的体力工人高出许多，从一般市场的逻辑看，这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会更大，从而促使巨大的脑体力劳动差距。

而资本主义下的福利则是国家机器将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与压力以税收—再分配的方式平摊到整个社会中。当代社会福利从一方面来看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看却是让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助推。

工资、福利，在当下是维持劳动力（人口）再生产的必要。可是如今劳动者必然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日渐入不敷出的窘境，被征收的间接税款会因为消费降级等经济下行的现象而日益走低。就算上位者都是青天大老爷，就算纳税人的钱没有被贪取一分一毫，政府财政能支撑起来的社会化福利都会相当薄弱，捉襟见肘。

因而，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事业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市场而做出商业化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各种各样“助学贷款”、“商业慈善”等等最终会将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形式工程。

如此状况下推出的“社会化抚养”，能不办成临沂网戒中心之流的网瘾学校，都是各位祖坟冒青烟了。

> 第三.社会化抚养的目的：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

上文提到，马前卒会把社会的兴衰与一个国家人口状况挂钩，而对当前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则会从当下原子化的家庭单位去着手。

“……00后出生的一代人往往是独生子，但是他们的父辈往往都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待到00后长大之时，他们只能一个人去承担家庭的养老问题……”

类似的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有着这类主张的人通常会把这个问题延伸至全社会，于是有了一种极端的猜想“假设几十年后，青壮年劳动力只有3亿，而他们却要承担比他们数量高出几倍的老人的养老成本”。

把社会福利问题当作简单的人口问题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如今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哪怕债台高筑却依旧维持着国内的福利水平，去维持本国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去调和阶级矛盾让他们原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可持续性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压榨了百姓的油水，却把大量的外汇用于对外扩张，海外援助等工程，对内不会做出一点民生改善。

所以，社会化抚养不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一个很典型的“钱往哪里花”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更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化抚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重点是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如果社会化抚养是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为目的，毫不留情地讲这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劳动力再生产计划，马前卒之流总是拿出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背书，将社会资源分配围绕抽象的“人口”问题去讨论，从而掩盖背后真正的阶级矛盾。

往长远的讲，人类生产力会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放到更高级的阶段，在如此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哪怕社会上只有1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可以养活比他们多出几十倍的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传统的小农家庭也不断受到改造。“ 分田单干”之后农民虽然至少有一片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但是这并不能在当今的社会下给他带来足够的生活保障，广大农民不得不进城务工从事低端的劳动力，又在艰辛的同时期望着“攒点钱做小生意”回到小生产者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往往事与愿违，这种生存方式让大部分农民工一年到头都没有机会陪伴亲人，原本枝繁叶茂的亲缘关系网络也会因此被打散，慢慢原子化。这种事情正不断地发生在我们周围——逢年过节在外漂泊的游子不愿意回家；回家的人还能做热屁股就乘着车连夜回到城市的出租屋；家庭成员往往很容易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爆发挤压已久的矛盾。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传统（农村）家庭的解构往往意味着小生产者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于当今的社会，而另一种集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则会成为主流。

农村家庭的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问题

编者按：1.该文章的作者利用假期时间走访中国乡村进行调查，从中作者看到了一种与大银幕上“ 家和万事兴”
截然相反的农村家庭伤痕文学。熟悉中国历史的应该有所了解，中国的“ 土改” 和“ 土革” 是当代庞大小农家庭形成的基础，而“ 改开”
则是中国小农经济在中国复苏的关键阶段。第一次土地制度的重大革新为中国人口再生产创造优势，而第二次的修正则是为中国家庭如今的逆转埋下了根。

2.家庭通常被渲染成人们精神上的港湾和物质上的靠山，而如今这种印象则被慢慢重构，传统家庭本身作为私有制的伴身物，有其历史性，必然会顺着时代而被再次塑造。

一.家庭关系

目前笔者观察到的农村家庭关系基本为3-4代组成一个小型家庭，一部分地区的小型家庭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成一个比较大但是松散的小家庭联盟。一般情况下都是20-40岁左右的壮劳力外出打工。家庭中只有还在上学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留守，而这些人在家庭关系里实际上是被压迫的一方——由于无法提供收入，他们的收入基本来自于壮劳力（一般是父母亲），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被压迫者。以笔者访谈的一位对象（以下简称Y）为例，在上学的时候他只能依赖于家中来动力的收入来源来维持生活以及学费，作为妥协，他自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学业来维持自己一个相对压迫不那么严重的地位。Y后来前往中职学习厨师，有了劳动换取报酬的能力。
当之前处于被压迫地位家庭成员有了劳动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时候，那么此时的压迫关系就会变得很微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此时一般会被尽快驱逐出原来的家庭，被迫建立自己的家庭（常见的催婚）。Y目前并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想法。

二.经济基础

目前的农村家庭关系都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的。农民一般通过耕种自己的土地获得收入来源。笔者目前不了解资本下乡的具体情况，但是从比较长期的观察以及交谈中得知资本下乡目前在当地是比较失败的，除了一部分作为特例宣传的其余基本延续着改革开放后的小农经济模式。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扩大剪刀差的需要，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员。随着近期经济危机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工资都出现了停滞甚至下调。

笔者只找到了2022年所在省份的一部分收入，而且表中只统计了非私有企业的收入。



表中看似收入蒸蒸日上，然而笔者所在的城市私营企业占据比例高达60%，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是根本没有达到表中的平均。以Y为例，他自己承认在春节期间加班并且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加班工资。Y同时还承认了自己开始工作的非常认真，却被老板在企业内评价为“最差”，与一些消极怠工的同事一起几乎只有底薪（3000块人民币）；同时Y也承认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希望能等公司主动开除他，自己不仅能休息，有机会还能去劳动局举报，有更多的工资到手。

三. 文革时期对家庭制度的改造

早在三大改造的时候，教员就预见到改造旧家庭的必要性。于是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农村就是合作社的形式，将家庭这一私有制的基础开始打碎。到了文革时期，在原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又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改造。人民公社制度得到了加强，家庭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结合的产物。农民和工人分别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和单位）里互相联合起来，原先的家庭私有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原本的个人联合起来，工、农、商、学、兵在这个社会中分别发挥作用，又互相联合，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此时的家庭早就失去了私有制的细胞的作用，成为了仅仅是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

四. 如何改造今天的家庭

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原先的无产阶级联合的社会已经被打散。虽然目前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先从改造自己的家庭开始，把自己的家庭从一个私有制的经济联合改造成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教员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结婚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二人没有互相给对方任何的彩礼和嫁妆，都是互相结合后一起从事工作，同时也一起参与到革命组织中，成为了同志。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虽然不可能会让伴侣也成为一起革命的同志，但是可以互相拒绝一切形式的彩礼、嫁妆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可以在互相的工作中一点点地改造思想。至少在面对地下工作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会因为家庭关系遇上困难。

***人民公社通过社会化抚养改造私有制的家庭* 关系**：

家庭作为私有制的象征，它是私有制社会下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将人们从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解放，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从而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原始概念中的“家庭”也会在这种改造中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化抚养来完成人口再生产。

而人民公社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化抚养”的伟大尝试，人民公社，初心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从根上解决农村治理问题，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进而解决历史周期问题。而这种模式在20年来，在工业积累、水利建设、公共医疗、文化教育、集体企业、民生工程、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

在医疗卫生方面。1969 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 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 1978
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 82% 的生产大队建立 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
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 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

当各地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有一定经济积累后，便为后来农村发展医疗合作社提供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后10年，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在全国90%的农村建立了农村医疗合作社，有近500余万赤脚医生在服务，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
传染病被消灭。1977 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 66 岁，比 1949 年 提高了 31 岁。

这种庞大而健全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给农民带来基本医疗保障，值得称道的是，农民医疗支出的压力很小。因为当时农村医疗合作社，建立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基础上，通过集体资金补贴方式实现医疗合作社持续运营。农村基层卫生员“赤脚医生”，也是依附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上，才得于生存发展。

毛时代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成为世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解决医疗卫生的成功样板，曾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

在教育方面：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扫盲运动，取得巨大成绩。1966至1976年间，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突飞猛进，构建了日趋完善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三级布局，覆盖全国80%以上的乡村，基本做到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

根据教育部统计：1965年中学只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1976年，普通初中学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

在新增长的学校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学校，这一切受益于毛主席对中国教育的革新，同时也得益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经济上支撑了农村教育事业进步。

人民公社体制，或许不尽完美，但他具有许多优越性。在集中力量做大事时，也提供各种福利保障，降低农民生活总成本，不同程度地上照顾了老、弱、孤、寡、残的社员，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障。没有留守儿童，没有空巢老人，做到了社会化抚养。

五．对马前卒（社会化抚养）的批判

提到社会化抚养，想必会有人联想到前些年出自b站著名社论博主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一论，仔细想想，笔者还是需要将此论与上文的“社会化抚养”做出一个区分。



马前卒（原名：任冲昊）所提出的社会化抚养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动力不多，新增人口少，人口结构异常；加之房价高，教育难，看病难等问题增加了当代人各方面的生活成本，使得新生人口无法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高中生，大学生在体育方面如山体崩塌，抑郁症、自闭症、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更加地普遍地存在于当地青少年群体中，所以“人口危机”一论那时便是甚嚣尘上。于是马前卒苦思良久的，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社会化抚养就出现在公共视野：

1. 基本服务上，以政府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节约总投入
2. 在参与方式上，自愿进出和强制参与结合，和刺激生育愿望，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保证未来人口质量的下限。
3. 数据监管，解决公立机构的工作风险的问题，让人民建立社会化抚养的信任。
4. 保险托底，免除教师的担心，刺激社会化抚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5. 家校联动，接触抚养压力，给亲戚更大的发育空间。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国家机关公信力托底让政府一碗水端平的，目的在于减少家庭教育成本、提高“人口质量”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意见。

> 第一：所谓“人口问题”的实质

从实际上看，中国到底有没有面临着这样的“人口危机”？总所周知，如今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城乡之间的劳务流动依旧巨大，但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按照马前卒对于目前人口结构的看法和估计：越来越少的青壮年劳动力将会让社会因为这异常的人口结构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社会的养老问题也会愈加困难。但如今无比戏剧化的一点却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面临“不足”却首先出现了“过剩”，而政府的养老福利方面的支出却在劳动力依旧庞大的情况下率先出现了财政赤字，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维权事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前卒会习惯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是说社会问题的源头归结于一种相当形而上的机械指标，它可以是工业党所追捧的抽象现代化形式，也可以是建制派大肆吹捧的城投基建，又可以是这里他所提出的“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质量”。

中国的所谓“人口问题”首先不是当今“大失业”、“大裁员”、“大降薪“等阻碍劳动力再生产的罪魁祸首，其次导致这一“人口问题”的根源本质上还是目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恶果—它是被专家教授归结于新一代的叛逆（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但却是和全老百姓毫无相关的罪责。

现在谁才是最在乎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那一批人？就是那些靠房地产、土地财政敛财的开发商和官僚集团。房屋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刚需”却被他们当作投机的工具，房屋被大量商品化后价格便水涨船高，首先被投入大量资金的城建行业会带动建材、家居的需求端，从而消耗掉过剩产能，接着房地产所辐射的教培、零售等行业也会被带动，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者会首先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而被获得更多的薪水和发展机遇，超发的通货也会因为这些人的消费而广泛流通从而造成全社会的通胀。

这就像是一种对未来疯狂透支债务的行为，这些债务被转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等到新生一代面临着天价的房价等一系列过高的生活成本时便会望而却步，慢慢地便放弃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打算，房屋便会慢慢地不再是刚需，被城建所带动的产业会因为房地产的衰落而没落，地方政府也会大量减少财政的来源。

因此，与其说中国面临着“人口危机”，倒不如说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土地财政危机，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集团面临的利益危机。

> 第二.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马前卒着眼解决的“人口危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利益危机，只不过马前卒之流把广大老百姓绑架过来，再粉饰一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戏码，让广大老百姓为达官显贵的利益着想罢了。

所以显然，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广大人民利益上的“谏策”。为了细致地辨别这种冠之以福利之名谎言，我们还需要再做详细讨论

首先，笔者需要在此提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工资”，另一个是“福利”，但是都是需要再加一个定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是维持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足够填补一个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成本、用于教育和技能培养的成本、以及抚养下一代并支撑下一代生活资料供给与教育培养的成本。

对于一个从事普通体力劳动力的工人而言，他原本成长所需的再生产成本低—吃住所需也许就是廉价的出租屋和白面淡汤，教育方面不少是读了初中就出来打工，而在于生儿育女方面的需求更不必多谈；而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白领则有些不一样—从小到大的吃住质量必须得足够支撑他受长久教育的需求，教育方面付出的资金从小学到大学再到额外技能培训都是天文数字，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不得以背负起巨大的债务勒紧肚子过日子，这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在培养上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财力会比一般的体力工人高出许多，从一般市场的逻辑看，这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会更大，从而促使巨大的脑体力劳动差距。

而资本主义下的福利则是国家机器将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与压力以税收—再分配的方式平摊到整个社会中。当代社会福利从一方面来看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看却是让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助推。

工资、福利，在当下是维持劳动力（人口）再生产的必要。可是如今劳动者必然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日渐入不敷出的窘境，被征收的间接税款会因为消费降级等经济下行的现象而日益走低。就算上位者都是青天大老爷，就算纳税人的钱没有被贪取一分一毫，政府财政能支撑起来的社会化福利都会相当薄弱，捉襟见肘。

因而，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事业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市场而做出商业化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各种各样“助学贷款”、“商业慈善”等等最终会将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形式工程。

如此状况下推出的“社会化抚养”，能不办成临沂网戒中心之流的网瘾学校，都是各位祖坟冒青烟了。

> 第三.社会化抚养的目的：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

上文提到，马前卒会把社会的兴衰与一个国家人口状况挂钩，而对当前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则会从当下原子化的家庭单位去着手。

“……00后出生的一代人往往是独生子，但是他们的父辈往往都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待到00后长大之时，他们只能一个人去承担家庭的养老问题……”

类似的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有着这类主张的人通常会把这个问题延伸至全社会，于是有了一种极端的猜想“假设几十年后，青壮年劳动力只有3亿，而他们却要承担比他们数量高出几倍的老人的养老成本”。

把社会福利问题当作简单的人口问题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如今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哪怕债台高筑却依旧维持着国内的福利水平，去维持本国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去调和阶级矛盾让他们原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可持续性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压榨了百姓的油水，却把大量的外汇用于对外扩张，海外援助等工程，对内不会做出一点民生改善。

所以，社会化抚养不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一个很典型的“钱往哪里花”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更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化抚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重点是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如果社会化抚养是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为目的，毫不留情地讲这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劳动力再生产计划，马前卒之流总是拿出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背书，将社会资源分配围绕抽象的“人口”问题去讨论，从而掩盖背后真正的阶级矛盾。

往长远的讲，人类生产力会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放到更高级的阶段，在如此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哪怕社会上只有1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可以养活比他们多出几十倍的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传统的小农家庭也不断受到改造。“ 分田单干”之后农民虽然至少有一片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但是这并不能在当今的社会下给他带来足够的生活保障，广大农民不得不进城务工从事低端的劳动力，又在艰辛的同时期望着“攒点钱做小生意”回到小生产者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往往事与愿违，这种生存方式让大部分农民工一年到头都没有机会陪伴亲人，原本枝繁叶茂的亲缘关系网络也会因此被打散，慢慢原子化。这种事情正不断地发生在我们周围——逢年过节在外漂泊的游子不愿意回家；回家的人还能做热屁股就乘着车连夜回到城市的出租屋；家庭成员往往很容易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爆发挤压已久的矛盾。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传统（农村）家庭的解构往往意味着小生产者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于当今的社会，而另一种集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则会成为主流。

翻版的北一辉、别样的法西斯鼓吹手——评卢麒元先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卢麒元先生，一位在网络上有一些拥趸的“社会主义者”，一位经常对政府当局发表发表了一些别样言论的“在野党”，由于他经常发表一些所谓**“节制资本”“反对帝国主义”**
的言论，所以在阶级矛盾愈发膨胀的当下好是蒙蔽了一些群众，然而仔细一看这位卢大师发表的言论，我们就能揭破这位另类的资本主义鼓吹手、翻版北一辉的真面目。

首先，根据网络上能找的消息来看，这位卢麒元大师，他来自于何处呢？是什么沃德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开放信托投资公司，**
在知名泛左派平台乌有之乡上的介绍为：** *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工作，现在香港发展。卢先生精通世界金融经济，善于分析国际经济走势* **
，*对美国的金融战略研究颇为深刻* 。他在微博上的认证介绍为** *深圳市金宗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
这么几板斧下来，我们也不难窥见他究竟是什么角色了。第一，看卢先生这个经历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曾经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位成员；第二，他从来只为抽象的“人民”发声，只为“国家”发声，只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发声，至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各底层群体，在他嘴里和笔下的文字里是根本见不到的；第三，他的自我介绍也文章忙不迭的介绍自己为游走在政府和底层之间的一个演说家，并根本蹦不出“**资产阶级”**
这一词语，“文革”都说出来了1，“资本”也说出来了，但是“资产阶级”就是不能从他的嘴中说出口——甚至评论文革时反对官僚垄断都说出来了但就是说不出**官僚资产阶级**
来——也是奇怪。从这三个表现看来，**如果真正指望这位卢先生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那不能完全说毫无希望，但能说得上是希望渺茫。**

卢麒元先生的思想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这就要看卢麒元先生的文章才能仔细辨析了。

卢麒元的法西斯思想

首先，卢麒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毫不掩饰的表明“**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高度契合。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跨国利益集团，正是他们要摧毁我们的中央集权，正是他们正在剥夺人民的立法权。**2”他把毛泽东这一中国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导师毫不犹豫地和国际争霸结合起来，也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归咎于别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立法权带来的动摇，立法权的动摇会摧毁中央集权，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虽然在之后他也假模假样的说了两句“资本不决定一切”、“毛邓都会认同的”，但这简直令人嗤笑不已，先不说邓小平这一位破坏摧毁文革以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这一位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是会认同所谓“跨国利益集团”这一含混不清的理念，只怕也是强词夺理吧？而且卢麒元先生在此也透露出一种隐蔽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即含混阶级的观念（这一点在他所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中就已出现，2022年直接的显露）3，认为国家至上，当今的党至上，特色社会主义极好。在这里我想要简要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这一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共产主义，和当今中国对文革一样被掩蔽扭曲的主张。

提到法西斯主义，大家一定能想到的是日本以及纳粹德国，以及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日耳曼民族至上这些耳熟能详的印象，然而法西斯主义远远不止表皮上的民族至上，它的内核实际上是“团结一切”：“它所提出的整体不是在阶级社会格局内由一个阶级的统治而实现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联合了所有阶级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设想能够克服阶级斗争的现实，由此也克服阶级本身的现实，换句话说，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这个无阶级的社会是以现存阶级社会为基础并身处其格局之中的。**
”4而纵观意大利、日本、德国这三家典型的法西斯政权，我们即可看见它们法西斯运动的起源就是**团结，**
团结一切去面对危机是这三家共通的经历，最先开始法西斯运动的意大利就是因为一战过后的经济危机，同样的德国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的法西斯运动更是在随着一战后在国际形势上的不利以及国内的工农运动中的背景爆发的。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上台后，就实行了淡化阶级斗争，团结社团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和工厂主是一个社团，应当团结一致），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也是一样如此。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创人北一辉，他早年是一位反对天皇专制，承认日本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流血的革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普选的投票才能“颠覆经济贵族的国家”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天皇不该专揽统治大权，却又承认天皇的专制合理性，他承认阶级斗争（他称之为阶级掠夺）的存在，却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个生物社会，支配它的规律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资本家是强者，工人是弱者，所以这就为他转变向超国家主义法西斯思想埋下了种子**
，在他的法西斯主义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公然提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考究作为国家根本的原理原则。**
……**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财产，限定为百万元。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私有地，限定为时价十万元私人生产业的限度，为资本千万元；超过此限度之生产业，一切集中于国家，由国家统一经营。**
”5，这种团结、阶级之间的合作虽然在几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表现形式也略微不同，但究其内核，终究是**“团结”“阶级合作”**

的原则罢了。而再看看卢麒元先生的言论，我们自不难发现其和北一辉先生的共同点，卢麒元先生早年反对当局吗？反对的，只是也一样随着形势的变化转而变成了当局的鼓吹手，反资本吗？口头上是反对的，但是支持革命吗？支持提高工资之类的改良主义吗？至少我是没从卢麒元先生的言论中看见此种倾向。而卢麒元先生和北一辉更相像的一点则是帝国主义争霸论，北一辉在它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公然鼓吹“**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的大地主……国际间处于无产地者地位的日本，以正义之名不是有排斥它们的独占而有与之开战的权利吗？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斗争，另一面单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根本思想的自己矛盾。”，**
一方面说着以一个天皇为基本点实行日本的改造，不希望流血之革命，另一方面又把帝国主义争霸混淆称为“国际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斗争”，这就是北一辉法西斯思想中的两大支柱。而卢麒元先生可以说既有着北一辉式的鼓吹一个把各阶级团结在一起的事物——即特色社会主义和特色共产党——也有着另一面的鼓吹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

卢麒元刻意扭曲的文革和社会主义

然而仔细看看卢麒元先生的文章，其实还能发现另一个问题——他不仅有着北一辉式的法西斯主义还有着与之相对应的错误的历史观以及被他本人刻意曲解的社会主义观。比如，他曾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革命都是“**用革命的方式夺取资产阶级法权**
”，并说“**人民独立地、直接地、长期地、稳定地持有资本和拥有并使用资产法权，人民才能拥有真正意义的主权和人权，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6”，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列宁和毛泽东主席对于革命都是说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虽然承认对于资产阶级有利，但是也毫不含糊地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农群众的先锋队带领各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专政的国家，但是是以工农的代表——共产党来带领，卢麒元先生这时完全混淆了夺取政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事实上抛开卢麒元先生看见这个发生在平行宇宙的事件而看回现实，就知道，无论是苏联还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走向修正之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从来就是——**消灭旧有的资产阶级残余，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从而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而更是令人吃惊的是，卢麒元先生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7竟然如同前文所述的，把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缝合起来一样**，他把文革和改革开放竟然也缝合在了一起**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运动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峰结合起来的：首先，他把文革含糊的称为“人民争取主权和治权的伟大实验”，然后把改革开放称为“**通过私有化瓦解公有制体制，通过市场化瓦解计划经济模式，通过资本化瓦解官僚经济组织，通过国际化瓦解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的“**至今尚未完结的，旨在改变僵化经济体制的非暴力革命**
”，把它们一同评价为“缺乏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激进而混乱”的，接着如同脑袋昏沉般说“文革是人民代行政府权力，改革是资产阶级精英建立资产阶级法权打破官僚垄断对政府权力的僭越，长远来看他们都是反封建的延续”，胡说着“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
，而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不是社会主义，也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
”，就这样，卢麒元先生把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贬低为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并把它和僵化的官僚主义强行捏在了一起，就这样和把文革和改革开放以一论之，称他们都是“一回事”，在最后就说什么含混不清的“人民专政”，直接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明确的说他的“人民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回事，最后卢先生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把立法权交给人民，把议价权交给市场，政府变成有限政府”，这样就解决了修正主义的党的历史割裂。到这里，卢先生已经把他的立场全部展现出来了，他看似肯定实否定文革，并歪曲文革是含混地“人民代行政府权力”，把计划经济粘合成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卢麒元口中的人民是什么人呢，结合来看，只能是他看似反对实则肯定的资产阶级了。

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卢麒元先生更是毫不掩饰的称“**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社会相对公平地占有，而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伪公有制）。……请记住，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公有制，更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人民主权被剥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坏到还不如欧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
”8。他完全的否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会剥夺人民的主权。问题来了，生产资料全社会相对公平的占有，那么这种相对平均是怎么做到的，指望高高在上的“赵家人”发发慈悲来施舍吗？无血怕是很难吧？全社会相对公平的占有是不是跟均田、分田地一样，那么这种小生产者中间无时无刻都在生产出来的资产阶级到最后，还是会走向两极分化，最后自己否定自己；另一个问题，人民是谁？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行呢？恐怕最后的“不如欧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才是卢麒元先生真正想说的吧？**社会资本主义**
，简直就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令人忍俊不禁，这么一来就跟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一样，**欧美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了，那么全球恐怕没几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那么，所谓欧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生活如何呢？法国的罢工声势浩大，美国也是不遑多让，卢麒元先生真是为了他的思想站台而什么都不顾了。

总而言之，仔细观察卢麒元先生，我们就不难得出他究竟站在哪一方了，他的爱党爱国之心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可是他究竟爱资产阶级还是爱无产阶级？他的爱国和爱党会让他爱无产阶级吗？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1如果真正了解文革的起因和理论就不会说不出资产阶级这一词。

2《焦点不在毛邓》2014.08.25

3一个国家走向失败，只有两种原因。第一，族群撕裂；第二，阶级斗争。——《乌克兰悲歌》2022.02.21

4《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版
第11页

5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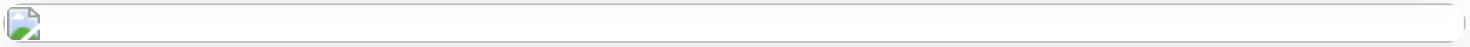
6《左翼的精神独立》2014.09.16

7《文革到改革的同一及进化》2014.12.16

8《新社会主义通论——前言》2019.02.03

翻版的北一辉、别样的法西斯鼓吹手——评卢麒元先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卢麒元先生，一位在网络上有一些拥趸的“社会主义者”，一位经常对政府当局发表发表了一些别样言论的“在野党”，由于他经常发表一些所谓**“节制资本”“反对帝国主义”**
的言论，所以在阶级矛盾愈发膨胀的当下好是蒙蔽了一些群众，然而仔细一看这位卢大师发表的言论，我们就能揭破这位另类的资本主义鼓吹手、翻版北一辉的真面目。

首先，根据网络上能找的消息来看，这位卢麒元大师，他来自于何处呢？是什么沃德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开放信托投资公司，**
在知名泛左派平台乌有之乡上的介绍为：** *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工作，现在香港发展。卢先生精通世界金融经济，善于分析国际经济走势* **
，*对美国的金融战略研究颇为深刻* 。他在微博上的认证介绍为** *深圳市金宗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
这么几板斧下来，我们也不难窥见他究竟是什么角色了。第一，看卢先生这个经历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曾经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位成员；第二，他从来只为抽象的“人民”发声，只为“国家”发声，只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发声，至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各底层群体，在他嘴里和笔下的文字里是根本见不到的；第三，他的自我介绍也文章忙不迭的介绍自己为游走在政府和底层之间的一个演说家，并根本蹦不出“**资产阶级**”
这一词语，“文革”都说出来了1，“资本”也说出来了，但是“资产阶级”就是不能从他的嘴中说出口——甚至评论文革时反对官僚垄断都说出来了但就是说不出**官僚资产阶级**
来——也是奇怪。从这三个表现看来，**如果真正指望这位卢先生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那不能完全说毫无希望，但能说得上是希望渺茫。**

卢麒元先生的思想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这就要看卢麒元先生的文章才能仔细辨析了。

卢麒元的法西斯思想

首先，卢麒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毫不掩饰的表明“**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高度契合。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跨国利益集团，正是他们要摧毁我们的中央集权，正是他们正在剥夺人民的立法权。**2”他把毛泽东这一中国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导师毫不犹豫地和国际争霸结合起来，也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归咎于别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立法权带来的动摇，立法权的动摇会摧毁中央集权，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虽然在之后他也假模假样的说了两句“资本不决定一切”、“毛邓都会认同的”，但这简直令人嗤笑不已，先不说邓小平这一位破坏摧毁文革以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这一位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是会认同所谓“跨国利益集团”这一含混不清的理念，只怕也是强词夺理吧？而且卢麒元先生在此也透露出一种隐蔽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即含混阶级的观念（这一点在他所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中就已出现，2022年直接的显露）3，认为国家至上，当今的党至上，特色社会主义极好。在这里我想要简要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这一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共产主义，和当今中国对文革一样被掩蔽扭曲的主张。

提到法西斯主义，大家一定能想到的是日本以及纳粹德国，以及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日耳曼民族至上这些耳熟能详的印象，然而法西斯主义远远不止表皮上的民族至上，它的内核实际上是“团结一切”：“它所提出的整体不是在阶级社会格局内由一个阶级的统治而实现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联合了所有阶级的**

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设想能够克服阶级斗争的现实，由此也克服阶级本身的现实，换句话说，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这个无阶级的社会是以现存阶级社会为基础并身处其格局之中的。
”4而纵观意大利、日本、德国这三家典型的法西斯政权，我们即可看见它们法西斯运动的起源就是**团结，**
团结一切去面对危机是这三家共通的经历，最先开始法西斯运动的意大利就是因为一战过后的经济危机，同样的德国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的法西斯运动更是在随着一战后在国际形势上的不利以及国内的工农运动中的背景爆发的。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上台后，就实行了淡化阶级斗争，团结社团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和工厂主是一个社团，应当团结一致），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也是一样如此。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创人北一辉，他早年是一位反对天皇专制，承认日本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流血的革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普选的投票才能“颠覆经济贵族的国家”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天皇不该专揽统治大权，却又承认天皇的专制合理性，他承认阶级斗争（他称之为阶级掠夺）的存在，却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个生物社会，支配它的规律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资本家是强者，工人是弱者，所以这就为他转变向超国家主义法西斯思想埋下了种子**
，在他的法西斯主义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公然提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考究作为国家根本的原理原则。**
……**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财产，限定为百万元。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私有地，限定为时价十万元私人生产业的限度，为资本千万元；超过此限度之生产业，一切集中于国家，由国家统一经营。**
”5，这种团结、阶级之间的合作虽然在几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表现形式也略微不同，但究其内核，终究是**“团结”“阶级合作”**
的原则罢了。而再看看卢麒元先生的言论，我们自不难发现其和北一辉先生的共同点，卢麒元先生早年反对当局吗？反对的，只是也一样随着形势的变化转而变成了当局的鼓吹手，反资本吗？口头上是反对的，但是支持革命吗？支持提高工资之类的改良主义吗？至少我是没从卢麒元先生的言论中看见此种倾向。而卢麒元先生和北一辉更相像的一点则是帝国主义争霸论，北一辉在它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公然鼓吹“**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的大地主……国际间处于无产地者地位的日本，以正义之名不是有排斥它们的独占而有与之开战的权利吗？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斗争，另一面单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根本思想的自己矛盾。”，**
一方面说着以一个天皇为基本点实行日本的改造，不希望流血之革命，另一方面又把帝国主义争霸混淆称为“国际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斗争”，这就是北一辉法西斯思想中的两大支柱。而卢麒元先生可以说既有着北一辉式的鼓吹一个把各阶级团结在一起的事物——即特色社会主义和特色共产党——也有着另一面的鼓吹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

卢麒元刻意扭曲的文革和社会主义

然而仔细看看卢麒元先生的文章，其实还能发现另一个问题——他不仅有着北一辉式的法西斯主义还有着与之相对应的错误的历史观以及被他本人刻意曲解的社会主义观。比如，他曾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革命都是“**用革命的方式夺取资产阶级法权**
”，并说“**人民独立地、直接地、长期地、稳定地持有资本和拥有并使用资产法权，人民才能拥有真正意义的主权和人权，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6**”，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列宁和毛泽东主席对于革命都是说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虽然承认对于资产阶级有利，但是也毫不含糊地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农群众的先锋队带领各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专政的国家，但是是以工农的代表——共产党来带领，卢麒元先生这时完全混淆了夺取政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事实上抛开卢麒元先生看见这个发生在平行宇宙的事件而看回现实，就知道，无论是苏联还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走向修正之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从来就是——**消灭旧有的资产阶级残余，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从而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而更是令人吃惊的是，卢麒元先生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7竟然如同前文所述的，把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缝合起来一样**，他把文革和改革开放竟然也缝合在了一起**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运动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峰结合起来的：首先，他把文革含糊的称为“人民争取主权和治权的伟大实验”，然后把改革开放称为“**通过私有化瓦解公有制体制，通过市场化瓦解计划经济模式，通过资本化瓦解官僚经济组织，通过国际化瓦解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的“**至今尚未完结的，旨在改变僵化经济体制的非暴力革命**
”，把它们一同评价为“缺乏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激进而混乱”的，接着如同脑袋昏沉般说“文革是人民代行政府权力，改革是资产阶级精英建立资产阶级法权打破官僚垄断对政府权力的僭越，长远来看他们都是反封建的延续”，胡说着“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
，而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不是社会主义，也是高度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
”，就这样，卢麒元先生把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贬低为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并把它和僵化的官僚主义强行捏在了一起，就这样和把文革和改革开放以一论之，称他们都是“一回事”，在最后就说什么含混不清的“人民专政”，直接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明确的说他的“人民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回事，最后卢先生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把立法权交给人民，把议价权交给市场，政府变成有限政府”，这样就解决了修正主义的党的历史割裂。到这里，卢先生已经把他的立场全部展现出来了，他看似肯定实否定文革，并歪曲文革是含混地“人民代行政府权力”，把计划经济粘合成僵化的政府官僚主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卢麒元口中的人民是什么人呢，结合来看，只能是他看似反对实则肯定的资产阶级了。

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卢麒元先生更是毫不掩饰的称“**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社会相对公平地占有，而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伪公有制）。……请记住，社会**

主义，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公有制，更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人民主权被剥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坏到还不如欧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
”8。他完全的否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会剥夺人民的主权。问题来了，生产资料全社会相对公平的占有，那么这种相对平均是怎么做到的，指望高高在上的“赵家人”发发慈悲来施舍吗？无血怕是很难吧？全社会相对公平的占有是不是跟均田、分田地一样，那么这种小生产者中间无时无刻都在生产出来的资产阶级到最后，还是会走向两极分化，最后自己否定自己；另一个问题，人民是谁？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行呢？恐怕最后的“不如欧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才是卢麒元先生真正想说的吧？**社会资本主义**
，简直就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令人忍俊不禁，这么一来就跟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一样，**欧美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了，那么全球恐怕没几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那么，所谓欧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生活如何呢？法国的罢工声势浩大，美国也是不遑多让，卢麒元先生真是为了他的思想站台而什么都不顾了。

总而言之，仔细观察卢麒元先生，我们就不难得出他究竟站在哪一方了，他的爱党爱国之心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可是他究竟爱资产阶级还是爱无产阶级？他的爱国和爱党会让他爱无产阶级吗？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1如果真正了解文革的起因和理论就不会说不出资产阶级这一词。

2《焦点不在毛邓》2014.08.25

3一个国家走向失败，只有两种原因。第一，族群撕裂；第二，阶级斗争。——《乌克兰悲歌》2022.02.21

4《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版
第11页

5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6《左翼的精神独立》2014.09.16

7《文革到改革的同一及进化》2014.12.16

8《新社会主义通论——前言》2019.02.03

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观

大群、东风已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报-
流氓组织双中心”的路线，这条路线也在吸引着其他政治报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参与，这实际标志着我国小资产阶级独立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革命性质开始成为反动的方面，而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要独立出来领导其他阶级。

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观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February 22, 2024

我国现阶段革命运动发展主要矛盾的本质就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痛恨资本家私有的大量生产资料，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也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革命力量，然后创造并增加自己的“小资本”，并以这种“小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是不彻底的，是折中的，如列宁所说是“向后返顾”的，所以庸俗辩证法也渗透在他们言行的方方面面。工人解放斗争之声的《反对经济主义，还是反对融工和斗争？》也指出了这点
—— 他们用“反对经济主义”这个次要矛盾虚空打靶，目的是掩盖主要的阶级的矛盾。

现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把争论集中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一次要矛盾上、或要特别关注“职业革命家”和统一组织的问题上，却对真正的主要矛盾和现实革命需要视而不见，或是进行调和。这些内容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带着这种特殊的利益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无时无刻希望保护这种非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他们对“职业革命家”相关问题的观点就能直接反映他们的阶级立场。而大群、东风实际上形成了明确的小资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观和实际上的“政治报-
流氓组织双中心”路线，而新十月等组织也即将滑进这个路线了。

一.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

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职业革命家”必然有其确定的阶级性，在主观上他以革命的高度反映其阶级性（所以他主要代表该阶级的革命利益、政治利益，最后是经济利益）；客观上他以职业的形式完成他革命的使命，而这种“职业”的形式必然由他的阶级提供必要条件。所以，“职业革命家”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革命利益并被该阶级雇佣起来为其服务的职业队伍，它最大使命就是为了实现该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

“职业革命家”首先要在主观上要达到领导该阶级进行革命所要求他达到的标准，满足阶级对他的要求、完成阶级所要求他完成的事业，得到阶级的信任，并以实现阶级利益为首要使命；客观上，“职业革命家”必须从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产生，并且该阶级已经有条件和有意愿把他上升为职业的（这就需要相当的阶级工作以建立相当阶级组织和阶级关系来实现）。

所以，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从主观上要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他需要达到和保持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标准，得到无产阶级的信任，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第一生命，否则他便不配做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而从客观方面来看，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和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都必须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群众工作中锻炼出来，它要完成一切必要完成的阶级使命和阶级工作（这里也就包括了创造职业革命家物质条件的工作），必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主客两方面的统一，才能够产生这样的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

简单来说，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一部分，且只能在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工作中产生
（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产生它的条件），而这支队伍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第一生命。一旦脱离了这样的路径就一定不是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而是其他什么东西。

而拿我们的现状来讲，我们还无法直接实现这种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甚至相当一个时期内也无法实现，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它的条件。我国革命运动、群众运动还完全没有达到在物质上供给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高度，并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从我国革命运动、群众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因此，我们恰恰需要通过正确的、有力的融工工作来创造这些条件，并且“职业革命家”只是我们未来进行的工人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我们进行工人革命事业的主要目的，我们主要目的应该是让我国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结合起来、推动我国革命的发展和捍卫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主要为了使自己成为“职业革命家”（这还只能是次要的方面）。

二.布站“职业革命家”的反革命实质

如果要谈我国现在其他关于“职业革命家”的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大群，大群老管理的观点极具代表性。我们从大群的新文章就可以发现其对职业革命家和先锋队理解有许多混乱不清的地方。

> 什么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
>
> 一个列宁主义的先锋队，一定是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革命组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革命的纪律，就没有革命的组织，一个革命组织有没有战斗力，配不配得上先锋队的名号，关键就在于这个组织有没有严密的纪律，有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
>
> 先锋队的作用，则是通过民主集中制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在这样的长期的群众工作中，逐渐唤起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引导工人群众从自发转向自觉，从而将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现实力量，逐渐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
>
> 而在如今的革命低潮期，统治阶级的专政无孔不入，任何冒进的举措都有可能将革命成果白白葬送，因此，革命的形势要求先锋队必须是秘密的、地下的革命组织。任何主张公开斗争，把组织架构摆在台面上展开斗争的，都是毫无疑问的机会主义路线。
>
> 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建立起有效的群众组织，要想争取到群众的加入和支持，首先就要保证革命组织的建设，一定是贯彻了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原则的。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把革命组织建设到一支先锋队的水准，拥有铁的纪律，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内部做到“讨论自由，行动统一”，从而通过无产阶级的纪律和无产阶级的义务劳动，组建出具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工人群众才会愿意加入支持。
>
> 倘若革命组织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盘散沙，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等风气也没有去除，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只靠兄弟情义、嘘寒问暖，而不是依靠严密的革命纪律，即使出动一帮人去工厂里拉起一个群众组织，工人们凭什么就一定会加入呢？群众愿不愿意加入，归根结底要看这个组织的拳头够不够硬。
>
> -布站《试谈先锋队理论对21世纪的十月革命的指导意义——纪念列宁同志逝世一百周年》

一般来说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部队（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说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或工人阶级先进部队），职业革命家只能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基础上产生。但布站在这里却把先锋队定义为“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革命组织”，本质上就根本不同了。而职业革命家本身在本文中却没有明确定义和说明。因此，先锋队概念的明确成员标准被作者弄混了，先锋队的明确阶级性质也被作者抹杀了。

主要的、根本的内容被抽掉，转而换成了抽象的制度、纪律、“职业革命家”等内容的填充，这种先锋队只能是非无产阶级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认为“职业革命家”是组成先锋队的核心，因此“职业革命家”也是先锋队问题的核心，那这是否正确呢？这完全错误，这恰恰是倒因为果，不仅从逻辑上来讲是自我冲突的，从实践上来讲也是反动的。先锋队恰恰是“职业革命家”问题的核心，而先锋队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整个“职业革命家”和其组织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这个问题本该是清晰明确的，但却被作者搞得混乱无比。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 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是怎么形成的？
>
> 先锋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在学院派的实验室里真空包装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义务劳动、协同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并且在长期的扎根融工中不断壮大的革命组织。
>
> 具体应该怎么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列宁在《怎么办》中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列宁通过脚手架这一形象的比喻向我们展示了全俄政治报的重要性。“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
> 可以说，全俄政治报的创办目的，不仅是为了做一些政治揭露相关的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报纸把革命的同志组织起来，通过长期的、固定的义务劳动，贯彻无产阶级的纪律，锻炼同志间的密切协作，培养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报纸的协作，不仅能培养出能干的宣传员，更能培养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
>
> -布站《试谈先锋队理论对21世纪的十月革命的指导意义——纪念列宁同志逝世一百周年》

在这里，先锋队也从一个较完整的概念（既说明个体也说明组织）变成一个说明组织的概念，并且同样具有先前的问题。除此之外，“长期的义务劳动、协同工作中”究竟说的是什么呢？离开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来做这些所谓组织、鼓动、宣传以及追求“职业革命家”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只需要引用他们以前的文章内容就知道了。

> 马列毛主义者可以代替泛左翼回答这个问题：融工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城市中的马列毛主义根据地，第一组建暴力组织，第二扩大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夺厂。融工还能交朋友？真是好兴致。工人不像这些泛左翼，工人一旦罢工就没有退路，但是泛左翼有退路。
>
> ……
>
> 代办员需要和先进工人一起承担义务劳动，不管是讲课还是印传单，没有日常的义务劳动，工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建立起同志间的信任。
>
> ……
>
> 为什么泛左翼工人队伍一解决问题就散？根本在于马列毛主义者把融工当作煽动暴动的事情来做。可以说，除去黑恶性质，马列毛主义者要建立的工人小组和黑社会没什么两样，都是严密组织，都是暴力组织。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
>
> ……
>
> 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

-布站《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

这些内容我们曾在《全面批判布站老管理目前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一文中所具体的批判过，把这些内容和上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布站要求先锋队首先是完成暴力的组织，贯彻“建立暴力组织—宣传教育—夺取工厂”，他靠代办员和先进工人进行义务劳动来建立和普通的工人的信任（但先进工人又需要建立信任的普通工人发展而来），他依靠学习黑社会的方法殴打工头让工人忠于马列主义，他的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再加上“先锋队=民主集中制+纪律+职业革命家”的观点（而职业革命家又不能用先锋队来说明，那么要成为这种职业革命家就不需要严格的标准，并且这种职业革命家在组织中还能起关键作用，并且待遇相对丰富），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布站所追求的先锋队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路线下的机会主义者领导的职业流氓无产阶级团体。

组织的核心成员排除了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首要标准，也不需要从现实的群众工作中产生，并且组织本身也要脱离实际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同暴力工作完全地等同起来，不是从群众出发，而是要求群众为有组织的暴力所服务，那么实现这种组织的“职业”的物质条件也只能主要通过这种有组织的、职业的暴力来获取，再用政治报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暴力路线和机会主义的统一，这样地构成了一个严密有机结构，但这只能是职业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因此，这样的实践不会让工人“忠于马列主义”，这实际是让工人服从暴力，也就是靠“力量吸引人”。

布站一边鼓吹用政治报组织同志，一边鼓吹进行这种暴力的融工路线，是因为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和布站老管理的机会主义利益相适应的，是和他们所追求那种非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利益相适应的，这是反动性的“升华”，而这种职业革命家观自然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

三.小资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观和“政治报-流氓组织双中心”路线

布站的“职业革命家”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只能是其他什么阶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东风、新十月中所看到类似的非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观的内容。

> 我们要在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培养职业革命家，而不是让有才干的人倒退到“中等人”和
>
> “群众”中去。既然要培养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满足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苦行僧殉道情怀，而是要去学会如何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学会组织起来斗争，学会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事业具体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用组织的力量保障着至少一部分的人员可以减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疲劳，免受超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以至于有时间能够进行宣传材料的撰写，革命理论的编辑，组织人员的工作等。
>
> -东风《我们现在缺的是职业革命家》

> 目前各地的左翼组织一旦开展工人工作…总会在开始发动经济鼓动和斗争的阶段就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
>
> ……
>
> 12小时的工作会让厂内同志失去做理论以及宣传工作的可能性，身体的疲劳会带来意志的丧失，而长期没有斗争的可能以及没有办法进行政治灌输更是会加剧这一点，让优秀的左派同志流失。
>
> ……
>
> 我想要提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
>
> 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刚开始时的政治灌输和理论学习一定要符合所接触的工人的情况，要与他们本身的被压迫的地位，现实的各种矛盾相联系，少列些晦涩的数据，多讲些通俗的比喻；少说些死板的教条，多讲些生动的理论；少说些之乎者也，多讲些是啥为啥怎么办。而实现以上这三条要依赖于对工人们的一切生产生活、政治观点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
>
> -《新十月》

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些人就明白了，他们在反对工人革命路线的同时，又把他们所认为关键的革命工作交给了这种人、这种组织，他们这样的职业革命家观就充分说明了他们的阶级立场。

大群意识到了需要政治报组织同志、建立暴力组织、学习黑社会、相信力量；东风意识需要到了要脱离工厂的一般劳动条件、减少肉体和精神上的疲劳，要从直接领导工人的斗争中成为职业革命家；而新十月也意识到了需要脱离工厂一般劳动、减少肉体上疲劳，并且认识到了经济斗争容易被打压而直接做政治灌输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避免；而在东北小组中就有东风所推崇至极的现成的游民式的“职业革命家”玖逸，不过也已经因为安全和机会主义领袖叛变等原因灭亡了。

不根基于工人运动并且没有主要发始于工人运动中的所谓工人的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就绝不是工人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虽然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职业革命家，但都自觉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路线，他们其实都是共同的。通过布站路线所揭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既然脱离工人和实际工人工作，那这种职业革命家（特别是线下组织）只能够通过更直接的流氓式的暴力组织和暴力手段来实现，因此鼓吹直接的暴力手段、政治斗争、政治灌输，并且也需要政治报帮助这些“革命家”们把这种组织给统一起来，这也是其共同的特点。而这种“职业革命家”除了依靠职业的组织暴力手段以外，的确没有更好的创造物质条件的方法了，他们所谓的“政治灌输”、“政治斗争”实际上到最后也只能变成某种程度的有组织的暴力才能使其达到目的。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所追求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无产阶级的，那也只能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职业组织。的确，流氓无产阶级也可以被职业化地组织起来。流氓无产阶级在近现代历史中曾许多次起了重要作用，但都是反革命作用，我们从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就可以看出，曾在法国再一次复辟君主制的拿破仑三世本就曾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他复辟所最依赖和掌握的最直接力量就是他直接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们，十二月十日会就是职业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是波拿巴专门进行反革命的组织。而未来的墨索里尼、希特勒也曾依靠流氓无产阶级的职业化组织的力量来窃取革命和维护其反动统治。

不同于我国一般定义的游民。在马克思的定义中，流氓无产阶级往往由社会各个阶级中被淘汰的阶层组成，他们往往是整个社会中的最渣滓、最属道德败类的部分；在经济上，一般由经济收入最不稳定（当然有许多一般无产阶级也这样）而又很容易依赖剥削、做反动勾当为生的人组成。这些人并不是不能改造起来为革命服务，而大群的纪律和融工路线不是力求限制和改造他们的落后方面，恰恰是要求纵容、扩大、发展其落后面，并利用这种落后面为大群老管理的机会主义所服务。因此也只有这样地组织起这些人，才有可能完成布站老管理所期望的“暴力融工路线”，并实现所谓的“职业革命家”。但这样人就算组织起来，从他们的世界观和经济地位上出发、从大群的路线出发，只能做最无耻的事情。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就是把整个法国社会的败类集中到了一起，他们一开始靠骗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钱来反一部分资产阶级，后来靠骗其他无产阶级的钱来维持；最后波拿巴用十二月十日会的力量到各地进行复辟宣传，殴打和威胁议会议员，捕杀社会运动领袖，威胁其他军队中、政府在和工商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以此来帮助他进行复辟活动。而希特勒的党卫军也是由社会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组成，他们是直接拿着德国大资产阶级的赞助然后来搞宣传、反共和夺权活动的。

大群的暴力组织论，要求“先锋队”占领黑社会的位置，实际上是利用工人的仇恨，把工人改造成流氓无产阶级，然后用冰冷的纪律组织他们。而大群的所谓“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恰恰就是这样的内容。而我们工人革命路线所要求的政治灌输只能在广泛地和工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扬工人的求知欲，用马列毛主义来解决他们的困惑，让工人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认识资本家和特色政府到底是怎么压迫他们的，切切实实的帮助到他们，然后用温情的同志关系组织他们。

我们从大群爆料出来一些内部事实中就可以看出，大群的老管理们一边在组织内推行冰冷的纪律，一边又纵容其组织成员流氓的一面：只要能接受老管理的领导，能被老管理利用来攻击和污蔑不同意见的人，即使是无耻的造谣者，老管理也是能接受的。他们不仅不会要求造谣者检讨，更不会处罚造谣者，反而还会大力支持造谣行为包庇造谣者。同时，我们从大群曾经的东风、七月分裂事件和大群最近分裂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燎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群老管理的机会主义的天下，这些少数的机会主义者已经实际上地把燎原组织发展为了一个奴役普通同志、用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方法培养奴才、蠢材的地方。而以东风和新十月现有的立场、路线和现有情况来看，他们一旦要发展线下工作、厂内工作，要通过厂内组织的帮助使其线上和线下建立起“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话，就一定要发展到大群老管理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方向去，否则他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坚持非无产阶级的利益、利用无产阶级、发扬落后性、损害无产阶级利益，就必然发展为这样包含了这样两方面内容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一部分是机会主义者们领导的厂外（包括线上）的小资产阶级组织，以及一个厂内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两者只是服务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两个方面。工人本来工资低、工作辛苦，而布站老管理们还要把他们像组织学生那样组织起来，那种主要为暴力活动服务的义务劳动和纪律，必然会拖累一般工人的生活和生产、败坏工人们道德、造成工人们对马列毛主义的歪曲理解，进而把他们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推到流氓无产阶级方面去。这其实和流氓无产阶级去参加黑社会、在黑社会里义务劳动，从而在自己生活上堕落是一样的。黑社会找人实际上也是利用下面的人满足黑社会领导的利益，而大群也是一样，他们要利用工人来服务于小资产阶级或他们的官僚主义利益。

线上或厂外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庞大的线下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把两者用政治报的方式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利益统一起来共同和工人革命路线、工人阶级利益相对立，这就是现在大

群和其他政治报机会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实现他们的“职业革命家”的唯一现实可行方法。

东风的机会主义者追求这样路线，希望用他们的政治报和保证现有的机会主义者领导线下的融工组织，但他们现在缺乏大群那种线上力量，所以他们嚷嚷着希望和其他线上组织进行合并，希望把机会主义的利益方面统一起来；而另外一方面东风也特别推崇东北小组，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同样由小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但我们只需要了解东北小组的事实就可以发现，东北小组的重要代表玖逸在墙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曾在墙内不注重安全的四处活动、串联，在各种活动中坑赚其他同志，而在另一方面遇到打击又迅速投降。而大群更缺少东北小组那样的线下流氓组织（虽然还非常初级，并且很大一部分是学生组织而不是融工组织），所以他们更多地号召进行在他们领导下的流氓式的融工。这些小资产阶级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相似的路线和发展模式，这种线上和线下组织就是共同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机器的不同部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双中心机器和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阶级内部、组织内部为了共同压迫无产阶级利益而组成的联盟，本质上都是野蛮暴力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所支持的。

至此，大群、东风已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报-
流氓组织双中心”的路线，这条路线也在吸引着其他政治报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参与，这实际标志着我国小资产阶级独立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革命性质开始成为反动的方面，而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要独立出来领导其他阶级。

关于融工和党组织、融工和政治报、政治报和党组织的辩证关系问题讨论

在最近的文章«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中提出了有关“融工和政治报”、“融工和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明确观点。

较以前那种把“融工”、“政治报”、“党组织”的关系进行互相切割、或只进行在功能影响关系方面上的讨论。可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进步，但文章所讲的主要专注点在于批判东风的错误路线和机会主义倾向，而在进一步详细说明这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够的。所以在此我管见所及，讲一讲应当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

若想要实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这就需要一个与群众产生广泛联系、由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所组成的强力政党。
要实现这两点，就需要同志们进行积极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缺少其中一点，我们所要的那种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就建立不起来。**这一定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一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其中融工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社会物质基础，党组织则是它的社会力量体现（或社会组织形式）。**
工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性质;正如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
”，也因此**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性质、决定了融工的性质。**
在党还未是党而只是一个小组织的时候，由于才刚刚成立且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小组织的理论建设方面势必会与各种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理论斗争后的成果将会决定之后融工的策略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得到继续发展还是滑向修正主义为其所用。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在与敌对力量的攻击下，与中间力量的有条件合作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敌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当下革命任务的策略，决定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与否。**
当革命力量处于劣势、敌对力量优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保留实力、暂时撤退、暗中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积极宣传，随时做好文革和再次暴力革命的准备。当革命力量处于优势、敌对力量劣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当将革命成果尽可能扩大化并在关键时刻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革积极反修反帝。同理，社会在革命时期最终导向何处、是否能建设成功，取决于那时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革命地位的力量的多少，在封建奴隶制度就是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在这个国家内，势必还有资产阶级的敌对反动势力存在、还有滋生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因此这一时期处于革命地位的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只是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敌众我寡，社会主义是敌寡我众的力量对比。东风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分子，无视革命力量极度劣势、敌对力量极度强大的当下，不懂得“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对外呼吁建立融工“只要平均”的机会主义观点。在革命形势弱小的时候拉低融工成员标准，反对融工队的成员首先应当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这种把融工队的任务目标狭隘化、融工工作危险化的观点，应当坚决抵制。

融工和党组织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基本矛盾;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某一时期中。**一般地讲，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历史发展中，融工起决定作用**
，它促进发展了党组织、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体现在最初持革命立场的知识分子接触了工人无产阶级后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初次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后面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力量

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它加速或阻碍融工的进程。当党组织阻碍融工，使其具有狭隘的、危害革命的倾向时，只有坚决与党组织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作批判、与机会主义修正分子作斗争，建设好党组织的理论制度，发展好党组织的理论，把党引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才能挽救革命，保证融工乃至于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争取群众支持、扩大在群众间影响力、保证党组织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工人无产阶级），建设党组织、为党组织输入新鲜血液挖掘先进分子、为党组织提供鼓动材料、为党组织提供理论建设依据的工作称之为融工。融工是区别于狭隘的组织工作，如：只在厂外调研、只在线上宣传、只在学校办公室、只求工人工会等。**融工工作是在确立政治灌输的绝对领导、在无产阶级广泛存在的地方（如工厂、铁道、矿井等）、在贴合在无产阶级现实情况、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下所进行的。**

具有一定工作能力、一定理论水平和一定革命觉悟的条件的融工分子，是融工的首要因素。
融工者是融工的主体，是活的融工力量。融工方法的创造与实践是由融工者所进行的，因此不能忽视人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同时期条件下，融工者的能力和目的往往都会决定具体的融工工作的进展。

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是融工的工作对象，也是融工的社会物质基础。无产阶级群众无或有意识地指导了融工的工作目的、工作方向，并让自己也加入到融工工作中来。

融工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的物质根源，在暴力革命时期，它促进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促进了反修反帝的运动的成功进行;且都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自发的无产阶级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在我国官僚资本修正主义制度下，用马列毛理论武装的融工力量，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融工力量。**
这样的力量即使中间或是因经验不足等有所挫折，只要理论路线提的正确，融工工作到最后必然能够成功。燎原大群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分子，只一昧说着融工，却忽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无限拔高和无脑维护上级同志的权力，忽视基层同志们的民主意愿、破坏应有的民主权利。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证组织融工，但实际上是拿融工的借口维护自己在组织的统治地位、保证对其他同志的控制。这是带有一定修正主义性质的赤裸裸的官僚主义，这样的组织下所进行的融工只会危害革命重蹈佳士罢工的覆辙，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党组织是融工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融工成果决定了它的组织形式、组织规模、组织力量，也决定了组织的理论制度的建设、反应了其建设程度。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出时，党组织还只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织或小学派。而在暴力革命期间一个国家范围内融工成果的最高集中是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它是在马列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融工工作的成功展开下的必然结果，是对“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运用到高把握的证明。

因此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问题，**融工为党组织的建设提供现实物质依据，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进一步促进融工工作的开展。**
这反作用于融工，体现在列宁同志根据当下的各马克思小组的融工工作以及其组织状态，指出了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存在的手工业方式问题，并做出了对应措施，要加强党的联系，建立区别于革命组织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说明了，在融工工作陷入停滞时，党组织的制度理论建设的正确与否决定了融工工作的下一步进展是进步还是退步，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壮大还是削弱。

唯政治报论的“前进报”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虽然肯定了在革命总路线下政治报的绝对正确性和必要性，但是却无视其背后的融工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程度，执着于其形式。在这里就提到了“融工”和“政治报”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和“融工”与“党组织”的辩证关系类似，**融工为政治报提供报刊工作所需的现实材料稿件，而政治报反作用于融工，党组织的政治报部门在其他必要措施做好的同时集中材料为融工提供有效的鼓动经验，并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中将各个党组织联合起来。**
唯政治报论者不懂两者的辩证关系，无视政治报的物质条件，空谈政治报建设的必要性。只注重形式的建报建党，这种只在原则上重复正确性而不在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行为，是真正反逻辑、反«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关于融工和党组织、融工和政治报、政治报和党组织的辩证关系问题讨论

在最近的文章«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中提出了有关“融工和政治报”、“融工和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明确观点。

较以前那种把“融工”、“政治报”、“党组织”的关系进行互相切割、或只进行在功能影响关系方面上的讨论。可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进步，但文章所讲的主要专注点在于批判东风的错误路线和机会主义倾向，而在进一步详细说明这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够的。所以在此我管见所及，讲一讲应当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

若想要实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这就需要一个与群众产生广泛联系、由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所组成的强力政党。
要实现这两点，就需要同志们进行积极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缺少其中一点，我们所要的那种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就建立不起来。**这一定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一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其中融工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社会物质基础，党组织则是它的社会力量体现（或社会组织形式）。**
工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性质;正如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
”，也因此**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性质、决定了融工的性质。**
在党还未是党而只是一个小组织的时候，由于才刚刚成立且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小组织的理论建设方面势必会与各种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理论斗争后的成果将会决定之后融工的策略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得到继续发展还是滑向修正主义为其所用。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在与敌对力量的攻击下，与中间力量的有条件合作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敌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当下革命任务的策略，决定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与否。**
当革命力量处于劣势、敌对力量优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保留实力、暂时撤退、暗中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积极宣传，随时做好文革和再次暴力革命的准备。当革命力量处于优势、敌对力量劣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当将革命成果尽可能扩大化并在关键时刻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革积极反修反帝。同理，社会在革命时期最终导向何处、是否能建设成功，取决于那时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革命地位的力量的多少，在封建奴隶制度就是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在这个国家内，势必还有资产阶级的敌对反动势力存在、还有滋生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因此这一时期处于革命地位的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只是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敌众我寡，社会主义是敌寡我众的力量对比。东风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分子，无视革命力量极度劣势、敌对力量极度强大的当下，不懂得“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对外呼吁建立融工“只要平均”的机会主义观点。在革命形势弱小的时候拉低融工成员标准，反对融工队的成员首先应当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这种把融工队的任务目标狭隘化、融工工作危险化的观点，应当坚决抵制。

融工和党组织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基本矛盾;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某一时期中。**一般地讲，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历史发展中，融工起决定作用**
，它促进发展了党组织、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体现在最初持革命立场的知识分子接触了工人无产阶级后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初次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后面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力量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它加速或阻碍融工的进程。当党组织阻碍融工，使其具有狭隘的、危害革命的倾向时，只有坚决与党组织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作批判、与机会主义修正分子作斗争，建设好党组织的理论制度，发展好党组织的理论，把党引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才能挽救革命，保证融工乃至于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争取群众支持、扩大在群众间影响力、保证党组织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工人无产阶级），建设党组织、为党组织输入新鲜血液挖掘先进分子、为党组织提供鼓动材料、为党组织提供理论建设依据的工作称之为融工。融工是区别于狭隘的组织工作，如：只在厂外调研、只在线上宣传、只在学校办公室、只求工人工会等。**融工工作是在确立政治灌输的绝对领导、在无产阶级广泛存在的地方（如工厂、铁道、矿井等）、在贴合在无产阶级现实情况、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下所进行的。**

具有一定工作能力、一定理论水平和一定革命觉悟的条件的融工分子，是融工的首要因素。
融工者是融工的主体，是活的融工力量。融工方法的创造与实践是由融工者所进行的，因此不能忽视人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同时期条件下，融工者的能力和目的往往都会决定具体的融工工作的进展。

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是融工的工作对象，也是融工的社会物质基础。无产阶级群众无或有意识地指导了融工的工作目的、工作方向，并让自己也加入到融工工作中来。

融工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的物质根源，在暴力革命时期，它促进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促进了反修反帝的运动的成功进行;且都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自发的无产阶级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在我国官僚资本修正主义制度下，用马列毛理论武装的融工力量，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融工力量。**
这样的力量即使中间或是因经验不足等有所挫折，只要理论路线提的正确，融工工作到最后必然能够成功。燎原大群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分子，只一昧说着融工，却忽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无限拔高和无脑维护上级同志的权力，忽视基层同志们的民主意愿、破坏应有的民主权利。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证组织融工，但实际上是拿融工的借口维护自己在组织的统治地位、保证对其他同志的控制。这是带有一定修正主义性质的赤裸裸的官僚主义，这样的组织下所进行的融工只会危害革命重蹈佳士罢工的覆辙，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党组织是融工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融工成果决定了它的组织形式、组织规模、组织力量，也决定了组织的理论制度的建设、反应了其建设程度。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出时，党组织还只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织或小学派。而在暴力革命期间一个国家范围内融工成果的最高集中是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

党，它是在马列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融工工作的成功展开下的必然结果，是对“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运用到高把握的证明。

因此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问题，**融工为党组织的建设提供现实物质依据，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进一步促进融工工作的开展。**
这反作用于融工，体现在列宁同志根据当下的各马克思小组的融工工作以及其组织状态，指出了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存在的手工业方式问题，并做出了对应措施，要加强党的联系，建立区别于革命组织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说明了，在融工工作陷入停滞时，党组织的制度理论建设的正确与否决定了融工工作的下一步进展是进步还是退步，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壮大还是削弱。

唯政治报论的“前进报”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虽然肯定了在革命总路线下政治报的绝对正确性和必要性，但是却无视其背后的融工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程度，执着于其形式。在这里就提到了“融工”和“政治报”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和“融工”与“党组织”的辩证关系类似，**融工为政治报提供报刊工作所需的现实材料稿件，而政治报反作用于融工，党组织的政治报部门在其他必要措施做好的同时集中材料为融工提供有效的鼓动经验，并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中将各个党组织联合起来。**
唯政治报论者不懂两者的辩证关系，无视政治报的物质条件，空谈政治报建设的必要性。只注重形式的建报建党，这种只在原则上重复正确性而不在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行为，是真正反逻辑、反«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为什么有这么多分歧？各网络马列毛组织的问题分析

本文的原则：反对把阶级史、党史、党的原则和策略混为一谈，反对阶段论的历史观。

> 第一部分：统一的理论与科学思维的贫乏
>
> *第 二部分：如何以科学的思维总结统一起这些理论路线的成功果实？以及对部分错误的举例。*
>
> *第三部分：关于融工和党组织、融工和政治报、政治报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讨论。*

正文：

第一部分：统一的理论与科学思维的贫乏

有这么几个错误现象：**
①指责对方路线理论错误，最后却发现虚空打靶打错了地方或打错了人；③文章经常引经据典自以为正确，结果发现实际有很大漏洞造句（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名言），无法思考自己的思想；④试图通过无数模仿列宁修辞和语气的文章和小册子来过度夸大自己的重要性；④折中主义,以一种特点，不加批判地假定新的比旧的好，另一种特点，无理由地拒绝理论的连续性；⑤教条主义，即习惯于把经典理论文本和理论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无可批判的东西；⑥反对任何质疑;⑦快速回应、懒惰阅读或将争论简化为愤怒的评论战；⑧缺少科学思维，似乎不知道称某一事物为科学意味着什么;⑨认为相对于列宁同志那时期的理论路线，应当要采取新的“适应当下”、“创新”的理论，但往往是非实践的空想或是对以前错误的重复。 **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发生？以前列宁等前辈同志们已经把路线、历史条件、现实环境等等基本上都展示给了我们，告诉我们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条件下应当是什么样的路线，也告诉了我们他们那时在找到正确路线前是怎么探索的大致过程。理应，有了这些成功经验与成功的路线，往后的同志应当是会更加团结。但在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的普遍事实（可视的）是：**组织力量较分散，组织实践较缺乏。**

这是个“本不应该有”的事实，也因此说明了我们在理论方面存在着应该解决但是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在我目前看来就是：**“现马列毛组织缺乏作为一名科学家所有的素质;从百年前到现在，没有同志进行如像牛顿那样‘对物理学各领域的成就收集起来并综合总结出统一的规律’的事情。”**
换而言之，现在的理论路线**缺少实质性的统一总结，对于理论路线没有一个确立的整体规划、大多同志都缺少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专注于分散的对各类错误现象就事论事的批判总结**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错误现象进行批判是不好的）

有同志可能会问，在组织里，不就是要有统一的路线吗，为什么我却仍说现在需要有统一的总结规律？是的，在组织内，必须要有统一的路线统一的行动，这是组织的原则之一。可是，现在组织的路线仍然不够统一。对各类有错误的事情进行批判，这当然好，可是在这之后，对于各类批判的材料却没有专门

的收集和总结。仅仅只是“这届”的同志知道对错了就行，接着就把批判的文章放到图书馆里封存起来无人问津，直到“下一届”的新同志犯了相同的错后，批判的文章才会被重新拾起甚至于被遗忘，而又让同志们耗费精力重新写相同内容的文章。这样的情况，就是组织路线不够统一的一种表现。我们应当要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应当是能够通过正常的逻辑，是可以通过大白话讲诉的革命科学**。既然能够证明这门科学的正确，特别是比如现在的我们所有人证明了融工路线的正确，那么这种融工路线的正确就应当要有**专门的文章即“实验论文”**来尽所能说服各同志们–也就是各革命科学家们,而**“实验论文”的证实者就是列宁那时的和我们现在的融工同志**。

因此，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把各前辈成功理论路线上的成就进行统一总结的文章**。但是就我个人感受：**似乎各个马列毛组织都默认列宁同志的各种作品（如列宁全集）就是当下暴力革命统一总结的理论路线彻底完成之作**（这很奇怪，到底是谁定下来的规定）。因此出现了仅根据列宁作品里的只言片语，就搞出了“新路线、新理论”的各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作为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域的科学家，我们对待科学的关键是要根据迄今为止的真理所产生的工具，按照科学的目标来实践科学。

有同志可能会拿«打破传统叙事：一个全新的早期国共合作史»这篇文章或者相似的例子举例，说：“我们现在**相对**于未来的目标，现在没有基础去实现，当我们具备需要的条件时，建设全华政治报就变成正确的了。也因此现在做这个对革命工作几乎没有实质推动，那就可以说是**相对**错误的。”

首先要夸赞这位同志基本上说的没有问题，能梳理好组织的路线到底应该怎么走。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问题不是什么相对于什么是错误的，什么相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而是另外两个问题：**①在组织的党的总路线上到底哪些条件是暴力革命所必要的，换言之在组织的党的暴力革命总路线上哪些条件是绝对正确的。②若要实现这些在总路线上绝对正确的条件，它们所需要的条件又应该大致（或必须）是什么？**

引用《毛主义理性批判》的一段话：“…这些科学家**不是随心所欲地发展科学，而是在过去直接遇到的情况下发展科学**。也就是说，正如在其他学科工作的科学家并不是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重新创造他们的科学领域，而是实际上按照已经确立的真理来工作一样（除非他们偏离到伪科学的领域上），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也是在**整个科学所形成的约束条件下工作的**。对于发展至今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严格论证过的那样，这些制约因素是由以下工具决定的：**先锋党、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和人民战争**。”

第二部分：如何以科学的思维总结统一起这些理论路线的成功果实？以及对部分错误的举例。

面对这一情况，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提前声明清楚作为一个组织的原则之一，即：**“党和组织从创立开始就必须要确立立场和目标（体现在纲领、制度、路线方面），党组织的一切行动和应对措施都必须是为了实现与坚持这些立场和目标。”**所以到底要怎么统一总结先辈的路线？**我仅提供我个人的思路，供各位同志们参考。**

我总结推理的方法是：**首先确定长远的未来目标**，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就是“实现暴力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再由这个未来的目标**往前推理，由大目标逐步推演到小目标**。也就是**先确立根本的最终需要，然后按这个需要推出解决措施，如果解决措施没有能力执行，则把这种解决措施作为一个新的需要并推出其对应的新的解决措施**。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先总结出实现“最终目标”的“大**绝对** 条件”，再往下总结出实现“大**绝对** 条件”的“小**绝对** 条件”，逐步往下递推。

当然，并不是所有“需要”，“正确的解决措施”，“目标所需的各种正确条件”我们都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很有可能还搞错了它们，这就需要通过理论在实践中检验才能够知道。

我再用如下的推理过程进行举例，来让同志们明白我所说的方法。（举例过程只是大概，且实际过程需要更多讨论）。

我们党与组织的具体立场目标是什么，其后的所需条件是什么：①首先我们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党与组织且任何党或小组都**必须要有其总纲领和活动原则**，因此**原则是民主集中、一致行动、自由讨论、自由批评**。**最终目标必须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②组织的目标有了，当下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之一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需要具体的现实条件才能实现，那么我们所需的条件是什么？
建立广大且牢固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和部分非无产阶级可团结的力量基础。

③建立广大牢固的力量基础的条件是什么？
俄国革命前夜进行的政治鼓动最终措施是全俄政治报，其背后本质条件是在措施开展前国内就已实现了“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通过小组建立起来的具有实际基础的政党，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

④这些联合的各政党组织它们的条件应当是什么？
首先联合战线要能够做到优先满足实现全面的、经常性的政治鼓动的各种根本性需求，这本质就是各政党要具有足够的实际基础！

⑤建立实际基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在建立广大牢固的力量基础前（即联合前），它们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中有相当稳固的影响力。*

⑥（列宁那时期）如何在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中取得稳固的影响力？ *不清楚，我们可以试试秘密的工人学习会，周刊月刊，融工等各种媒体媒介。*

- ⑥-1我们的宣传效果不佳，提高宣传效果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发现** 对工人群众宣传效果最好的条件就是到工人中去** ，因为这能够真正有效地接触到他们并保留壮大组织的力量。但即使这样** 组织工作上仍有不佳** ，这是因为我们** 处于狭隘的手工业方式** ，我们需要尽可能破除它！*

⑦既然融工效果最好，那么到工人中去的条件应当是什么？ *历史证明，个人无组织性的融工无法取得有效进展，党组织应当要创建一支融工队去进行融工！*

- ⑦-1融工队的工作目的是什么？ *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在着手本厂政治工作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经济斗争的动向，对有经济斗争发生的工厂做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对于初次融工的融工队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并领导工人运动。*
- ⑦-2对于出现的**手工业方式的问题和实践出来的融工路线** ，融工队最初成立的物质条件是什么？ *根据列宁的** 证明文章«怎么办»中的«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需要在** 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以降低手工业方式的危害** 。并在随后融工的同时，** 实现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以彻底解决手工业方式！**

……举例完毕。

我为什么要这样推理？首先再次强调，我们是革命领域的科学家，科学家应当要拿实验事实也就是实际实践说话，这样才能证明对错并再加以分析原因。而且在我们确立一个新行动时是不能够把原则目标和之前实践得到证实的正确结论给抛弃光。如经济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往往只注重眼前，往往忘记了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策略，**忽视了**
自己目前所做的经济斗争等的策略只是**为了探索路线或是为实现路线的一种暂时过渡** ，而只**把经济斗争本身当成了唯一的目标** 。

如果组织一旦通过积极实践找到了正确的路线，那么此前探索路线时所做的各种方法**除非是为了用于能够开展正确方法而被迫进行过渡，即有了新的需要和其对应的新处理措施**
，否则就应当立即采用得到的正确方法来实现路线。

什么叫被迫的过渡？例如，我知道必须要进行全面政治鼓动，但在1895年我只能用传单进行片面的鼓动，无论我怎样强调政治鼓动的意义，怎样强调全面鼓动的必要性，实际能做到什么程度却又是另一码事了。

再拿一个现在各大小组织的情况举例，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融工，但要形成一个能够正常进行线下工作的融工队，它的人选基本上是不能、也不应该是随随便便聚几个人，几个口号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对于我们马列毛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融工队的人选，至少必须是经过组织同志们的认真筛选与信任得来的。

现在全中国各组织的工作几乎都是手工业方式，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与列宁同志那时期的组织有不同，我们是有着明确政治性的融工目的**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手工业方式的业务其真正目的是在哪里–那就是为了去融工！在我们线下融工队**还无法实现融工队伍的自我再生产的情况下**
，若想要得到一支相对可靠的融工队，除了线上组织这种方式外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方式。也因此，这就是一种被迫的，也可能是必需的一种过渡，是一种新的需要、要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当然，一旦线下的融工队能够实现良好的自我再生产时，这种过渡的手段就要迅速地逐步使之不再成为组织的主要精力投入所在。这也就说明了**组织的原则、组织的制度、组织的执行力（执行力度）、组织力量基础这些都不能当一码事**
。那么，就拿这一点好好看我们的各组织吧，我们处理自己组织的业务是否能够做到各方都互相契合呢？是否做到了在现”手工业方式”时期所能达到的最好呢？

既然谈到手工业方式，因为这词被提到的相当多，那我们就正好来拿这举例。

有一些同志对于手工业方式有着莫名的抗拒，认为组织就不能和手工业方式沾边，急于摆脱它。很明显，这是犯了阶段论的错误，这些同志能够明白手工业方式的组织工作对于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多么低效与无益，但是却不思考列宁那时期的手工业方式的组织与我们当下的手工业方式的组织有什么区别。**仅仅就是因为两个时期的组织都是在做手工业方式的工作，就认为我们和以前一样是处在只“局限于”手工业方式的时期，急于打破，企图一飞冲天，想让组织立刻就转到非手工业方式的“阶段”**
。在我看来这是受形式限制导致的不切实际的阶段论历史观的幻想。

组织的最终路线，目标一旦确立，特别是对于现在手工业方式的组织，当他们**通过了解前辈总结的经验、明白并立即确立了融工的目标后（而不是之后确立，那和经济派就没有区别了），其组织的性质将与列宁写出«怎么办»前那时候分散的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组织有根本上的不同**
，拿融工讲就是政治派与经济派的不同（一个有根本的长远目标，另外一个就只是满足于此）。在真正确立了融工与组织目标并为止奋斗时，组织内手工业方式的业务的作用将**不仅仅是局限于它在政治灌输方式上的狭隘与狭小，而是有了新的作用**
–实现融工队的建立并同时逐步成立真正的职业革命家组织
（这意味着统一的革命组织是能够在融工前成立的）。组织内的手工业方式将会尽它的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来实现它的自我消亡，去实现对政治目标真正广泛的有效的政治灌输和组织工作，完成这一切后这时的组织才能真正算的上是非手工业方式的。

也因此，这种确立了融工与有组织目标的手工业方式，只能说是一种被迫的过渡手段，是一种新的需要产生下的新的应对措施。即由“需要创建融工队”导向“创建融工队的所需条件”，由“需要解决手工业方式”导向“解决手工业方式的所需条件”。对“手工业方式”的极端洁癖行为只会葬送革命。

“最喜欢重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一说法的人，通常会引用一门科学的经典理论文献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其立场/做法的正确与否。但是，断言科学的地位并不是权威论证：生物学家不会通过引用达尔文的话来证明**假设**
的科学性，尽管达尔文参与的过程
为科学调查和干预提供了理论公理。科学主义赋予科学以宗教的地位，赋予科学以圣典和先知，但这不是科学。”– *«毛主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Maoist ReasonJ Moufawad Paul»

所以在忽视前置现实条件需要的情况下把某个目标当作当下原则性的奋斗纲领提出来，这种推理方式下组织总路线政治本身就已经是**主次不分** 了。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把自己当作一门科学时，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在包括毛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重演。如上所述，最大的错误是**完全取消了科学的资格，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出的理由，这也取消了科学的理论意义，**
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而被概念化并由此产生的 。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错误是，**尽管一味地宣称科学的名称，却无法思考科学的概念意义**
，因为它已经进入了当代毛主义的理性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模式，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的概念，并公开接受这一概念，但由于他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方式，似乎不知道称某一事物为科学意味着什么。当代毛主义者也常常陷入**
这种模式 。”–«毛主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Maoist ReasonJ Moufawad Paul»

这种不知道“似乎不知道称某一事物为科学意味着什么”的情况，我可以断定在很多同志上都存在着。就比如下面这个为众人常提到的例子：要让自发的工联主义变成自觉的工人先锋队。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有些同志看到这些词仅仅只是**意识流般模糊概念地接触这些词，并没有实际认识到真正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只是因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所以在看文章时认为这种用词与证据的逻辑推理就一看而过大概了解就可以，等着看到最后导师同志出的结论就行了，因为我看的是“科学”嘛！因此在看完了文章后，这些同志们不会知道自发的意思是“**人未掌握必然性的规律，而仅仅被狭隘的环境所驱动**
”、也不会知道自觉的意思是“**人掌握了必然性的规律，受必然性规律所指引并反过来利用必然性服务于自身**
”。由于**因为没有通过真正的科学证据论证来真正了解到结论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这些同志们也会在此基础上无法成为一名真正自觉的同志，将仍会在自发或半自觉的状态中渡过相当的时间。

所以这种无意识忽略的行为（甚至是有意识选择性忽略）是对于我们的革命是十分不利，会使组织走向本本主义或折中主义，使革命走向危险。同志们应当响起警钟注意。

当然前面说的话不意味着抠字眼是正确的，也要避免抠字眼的情况发生，因为抠字眼本身也是反科学的行为。

最后稍微提一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哲学负责明晰和改造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为科学弄清楚部分概念上的定义。而科学又会为哲学提供实证上的材料加以发展。因此作为一名革命科学家，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必要的。

第三部分：关于融工和党组织、融工和政治报、政治报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讨论。

在最近的文章«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中提出了有关“融工和政治报”、“融工和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明确观点。较以前那种把“融工”、“政治报”、“党组织”的关系进行互相切割、或只进行在功能影响关系方面上的讨论。可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进步，但文章所讲的主要专注点在于批判东风的错误路线和机会主义倾向，而在进一步详细说明这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够的。所以在此我管见所及，讲一讲应当是怎样的辩证统一关系。

若想要实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这就需要一个与群众产生广泛联系、由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所组成的强力政党。
要实现这两点，就需要同志们进行积极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缺少其中一点，我们所要的那种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就建立不起来。**这一定的融工和党组织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一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其中融工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社会物质基础，党组织则是它的社会力量体现（或社会组织形式）。**
工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性质;但正如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
那样，也因此**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性质、决定了融工的性质**
。在党还未是党而只是一个小组织的时候，由于才刚刚成立且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小组织的理论建设方面势必会与各种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理论斗争后的成果将会决定之后融工的策略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得到继续发展还是滑向修正主义为其所用。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在与敌对力量的攻击下，与中间力量的有条件合作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敌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当下革命任务的策略，决定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与否。**
当革命力量处于劣势、敌对力量优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保留实力、暂时撤退、暗中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积极宣传，随时做好文革和再次暴力革命的准备。当革命力量处于优势、敌对力量劣势时，在暴力革命时期应当将革命成果尽可能扩大化并在关键时刻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革积极反修反帝。同理，社会在革命时期最终导向何处、是否能建设成功，取决于那时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革命地位的力量的多少，在封建奴隶制度就是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在这个国家内，势必还有资产阶级的敌对反动势力存在、还有滋生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因此这一时期处于革命地位的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只是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敌众我寡，社会主义是敌寡我众的力量对比。东风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分子，无视革命力量极度劣势、敌对力量极度强大的当下，不懂得“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对外呼吁建立融工“只要平均”的机会主义观点。在革命形势弱小的时候拉低融工成员标准，反对融工队的成员首先应当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这种把融工队的任务目标狭隘化、融工工作危险化的观点，应当坚决抵制。

融工和党组织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基本矛盾;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某一时期中。一般地讲，**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历史发展中，融工起决定作用**
，它促进发展了党组织、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体现在最初持革命立场的知识分子接触了工人无产阶级后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初次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后面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力量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它加速或阻碍融工的进程。当党组织阻碍融工，使其具有狭隘的、危害革命的倾向时，只有坚决与党组织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作批判、与机会主义修正分子作斗争，建设好党组织的理论制度，发展好党组织的理论，把党引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才能挽救革命，保证融工乃至于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争取群众支持、扩大在群众间影响力、保证党组织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工人无产阶级），建设党组织、为党组织输入新鲜血液挖掘先进分子、为党组织提供鼓动材料、为党组织提供理论建设依据的工作称之为融工。融工是区别于狭隘的组织工作，如：只在厂外调研、只在线上宣传、只在学校办公室、只求工人工会等。**融工工作是在确立政治灌输的绝对领导、在无产阶级广泛存在的地方（如工厂、铁道、矿井等）、在贴合在无产阶级现实情况、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下所进行的。**

具有一定工作能力、一定理论水平和一定革命觉悟的条件的融工分子，是融工的首要因素。
融工者是融工的主体，是活的融工力量。融工方法的创造与实践是由融工者所进行的，因此不能忽视人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同时期条件下，融工者的能力和目的往往都会决定具体的融工工作的进展。

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是融工的工作对象，也是融工的社会物质基础。无产阶级群众无或有意识地指导了融工的工作目的、工作方向，并让自己也加入到融工工作中来。

融工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的物质根源，在暴力革命时期，它促进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促进了反修反帝的运动的成功进行;且都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自发的无产阶级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在我国官僚资本修正主义制度下，用马列毛理论武装的融工力量，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融工力量。这样的力量即使中间或是因经验不足等有所挫折，只要理论路线提的正确，融工工作到最后必然能够成功。**
燎原大群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分子，只一昧说着融工，却忽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无限拔高和无脑维护上级同志的权力，忽视基层同志们的民主意愿、破坏应有的民主权利。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证组织融工，但实际上是拿融工的借口维护自己在组织的统治地位、保证对其他同志的控制。这是带有一定修正主义性质的赤裸裸的官僚主义，这样的组织下所进行的融工只会危害革命重蹈佳士罢工的覆辙，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党组织是融工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融工成果决定了它的组织形式、组织规模、组织力量，也决定了组织的理论制度的建设、反应了其建设程度。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出时，党组织还只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织或小学派。而在暴力革命期间一个国家范围内融工成果的最高集中是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它是在马列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融工工作的成功展开下的必然结果，是对“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运用到高把握的证明。

因此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融工”与“党组织”辩证关系的问题，**融工为党组织的建设提供现实物质依据，而党组织反作用于融工，进一步促进融工工作的开展。**
这反作用于融工，体现在列宁同志根据当下的各马克思小组的融工工作以及其组织状态，指出了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存在的手工业方式问题，并做出了对应措施，要加强党的联系，建立区别于革命组织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说明了，在融工工作陷入停滞时，党组织的制度理论建设的正确与否决定了融工工作的下一步进展是进步还是退步，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会壮大还是削弱。

唯政治报论的“前进报”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虽然肯定了在革命总路线下政治报的绝对正确性和必要性，但是却无视其背后的融工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程度，执着于其形式。在这里就提到了“融工”和“政治报”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和“融工”与“党组织”的辩证关系类似，**融工为政治报提供报刊工作所需的现实材料稿件，而政治报反作用于融工，党组织的政治报部门在其他必要措施做好的同时集中材料为融工提供有效的鼓动经验，并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中将各个党组织联合起来。**
唯政治报论者不懂两者的辩证关系，无视政治报的物质条件，空谈政治报建设的必要性。只注重形式的建报建党，这种只在原则上重复正确性而不在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行为，是真正反逻辑、反«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群众路线的起源和发展

实践和思考可能逐渐锻造出许多艺术 。——维吉尔

译者注：

> 1.*本文翻译自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斯科特*.哈里森（Scott.Harrion)的《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的第32章。原文来自：https://www.massline.info/mlms/mlms.htm
> 2.本文阐述了作者对于群众路线的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并运用了历史唯物的发展观点去分析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
> 3.任何的理论都不会是一蹴而就地蹦出来，也不会是来自于某个大人物的顶层设计，它必须来自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即是在不断地试错和总结中得出的，并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形成、发展、推翻。

群众路线的理论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其他部分或物理科学的任何理论一样，有其起源和发展历史。它并非一直存在，也并非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然诞生。

自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开始的早期革命活动以来，关于革命领导的正确和错误方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这十六个十年里，无产阶级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这些成功和失败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学到了许多领导的基本原则，并且经常非常好地利用它们。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领导仍然只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被隐含使用的原则已经被科学地总结出来，以至于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艺术已经成为——虽然只是部分地——无产阶级领导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两个进步是：1）无产阶级党的组织原则的阐述，包括其结构和领导群众的角色，这主要归功于列宁，和2）群众路线理论的阐述，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

在说群众路线的理论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我并不希望否认列宁和毛之前的其他人有时非常成功地使用了群众路线方法；事实上，如果没有使用群众路线方法，十月革命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毛之前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些方面。这篇论文中已经提到了许多这些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中还会发现其他方面。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完全意识到的理论的水平，他阐述了它，指出了它的各个方面或元素及其相互联系，这确实是他的一项伟大成就，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此感激。

当然，早在马克思主义存在之前，就有一些人认识到了群众的智慧，他们也许可以被认为对类似群众路线方法有所了解。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评论说：“为了做大事，不必超越其他人，只需与他们在一起。”[1]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现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有意识地寻求从有直接经验的群众那里学习物理现象的科学解释。他在他的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32）中总结和编纂的力学的

科学原理，他主要是从制造和试验大炮和其他武器的工匠那里学到的——正如他在书的第一句话中感激地承认的那样。伽利略还说过：“我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无知的人以至于我无法从他那里学到哪怕一点东西。”【2】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托马斯.潘恩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伟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和他著名的小册子《常识》（1776）。《常识》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品之一；它在为反对大不列颠的革命战争准备公众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潘恩汇集了大量的论点，反对一个遥远的岛屿统治一个大陆的荒谬，反对国王的整个观念，赞成共和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但是这些论点绝不是潘恩原创的。

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写道
约翰·亚当斯总是对《常识》被认为对独立运动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感到不满。他坚称，关于那个主题的讨论，只是“我在国会反复强调了九个月的论点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是对的，但他没有理解潘恩小册子的天才之处。《常识》确实表达了在殖民地中流传已久的观念——美洲与欧洲的分离，旧世界的腐败和新世界的纯真，世袭特权的荒谬和未来美国帝国的可能性。这些观念都不是潘恩原创的。真正创新的是潘恩如何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全面的论点，并将它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经验联系起来。[3]

潘恩从四面八方收集他的论点，这些论点和观念在少数群众中酝酿已久，他选择了这些论点中最先进、最激进的，这些论点在那种情况下最有效，并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极其强大的革命路线。然后，这本小册子以当时的巨大数量传播出去——它被返回给了群众——并被他们采纳为前进的道路。福纳引用了一个对潘恩说的人的话：

你已经表达了数百万人的情感。你的作品可以恰当地比作一场洪水，席卷一切。我们曾经是盲目的，但在阅读这些启发性的文字后，我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4]

此外，潘恩对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是一个工匠，他故意以群众的风格为群众写作：

《常识》，以一种旨在吸引广大读者的风格写成，是美国政治争论和参与的爆发核心，它打破了狭窄的精英阶层的界限，影响了“所有阶层”的美国人。关于《常识》的第一件事，当代人注意到的是它的愤怒的语气——当代人认为潘恩的“大胆无礼”和“不寻常的狂热”，与以前的美国政治小册子的法律化、逻辑化的论点与其中“得体和合理”的语言相去甚远——潘恩是政治写作新风格的有意识的先驱，这种修辞旨在将政治讨论扩展到18世纪的“政治国家”的狭窄界限之外。“因为我打算让那些几乎不会读书的人理解，”他曾经写道，“所以我将避免任何文学装饰，并用像字母表一样简单的语言表达。”他假定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权威的知识，为他使用的少数拉丁语短语提供即时的翻译，并避免花哨的语言，以打动更有修养的读者。[5]

尽管在历史上绝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例子，但我所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成功使用的最好的例子。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还不完全是群众路线。因为按照适当的定义，群众路线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集中群众的思想，所以，严格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群众路线是不存在的。

《共产党宣言》

群众路线的最初使用是什么？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遵循的程序！（马克思主义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就像人类的知识一般！）

毛泽东曾经反问，马克思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通过在他年轻时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吗？显然不是；他和恩格斯从非马克思主义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德尔克·J·斯特鲁克（Dirk
J. Struik）在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直接点出了我的观点：

《宣言》代表了思想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社会主义在许多不同的学派和教派中蓬勃发展，是一种混合了辉煌的洞察、充满希望的愿望、激进的呼喊和大胆行动的混合物。它是不连贯的，其过程就像一艘船被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水面，无法设定自己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是寻找许多理论中的健全元素，用当代最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以及革命斗争的积累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发现。他们将他们的发现整合到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就像每一个伟大的理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起源于对散乱的事实和教条的创造性综合，许多已经知道的，但现在被新的和更深入的洞察所照亮。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领域提升到了科学的领域。【6】[{{21

斯特鲁伊克指出，这种综合基本上是在1843年到1845年之间完成的，接下来的三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进一步的自我澄清，通过政治斗争和历史经济学的研究来检验他们的观点。”然后在1848年2月，新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

我希望你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循的程序与本书中介绍的群众路线理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收集了许多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用当时最好的社会理论（即使那时只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和对历史（过去的经验）和客观情况的研究来处理这些观点，然后将浓缩和强大的结果以仍然困扰资产阶级的形式返回给群众。这无疑是一种直观的程序，但是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似乎确实是这样，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彻底的，尽管仍然是隐含的和直观的程序，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教条。随着教条的发展，方法也在发展。

提升群众路线到意识理论



毛泽东在延安 1943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开始了群众路线革命领导方法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出现和使用，尽管因为它仍然是无意识的，并且留在艺术而不是科学的形式中，必须承认，它的应用通常不如可能的那样一致和彻底。

作为一种完全自觉的领导理论，群众路线只是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开始制定的。毛泽东本人在1948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在谈论群众路线。【7】这将使群众路线理论的起源定位在大约1936年；换句话说，就是在延安时期的开始。【8】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第一份详细的书面描述出现在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SW3:117-122)，尽管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

我不知道谁最早开始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来指代现在以这个名字被称呼的革命领导方法。显然，这个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它被归功于包括周恩来【9】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关于"群众路线"这个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章下文和第37章。

然而，在他的经典1943年的论文之前，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简短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例如，在他1942年的著名演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那些懂得革命政治科学或艺术的政治专家，只是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家——群众的领导者。他们的任务是收集这些群众政治家的意见，筛选和提炼它们，然后将它们返回给群众，群众然后接受它们并将它们付诸实践。【10】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之前，毛泽东就在这里那里谈论了最终被称为群众路线的各个方面。甚至他在1919年写的一篇杂志文章"人民的大联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包含了一些群众路线的暗示，包括对群众智慧和力量的极大尊重，以及对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斗争作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唯一途径的极大赞赏。【11】

毛泽东并没有一下子就阐述出群众路线的理论。相反，对他早期著作的研究显示，早在他1943年的经典论述之前，就有许多步骤朝着这个理论的方向迈进。此外——这是大多数评论群众路线的人未能认识到的一点——即使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本身也没有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所有方面进行完整和详尽的描述。由于即使是对群众路线表示同情的汉学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有时会争论说"群众路线的概念……甚至被毛泽东自己定义得相当模糊"。【12】

我已经在第二章强调过，毛泽东在1943年的经典论述中并没有涉及群众路线理论的所有方面，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是提醒读者，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在许多后来的场合进一步阐述群众路线的理论，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方法的第一个总结，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总结。但坦率地说，回顾近50年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澄清和详述了许多观点，那篇论文本身已经不能被认为是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例如，这篇论文并没有充分解释"集中"和"系统化"群众的观点是什么意思。马克思主义在此中的作用并没有被讨论（尽管毛泽东在后来的著作中已经充分明确了这一点）。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到：群众路线的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的结果。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声称，群众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之前，例如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1-1934年），甚至更早【13】。这里的混淆来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之前就使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但是列宁和马克思在更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也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一样，或多或少地无意识地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方法。但是只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才开始科学地总结这种实践背后的理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毛泽东明显将群众路线归功于列宁。我已经把毛泽东称为群众路线的创始人；但毛泽东自己经常似乎把这个荣誉归功于列宁，如下面的三个例子：

我们扩大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依赖群众…[14]

我们遵循列宁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15]

我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中学习。马克思留给我们很多著作，列宁也是。依赖群众，遵循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16]

然而，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谈到"我们的群众路线"等等；他把群众路线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发展。[17] 此外，中国共产党和其成员经常把群众路线归功于毛泽东。[18]
对于这个"悖论"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列宁确实使用了群众路线，并在许多场合提到了群众的创造能力和群众路线理论的其他方面，毛泽东无疑从这里以及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学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毛泽东可能至少部分地从列宁那里"学到"了群众路线的方法。然而，是毛泽东总结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对它进行了评论和详细阐述，并成为了群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因此，无论毛泽东说了什么，把群众路线的理论归功于他是唯一明智的。

我在上面指出，在他早期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描述中，毛泽东并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本身。相反，他把它称为"把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的方法"或"把领导集团与群众联系起来的方法"。它经常被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我们党历史上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那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群众路线'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或者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他的选集中），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个熟悉的老词，显然已经在口头上广泛使用。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这种方法的惯用名词一直是'群众路线'，尽管旧的名称也一直在使用，特别是在中国。当然，对于这个词'群众路线'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观念。例如，我认识的一些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群众路线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相提并论（参见第40-41章）。

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继续发展群众路线的理论。例如，他用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一个工厂处理原材料成为成品的整个过程，来阐明集中群众思想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他反对不断出现的右派解释，比如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观点，即群众路线意味着"按照群众的意愿去做一切事情"。[19]
比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对群众路线的误解更糟糕的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提倡的邪恶的官僚、修正主义的解释。他们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将在第37章中讨论；现在我只是指出，毛泽东发动的针对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群众路线，这并非巧合。

反对右派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实际上是发展群众路线理论的一种方式，是澄清群众路线真正含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群众路线的阐述的贡献不应该被低估，仅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写出一篇长篇论文。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点，因为群众路线的理论早已不再是中国独有的关注点。随着它的传播到其他国家，也就有了必要在那些国家内部反对对它的歪曲和误解。在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将在第40章中探讨，即鲍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和革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作为革命工具的防御。

因此，群众路线绝不是死教条。没有理由相信群众路线的理论是"完整的"，或者"澄清的"，或者"一劳永逸的"。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生生、不断成长的东西，这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较年轻的部分，如群众路线这样的领导方法的理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部分都必须得到捍卫，因此必须进一步澄清，就像它需要不断地通过进一步总结革命实践来增强一样。

作者注 ：

[1] 引自阿兰·布克（Alain Bouc）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指南》(纽约：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出版社，1977年)。

[2] 引自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 Peter）的《彼得的引语》(纽约：班塔姆书社（Bantam），1979年)，第260页。

[3] 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汤姆·佩恩与革命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79-80页。

[4] 同上，第79页。

[5] 同上，第82-3页。

[6] 德尔克·J·斯特鲁克（Dirk J. Struik），《共产党宣言的诞生》(纽约：国际出版社，1971年)，第12页。

[7] 毛泽东，《语录》，第122-3页；"在山西绥远日报编辑部的谈话" (1948年4月2日)，SW 4:241-2。

*[8]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指出，"与'群众路线'相对应的观念和方法开始在毛泽东的作品中出现"，这发生在1927-1936年期间，"尽管这个概念只在随后的十年里被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

社，1989年)，第9页。]
Schram将群众路线视为"延安遗产"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同上，第86页。]

[9] 参见Stuart Schram，《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10]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SW 3:87。

[11] 毛泽东，《大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49, 1972年1月/3月。

[12] 爱德华·汉蒙德（Edward Hammond），《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4卷，#1，1978年1月，第4页。

[13] 例如，Marcia R.
Ristaino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她说"最早的共产主义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在研究期间（即1927-1928年）在中国开始的"。[《中国的革命艺术：1927年和1928年的不满情绪的动员》(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如果Ristaino的意思是最早的对群众路线详细理论的有意识的实践，那么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直到延安时期才发生。如果Ristaino的意思是最早的无意识的，或者半意识的，群众路线的实践，那么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只有当Ristaino的意思是在中国最早的无意识的群众路线方法的实践，她才是正确的。但是，这几乎不是一个启示；这正是毛泽东在1948年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时所指出的。
(参见上面的注释7。)

[14]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MMTT，第106页。

[15]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MMTT，第121页。

[1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SW 5:342。

[17] 参见例如，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约1960年，《苏联经济学批判》(纽约：MR出版社，1977年)，第119页。

[18] 参见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转载于K. H. Fan编，《中国文化大革命：选定文件》(纽约：Grove出版社，1968年)，第173页；以及，田志松，《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北京周报》，#29，1972年7月21日，第11页。

[19] 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SW 4:198。

关于集体领导问题

一. 集体领导的基础

谈“集体领导”的有很多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谈自己的“集体领导”，因此抽象 的谈集体领导并不能说明什么，“集体领导”在不同的阶级那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们认为 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些基础，否则他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

1. “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它所要领导的整个集体的共同革命利益之上，如果“集体领 导”本至上是要违背这种共同的革命利益的，那它实际上就一种异化了的并和集体相对立的 力量，它就既不代表集体、也不再进行领导。对于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集体利益 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对于不成熟的革命组织来说，这种集体利益首先是整个无产 阶级的革命利益（但这个内容对于这个时期的组织来说必然有许多是抽象的）然后是自己所 在组织群体的集体革命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必须对集体负责。

2. “集体领导”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研和了解上。它必须要充分的了解自己所负责 的直接工作和自己所要领导的工作部分，否则就是它的领导纸上谈兵的、空想的和不切实际 的。

3. “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对实际工作、工作客观条件和实际工作者的充分尊重、充分照 顾和充分发挥上，这种领导要必须充分的从实际出发又能帮助实际工作朝好的一面发展，并 能很好的照顾到实际工作者的情况。否则它就是高高在上的，它就不是在代表集体的现实利 益和推动现实工作，而是代表其他的什么利益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它是在要求现实 服务它。

4. “集体领导”的必须建立在各个领导者充分的参与相关实际工作并要为自己的领导和活 动所全部负责的基础上。领导者必要参与集体范围中足够的实际工作，并亲自对自己的领导 、 活动和各自提议所负责。一般说要起多大作用就要负多大的责任,要求集体实现多大的议题 就承担多大的责任。对于不是对集体负责并参与集体工作的或者所领导的活动不属于集体管 辖范围的“领导”，这些本质上就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个别特权对大多数劳动者或对大多数实 际工作者的剥削性的、压迫性的“领导”。

而一旦“集体领导”不能从这些基础出发，它实际上就开始变成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是一 种与集体相异化的力量。它也是特权的源泉，也是官僚主义的重要源泉。

二.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的辩证关系

集体领导必须从以上所谈的正确的基础出发才会有正确的个人分工。然后我们再谈谈这种集 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的关系。

在前一种基础上，每一层级的集体领导对自己所负责的直接工作和自己所要领导的下级工作 是充分了解、充分负责、充分发挥的。 任何领导永远离不开实际工作和实际工作者，而实际工作者也永远离不开一定的领导和一定 的工作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领导着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脱离实际工作和实际工作者 的利益的，他们代表的是剥削实际工作者的利益，他们用一整个社会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 专政来强迫无产阶级以满足于他们利益的活着，因此他们“集体领导”是剥削者的集体领导 ， 是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力量集合。而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不是这样，无产阶级从自身利 益出发，他必要实现领导和工作者的相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相同的革命利益上的，也是必 然要贯彻到工作过程中的，因为如果在革命工作过程中领导者和劳动者不统一，就会不断地 产生和共同革命利益相对立的一种利益，这种不统一从形式上来看也是产生官僚阶级的因素 之一。并且无产阶级必然还要使更多的工作人参与这种集体领导中来，并让大家为这种集体 领导提供领导依据和领导材料，这样才能更好的满足领导和工作之间共同的长期革命利益和 不断的缩小内部分工产生的差别。

集体领导离不开个人分工,个人分工也离不开集体领导,两者都是从实际出发的。集体领导必 然需要从利用各种不同的个人分工出发来完成总的实际工作，否则它就是一种没有血肉的空 壳或永不可能实现的设想；而个人分工也必要一定的领导来调整或规划他们的工作内容、工 作方向和工作方式，否则个人分工就不能不可能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推动革命的 力量和形成总的革命成果。

集体领导代表的是工作总的方面的实际情况，代表的是从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实际需求。而 这种总和只能由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实际工作者所组成，并且也只能由他们来 提供领导材料和领导依据。所以，它必然要对集体和实际工作所负责。只有资产阶级的领导 是不对无产阶级劳动者所负责的，他们只负责领导，他们领导依据是资产阶级的暴力、领导 材料是资本，而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必须时刻从集体和集体的革命利益那获得领导依据 和材料。

在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的条件下，个人分工无非就是负责集体革命事业工作中的各个不同部 分，它既要对自己所进行的工作和自己领导的部分负主要责任,也要对代表实际总体工作的 集体领导所负责。两者互相作用，互相为实现各共同的革命利益所奋斗，不断地在推进革命 的过程中不断的扩大“集体领导”的范围和程度，直到彻底在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彻底消灭 了领导和被领导区别。

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

又是一个国际五一劳动节，借此机会，我们来谈谈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与之相应产生的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个国际阶级， 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本质上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 他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一样，自然有义务去支持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全体劳动人民反抗帝国 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我们下面就此进行一些谈论。

由于过去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的发展使得全世界各个民族被分为了压迫者 和被压迫者。

在今天，在中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各种革命运动是非常必 要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 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不断在压 迫其他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暴力机关，这些暴力机关说到底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 因此当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发起斗争的时候，统治阶级完全可以将这些暴力机关用来镇压本国 人民。例如 20 年代的德国统治阶级，就曾用压迫过东欧各民族的军队，来镇压德国工人的 起义。同时代，在“非常自由”的英国，统治阶级也调用过镇压过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的部队， 来对付英国煤矿工人。在中国，1992 年邓小平选择胡锦涛作为江泽民后的国家主席的其中 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因为胡锦涛在 1989 年 3 月曾血腥镇压了拉萨群众运动，而且这件事还未 几个月后军队在天安门的屠杀开了先例。以上这些例子，无不证明了恩格斯的观点无比正确。

所以对中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主体民族的群众而言，帮助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解 放的事业，同时也就是在拯救自己。因为被压迫国家往往没有实现工业化，资本主义大生产 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在那些地方实现， 所以在那些地点，劳动人民首先需要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说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是指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一定是 符合国际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是值得我们无条件支持的。

不过我们并不因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就认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对某一特定 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动都是进步的，都是值得革命工人支持的。例如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塔 利班政权，在夺取政权没几天后，就非常积极地同该死的中华帝国主义建立了亲密合作关系。

对于朝鲜和伊朗我们也持有同样的态度。我们更不会因为俄罗斯积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欧洲 的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就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具有什么正当性（当然，我们自然也不会去 支持乌克兰政权）。

现在我们来谈谈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工人阶级相互支持的问题。尤其是为何中国工 人阶级有义务支持其他工业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自从 1923 年德国革命遭到重大挫折之后，以列宁这首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就逐渐认识到世 界革命的中心正逐渐向东方被压迫国家转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帝国 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关紧要的或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只有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当代世界各国 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同世界各地的联系空前加强，所 以国际工人阶级要想反抗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也就不得不加强自身在各国的合作，这种 合作在工人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中国而言，现在几乎任何一个沿 海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它的邻国，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大量财富其实被转移到了海外去的。过 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因此从生产的角度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是国际工人阶级中，与世界各国人民联系最紧密的分支。

但是欧美的超前消费是建立在房地产、股市等金融泡沫之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只能创造极少 的价值，甚至根本不产生价值；然而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远超实体经济的规模和 增长速度，实体经济无法满足虚拟经济的无限膨胀。这意味着，导致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各 种因素实际上在现在依然存在。考虑到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远超当年，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也基本结束，中国也不存在当年通过大量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缓解危机，促进经 济发展的基础了。所以，一旦接下来再爆发经济危机，等待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很有可能是全 面的信用体系破产和债务危机，过去这几十年来，锁在中国房地产和美国虚拟经济中的大量 超发货币将会直接涌入商品市场。到那个时候，我们讲会经历一次前所未见的世界范围内的 严重滞账危机，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和世界经济关联最密切的阶级，也必将受到最大的冲击。

换言之，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外，同样来自于整个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剥削和威胁。而要应对这些挑战，单靠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以及落后国家 的人民运动是不行的，或者至少是不够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要真正把自 己的事业看作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就必须要同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和 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团结起来。至于如何团结，以及团结的具体方式，这就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了，在国际工人运动才刚刚开始复苏的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具体将会发生什么。

无论如何，上个世纪的革命永远地改变了工业文明在世界上的分布。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像一 百年前一样，仅仅局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了。光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就 已经是对全球阶级分布的革命性改变了。这一切都说明本世纪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业国的 产业无产者将会扮演比过去更加重要的多的角色。各国无产者之间的互相支援，特别是各个 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相互支持，必将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变成现 实，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才能在政治上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阶级去对抗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任何国家的无产者都有义务促使这一前景成为现实，中国工人阶级自然也不 例外。

什么才是“第一生产力”？浅谈生产力的定义与概念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我们将从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高度扬弃了的矛盾出发，来尝试全面概述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世界观。我们首先来讨论隐藏在这对矛盾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 很多人都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然而这是不对的，是与革命马 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相违背的。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后 文探讨），人们往往混同了“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这两个有一定相关性，但差异极大 的概念。

我们日常熟悉的那种，作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现实能力的概念实际上是说的“生产能 力”，即“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定义它的“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 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 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

能，以及自然条件。”而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 上层建筑的那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即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 概念。

马克思也曾这样辨析过生产力概念，他说到“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 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 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注意，是“应用能力的结果”而非“应用能力”本身）马克 思在这里其实已经把生产力概念说的很清楚了，但考虑到特色长期以来的误导和人们自身的 各种条件限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仔细地考察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定义。

马克思不是齐泽克之流的哲学小丑，他这样定义生产力绝不是为了玩什么抽象的文字游戏来 博得左倾小资产阶级的关注，他之所以这么讲是有很强的现实需要的。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牢记一点——卡尔·马克思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意味了他的一切 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都是为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服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自从流亡伦敦以后，主要从事的就是理论工作，他们在理论界所做的一 切，自然首先是为了给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打下坚实的科学地基，从而在这之上构建起庞大 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在这个地基中，最核心的两点无疑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 唯物主义”。在这两点中，“剩余价值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的，而“历 史唯物主义”则是从做为历史结果的生产力概念出发推导出来的。

要阐明上述结论，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只有作为历史结果的生产力概念，才是那个我们 熟悉的那个能够决定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人类文明整体前进的基本要素；才是那个符合无产 阶级现实利益需要以及科学理论的生产力理论。接着我们还需要辨明为何特色和各位庸人在 这里将“生产力”偷换为“生产能力”是错误的，乃至是反动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 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 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各位同志千万莫被这复杂的定语 和后缀给吓到了，实际上生产力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是过去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社会的、 生产的和自然科学的）的总和，是我们从前人手中所继承下来的一切。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生产力是我们从‘前人’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切。” 这里我们所说的“一切”一定是从“人”手中继承下来的所有历史实践的总和，而不包括那 些未包含任何人类劳动参与的自然之物。抽象地说，在我们看来，“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只 有“劳动者”与“劳动资料”，而不包括劳动对象。

当然，我相信肯定有同志看到这里会心生疑虑，他们估计会认为我们从自然界那里获取的某 些对人类生产活动极其有益的自然劳动对象，也应该被包含在“历史总和”之中才对。然而 问题在于，无论天然的油田还是富矿的山脉，假如没有任何人类劳动的参与的话，我们甚至 根本就不可能知晓其存在，又怎么能谈得上“继承”乃至“利用”它们呢？所以这些自然劳 动对象自然不能包括在生产力之中。

如果说自然劳动对象不能被包括在生产力要素之中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我接下来说“人为劳 动对象”同样也不在其中就实在是“骇人听闻”了，但这也是不得不说的。

丁小平说的好“所谓生产力三要素说或者多要素说是以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 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说法为依据的，其理由是劳动对象等因素参与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 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决定。当然，若接受这样的逻辑，生产关系也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因为，相同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结合，其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 的能力也不同。”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现实例子来论证丁先生的观点。众所周知，农 业机械拥有量，以及机耕面积普遍被认为是判断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从农业机械年 底拥有量看，1953 至 1957 年间，我国大中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机械和农用载重机械的增长 速度分别为 62.4%，34.5%和 70.9%；1958 至 1965 年间这一数据分别为 22.1%，41.5%和 13.3%；在 1966 至 1978，则为 17%，16.4%和 15.7%（这就是经济濒临崩溃的十年浩劫！）；至于“伟大的改革开放”进行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则看到这一数据“增长”为 12.4，4.6%和 33.4%。在最重要的机耕面积增长率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数据分别为 80.9%，24.9%和 7.7%。在“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后，邓公为首的“人民公仆”们迅速 推行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在农业领域实现了-3.6%的跨越式增长，这真是农业现 代化发展“奇迹”！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尽管中国已拥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 但在农业领域，中国仍然是以落后的（但不是前现代的）小生产为主。从宏观历史角度看， 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以后，实际上人类就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在力量。而 这个时间点，绝不会晚于 1871 年。不具有现实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巴黎公社存 在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宣告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然成熟。我想这已经很好 地论证了“相同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结合，其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 财富的能力也不同。”

而如果我们把劳动对象当做生产力要素，也就是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偷换为“劳动生 产力”，则会出现各种谬误。

首先是逻辑上的谬误。当我们把劳动对象考虑进生产力要素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劳动对象参 与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活动；如此说来，生产力就必然只能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而 不管我们拥有多么高素质的劳动者、多么先进的劳动资料和多么优越的劳动对象，如果没有 社会分工协作的话，一切都相当于

空谈，一切都无法从潜在的力量转变为现实的力量，否则 我们就相当于变相地接受了终产者的概念，或者说是变相地否认了人类的唯一劳动主体地位。

（这点现阶段了解即可）而假如我们将社会分工也考虑进生产力当中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 把生产方式也视为了生产力组成要素。但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这句 话就是错误的，进而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列毛主义都将成为谬论。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 母集 B 能够反过来决定其子集 A。（对于两个集合 A 与 B ，如果集合 A 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 集合 B 的元素，我们就说集合 A 包含于集合 B，即集合 A 是集合 B 的子集） 接下来是这种偷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官僚垄断资本的好儿子，稻上飞人“邓公”曾多次提 出如下“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直到今天都还被特色法西斯奉为圭臬，并且误导了上亿民众数十年。事实上，在我们刚才已经明确看到了革命马克思 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即那个能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因的组成因素，实际上只有“劳动 者”和“劳动资料”两点；在这其中，不难理解，又只有“劳动者”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 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生产力。因为在生产力两大组成要素中 ， “劳动资料”从创造（哪怕是从地上捡起的木棍也必然要有人参与才能成为劳动资料）、使 用到改进的全过程都必须要有“劳动者”的参与才能实现。而假如我们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 力概念偷换为“劳动生产力”的话，就必然会矮化甚至是抹杀人的主体性作用。认同“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谬论就是上述“重物轻人综合症”的临床表现，同样也是商品拜 物教在生产力理论上的体现。这种症候非常符合资本的需要，因为对于资本而言，除了自身 永恒不断地积累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以外，其他一切，包括人本身都是不重要的。这也就是 为何在不考虑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在资本的拟人化傀儡，即资本家看来，一台小小的机器受 损要比工人死亡更为要紧。毕竟对资本而言，劳动者的自觉主体性地位毫无意义，他们不过 是廉价的劳动力商品。

作为哲学家的丁小平教授虽然从理论上也看出了邓修这种论断的错误性乃至反动性，但他根 本不敢再走一小步去捅破那层窗户纸（他还是要吃特色饭的），他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说 什么“总设计师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应该是劳动生产力的简称（假如果真如 此，那么为什么从来没见邓修提过“劳动生产力”？），不是决定生产关系并被生产关系反 作用的那个生产力。”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哲学 于我们是彻底揭露敌人的武器，我们丝毫不必在理论上做任何妥协搞任何调和。

而对于小资产阶级庸人而言，被极端庸俗化的生产力概念（在他们看来生产力直接等于科 技）又被他们抽象化了。在他们看来，抽象化的所谓“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是一切实际问题 的挡箭牌。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工人们普遍高达 12 小时的劳动时间，还是逆天的社会贫富 差距，都可以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答案来全部应对。这种 看似非常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其实和宿命论是一个逻辑，即都认为个人甚至人类社会都必须要 顺从某种天命，而丝毫不能改变这种既有秩序（甚至无法利用它）；都认为有的人（有时还 包括他们自己）就活该当牛做马，而大人物就理应灯红酒绿。有时为了自圆其说，他们甚至 能说出极为荒谬的话。在谈到我国工人阶级极其不合理的过长劳动时间时，一些资产阶级自 由派和小粉红经常拿出诸如“因为中国是个后发国家，所以生产力（科技）落后西方国家一 两百年是很正常的，工人吃点苦也是没办法的。”之类的小资产阶级论调来掩盖导致这种矛 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观点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力谬论是类似的，他们都没有 考虑鲜活的人，都把历史理解为一条僵死的射线，而看不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因此 当任何人对既有秩序不满甚至反抗时，他们首先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来自于外界的不正常存 在（典型就是被妖魔化的文革），而丝毫不敢想象这种破坏性存在实际上就源自于被他们奉 为神仙的既有秩序本身。（小资产阶级想都不敢想在既有秩序被摧毁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 地该怎么办）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何假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办事不力的话（考虑到小资产阶 级群众在中国并不比无产阶级少太多，影响力相当之大，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要格外重视在各种工作中争取、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使他们在最终决战的时候至少对我们 保持友好中立的态度，而不至于被希特勒带着走，否则中国革命就完了），小资产阶级非常 容易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被法西斯主义所俘获；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发生问题的时候首 先要解决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提出问题的人！

在我们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及其知识分子看来，人必须统治物，而不是相反。我们任何时候都 不应该忘记人类在一切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革命阶级这一最具历史主动性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 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 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 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第五部分：斗争技巧、革命文艺及其他

喜剧：从古希腊滑稽戏到语言类表演——辩证法与矛盾



以前的小品

艺术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那些制造或体验这些事件的人的生活，这是就所有艺术而言的，从最宏伟的艺术到最隐秘的艺术如果大自然爱情友谊与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联，那么事情是早就不存在了。任何艺术总是起源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喜剧，没有空洞的或者是凭空产生的笑料，能引起观众发笑一定是使观众产生了某种程度上幻想的与自身体会的勾连，比如说侯宝林的相声«婚姻与迷信»，是对旧社会婚姻制度的讽刺，对带有深刻过去烙印的人们引起的共鸣，比如说姜昆，牛群，梁左都是对改开后现实的调侃。从赵本山宋丹丹到卓别林，憨豆先生，再到周星驰，优秀的喜剧背后总是反映着社会中现实的矛盾，正是形式与效果上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出了当下的笑料。

在古典时期古希腊喜剧和中国喜剧都是通过乐舞戏谑和诙谐的手法，表现其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冲突以此引观众发笑。想一想苏联笑话，正是由于形式和内容上的矛盾，现实内容与形式相对立，存在着差别的内在发生，旁观者体会到了这种差异，因此感受到某种否定性的讽刺，我们便会感到好笑。这种矛盾的来源是哪里呢，正是现实。现实是产生这种矛盾的土壤，而喜剧就是矛盾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喜剧的背后正是社会现实中旧内容向新内容转还经过的矛盾，事物的自身否定与进展，形式和效果上的矛盾。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没有社会发展中这种矛盾带来的推动性变化，我们并不会感受到好笑，不会感受到讽刺与幽默。

当代观众为什么怀念九十年代的小品，因为这些作品把社会发展中质和形式的矛盾原原本本展现了出来，旁观者通过否定性的讽刺和自我代入能够体会到这种矛盾，不协调，进而感受到诙谐和娱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生活。”“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他认为，丑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滑稽可笑的，只有当丑力求炫耀为美的时候才够滑稽。为什么如此，因为这正是事物本身的矛盾性，一切现象中的矛盾和力的倾向的体现。

喜剧的背后是现实矛盾。喜剧只存在于人的行动和社会事件中，而不存在于纯粹的事自然事物中。在自然界中有很多事物因不符合种的属性而显示出丑的特征如树木有没有丑，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但他们本身都不会有滑稽，因为自然界的一切都顺应自然，生成内容和形式是一致的，也不存在动机与效果的矛盾问题。滑稽客体本身没有什么滑稽可笑之处，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情感赋予他滑稽的内容，以人的尺度去衡量它们时，才会拥有可笑性。

喜剧的背后正是社会发展中矛盾面的不协调，是各种现实中所运动的矛盾。比如说赵本山所扮演的农民工与城市化的矛盾，比如说阿里斯托芬通过完美的乌托邦幻想来表现对城市发展的不平衡的讽刺。只要社会中存在于现实矛盾，就有喜剧生长的土壤，就算不是有喜剧也会有笑话的存在，这是人的情感对现实发展最真实的反映，是无法为政治制度所隐藏的。

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非常尴尬，不适应，不好笑。正是因为他没有真实的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通过艺术手法所展现出来，而是将它掩盖住，没有深刻引起观众的共鸣。



公然骂人“单身是狗”的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

陈佩斯说：“喜剧是纯粹的，是有尊严的。”然而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抽象的艺术形式。喜剧一定是从富有现实矛盾的社会中诞生出来的。陈佩斯还说：“一个正常的人用装扮，装扮的角色的痛苦赢得了对方的笑，那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人类学会了这种智慧后才有了笑声是先有的笑声，后有的喜剧创造笑声。”但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扮丑行为。当丑角没有了扮丑的社会需要之后，喜剧也不在被需要了。

只有深刻的历史转折以及社会阶级的再划分，才能激扬起个性，确定一个抒情的处理个性化诗歌各种基本主题的新角度，并借此把艺术从无休止的老调重弹中拯救出来…



同志们新年快乐

脱身指南

我国今天的左翼大部分还处于幼年期，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稍加关注，都能看到大量这样的例子：墙内的左翼组织不能很好地执行或根本不执行安全措施，结果一旦行动大些引起注意或者到了两会等等“冲业绩”的时候被警察团灭；有左翼思想的个人不注意安全措施，结果一旦有什么实际行动被警察注意到了简单一查便能把你思想转变以来的一切历程查个遍，其结果只能是既给自己带来危险又连累别人。所以安全，对个人来说是保存自己的重要手段，对组织来说是保证继承性的重要方面。安全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话题，不是一两篇简短的指南和具体方法能够穷尽的，笔者在本文中的目标只能是简单讨论一些应用

于我国现实情况的最基本的安全认识，以帮助我国有志实践的左翼从充满监控的环境里安全“脱身”，获得基本的安全环境的同时建立最基础的安全意识，更进一步的认识无非也只是在这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常识的结果。而到了各种具体技术的层面，就是脱身之后必须花大力气广泛学习的内容了。

显然，在我国这么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即马列毛主义，它的知识不能自发就出现在一个人脑子里。一位同志除非先前已经具有非常良好甚至偏执的安全隐私素养，然后才接触到马列毛主义（这种类型的同志也不会需要本文），或者他是被某个人线下宣传的，否则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要在墙内留下或多或少的敏感痕迹。这些敏感痕迹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他过去的安全素养，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什么时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当今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和他全然敌对的最凶恶的敌人，因而必须采取最严格的安全手段对付他们。墙内的宣传一定要优先设法讲清楚这种全然的敌对，否则势必要留下无法预料的隐患。

按照国外信息安全教程里面那套“正统”的方法分析，我们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情况无疑是极其困难的。既完全缺乏合法的从墙内环境转入匿名的渠道（匿名一次性手机、礼品卡等等），又面对着恶劣的网络环境、严苛的网络审查和特色官方对隐私的公然践踏，而我们的“威胁模型”更是要直接面对国家情报机关的级别。然而，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分析，这里又有一些我国革命者特殊的性质：

1.我们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完全的匿名，首先这在国内环境是做不到的，除非你有肉身出国并购买所需设备的机会。而且大部分同志到了一定的阶段，只要不是“遗世独立”的、原地观望的、沉迷辩经的，就必然有加入组织并未来参与线下实践的客观需要，不能一直保持物理身份的隐藏。我们要求的是混入群众，从而专政机关不能通过简单的自动化的大数据分析去找出我们，而非追求什么完全隐形。这就需要在线上线下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一切**实名** 的线上资产应当归于真实身份所有，其他部分应该完全隐藏。不同身份所用的名字、密码，包括语言习惯应该不同，有条件的应该进行设备的隔离，还应该注意在线时间的安排，通过错开不同身份的活动来避免关联攻击揭露身份。

2.我们的威胁模型非常严重，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面对的直接威胁可能只是某地区的网警部门，离开了各种大规模监控系统他们本身的技术手段并不非常高超。所以在无法实行隔离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混淆和合理化** 的手段隐藏真实目的的。例如，理论上对于敏感设备应当安排独立的安全网络接入，但在ISP审查整个国内网络的情况下，这种独立的安全网络接入实质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并且有时还是是会同支付方式绑定在一起的。那么可能更好的方法是使用日常手机热点给敏感设备提供网络，避开家庭路由器端的后门，用强度足够的代理协议就能确保内容无法被中途拆包。鉴于翻墙行为在我国广大群众中事实上的普遍性，日常手机发送翻墙流量是很难用来指控什么的。不少英文教程建议挑选可靠的公共wifi上网，且不说我国的大规模公共网络监控，如果先前没有去咖啡馆工作的习惯，这种行为事后看是相当可疑的，如果需要这么做，可以考虑把这种活动和正常的亲朋好友聚会等活动放在同一天，处理成先到或者后离，等等。又例如如果你经常在日常手机上刷一些“红客出征”“中美黑客大战”视频，是不是在墙内下载kali
linux或者其他各种linux映像，或者研究刷机方法并计划购买安卓原生手机就变得合理起来了呢？而计算机兴趣者“立志红客”，所以网上购买调试设备或者用VPN翻墙上github也就挺正常的了。这些理由可以根据各位同志的具体情况灵活转变，而至少，由于我国新生左翼很大部分是学生，翻墙“上维基方便”应该就能堵住绝大多数人的嘴。另外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外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应该暂时处于威胁模型之外，但和中国市场、特色政府利益深度绑定者除外(microsoft、apple等等)。

3.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存在足够数量的纯粹注重隐私的群体——所以我们线上痕迹过于干净有时候本身也是一种痕迹——但是却存在着大量的神、兔群体。对于左转早期在线上下留下过多公开痕迹的同志们来说，这些群体都是极好的伪装。这也可以说是身份隔离混入群众的一个方面，你早期那些不谨慎的活动对于一个小粉红/保皇党/神友来说才是正常的，对于你那个去政治化的脸谱肯定不是。过去痕迹的左翼倾向实在太明显的，装西马学院派、极端虚无主义或者魔怔“加速分子”吧。据笔者所知，是曾经有西马身份做得好的同志通过和大学马院教授进行“友好学术交流”而侧面获知体制内意识形态风向等有助于判断当前是否处于敏感时期的重要情报的例子，这也是这种身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吧，同志们可以视自己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

能够提及的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提供一部分启发。这么来看，这确实是一种脱身，其效果就是在同一副外表下无声无息地具有了革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得转变的过程尽可能无迹可寻。下面我们具体讨论一下如何在墙内实现这种“脱身”。一般来说，一个人左转的途径不外乎如下两种：被组织或个人宣传的，或者自己通过网上信息了解的，而这两种又都可以细分为通过墙内（线下渠道或合法线上渠道）或墙外（非法或灰色线上渠道）手段完成左转两种。显然，如果一个人是被组织/个人宣传的，那么他就几乎必然/有相当的可能一开始就具有对安全隐匿重要性的认知，当然最好这一步的宣传本身可以放在线下进行；如果是自发左转的，那么这就和自身领悟能力、宣传材料深度以及相应材料在墙内能存活的时间有关了。这一初始条件也影响着一名同志在墙内无法避免的痕迹的多少，进而影响他被警察注意到的难度以及追查他的有效度，也决定了他的墙内身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理化的政治面貌。确定了初始条件之后，过程大概是这样:

0.初始环境

日常手机一台，登陆了microsoft账户的windows电脑一台，均装有国产监控软件若干。

1.初始翻墙软件的获取

RSF第六期《Tor Browser使用指南》已经介绍过tor browser和Geph（迷雾通）的使用，这里补充一下，Tor目前有四个突破GFW对其封锁的方式，称之为“可插拔传输”，其中WebTunnel尚处于开发之中，比较成熟的是obfs4,meek,和snowflake。obfs4是一个加密协议，它能让你的流量看起来像是乱码，也就没法被网警中途偷看，但是这并不能掩饰你不是在正常上网的事实，因此目前它是无法直接翻墙的。而后两者（meek,snowflake）都是伪装协议，即它们将自己装作是正常流量以骗过大规模过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先使用伪装性的协议，以掩饰我们在获取翻墙软件的事实。一般来说，snowflake在这方面比meek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应当以snowflake模式翻墙。但是snowflake模式也有缺点，首先它的加密性并不强，如果被挑出来盯着分析还是能看出来这是在翻墙的，也有可能被看到内容，另外它比正常翻墙慢很多，这是相当影响一部分功能的使用的，例如视频就看不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可插拔传输”都只是对tor browser的网页浏览有效，不能很容易地作用于整个电脑的所有网络活动。所以snowflake的作用在这里只是供秘密获取革命资料、安全技术资料和迷雾通安装包之用。

至于如何下载tor browser本身,这里不推荐直接在墙内官方镜像上下载，即使内容是https加密的，DNS请求上也能看出你访问的网站。比较隐蔽的方法是在已经登陆了microsoft账户的edge浏览器内部找到插件下载或类似区域，搜索一个可靠的翻墙插件（具体判断标准见RSF第三期《翻墙原理与注意事项》）并安装。这个翻墙插件也只能在edge内部作用，通过它下载Tor安装包后，你就可以删除这个插件和全部本地浏览记录了。

（更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发现，GFW对于snowflake的封锁变得更加严重，tor的墙内官方镜像也已经被封锁，对此笔者的建议是改为先安装Geph，趁着特色还未完全封锁github及时下载。使用snowflake应当严格仅限于关键安装包和资料的获取，且次数尽可能少，尽快过渡到3、4部分）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对于翻墙左翼来说，翻墙的危险并不主要来自访问的网站是否会勘破你的身份（我们基本用不到国内网站，大部分国内网站也都会屏蔽tor，从而要求使用后置代理），而是特色官方的中途侦测和拦截，所以在我们的情况下前置代理的作用甚至超过了tor，这一点和大部分国外教程不同（由于在国外tor是合法的，他们甚至不推荐使用前置代理，而是要求使用匿名支付的自建VPS后置代理），应当注意这一点。

2.移动介质的处理

U盘是秘密工作非常合适的存储介质，易于携带转移，易于摧毁，拔下即能彻底关闭。然而，有某些证据表明国产U盘同样存在监控。如果有条件，应该尽量使用外国生产的U盘，或其他我国政府无法监控(主要是得知硬件码后反查购买记录)的移动介质。如果使用国产设备，应该下载Veracrypt加密软件，设备到手后或者每次需要清空硬盘时对全盘（非快速）格式化后执行一次空盘的全盘加密以彻底清除全盘数据，包括任何可能的隐藏文件。在使用U盘时应尽量确保电脑处于断网状态。我们建议至少应当掌握一对可靠的U盘，相当多的操作都需要两个可靠的存储介质才能进行。

3.较安全环境的获得

如前所述，你的电脑同时存在硬件层面（可能）和软件层面的监控，我们能够对付的是后一种。笔者在这里强烈建议每一位革命者对日常使用电脑和用作革命用途的电脑实行彻底的设备隔离，并且使用自由的GNU/Linux系统作为革命设备的操作系统。如果实在没有两台设备的条件，那么应该卸载本地一切国内监控应用（尤其是QQ微信等），尽可能关闭一切本地数据收集渠道（包括错误报告、推送、智能推荐，登出microsoft账户，等等，microsoft早已被证实会给特色提供要求的windows用户数据），禁用摄像头麦克风蓝牙，有能力的可以改为脱机重装英文windows系统，并从一开始（有可能的话从BIOS）就禁用这些选项。然而只要还没有设备隔离，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实际的革命工作，最多只能限于通过tor获取相关安装包和学习资料并离线阅读，且本地资料应该压缩加密，或者可以将tor程序和相关资料压缩包整体放入可靠U盘随插随用。鉴于大多数学生同志没有使用两台电脑的条件和合理理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直接将Linux操作系统安装在可靠的U盘内部，让U盘作为系统硬盘制成便携系统，这样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利用U盘本身适合秘密工作的优势并保证一定程度上的设备隔离。任何持久存储介质都应当加密并经常清理痕迹。
手机相比电脑有其固有的缺陷，不仅限制重重，容易被特色当局控制，而且不透明（苹果），漏洞百出（安卓），墙内用手机安全进行革命活动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的手机在这里尽量只是作为上面讨论过的网络接入点使用，并且同样要尽量做到设备隔离，不然被国内监控app扫描到频繁的本地翻墙流量有一定可能引起注意。革命设备应该购买二手的便于刷机的国外安卓手机(淘便宜手机的理由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刷入自由开源的手机系统，不要安装任何国内软件，并封锁摄像头，禁用麦克风、蓝牙、GPS等。进行敏感活动时尽量不携带日常手机，进行日常活动则应该视情况是否随身携带革命设备，在革命设备上谨慎使用SIM卡。

4.转移到安全环境

从这一步开始，我们就开始真正操作需要被严密隔离的设备了。这里的原则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电子隔离、物理远离、避免交互之外，还有一条非必要不开网。另外在物理远离这个方面，尤其要提到的是尽量不要让敏感设备脱离自己视线，若要短时间离开应该确保随时锁屏，五分钟以上应该**彻底**休眠（没有修饰词的hibernate）或者关机。日常生活中应该习惯观察场所摄像头分布，避免操作和密码泄露。下面以制作Linux便携系统为例:

(0)在日常windows上通过tor browser 搜索下文相关电脑知识。

(1)事先在日常windows上下载好：

- tor linux安装包(snowflake)
- adb+fastboot全部二进制包(墙内正常下载)
- 手机刷机包(墙内正常下载)
- Veracrypt(墙内正常下载)
- rufus(墙内正常下载)
- Linux某发行版Live ISO文件（墙内正常下载）
- rust语言离线安装包（墙内正常下载）
-

(2)将二手手机、日常windows断网，用rufus将安全U盘A烧录成Live安装介质，将手机刷机包、tor linux版安装包、rust语言本体离线包(墙内正常下载)和adb+fastboot及其依赖二进制包移动到安全U盘B。

(3)重启电脑进入BIOS，将U盘的启动顺序提到本机硬盘前，插入A，保存设置重启进入安装介质，选择Live模式安装，开机进入Live Linux
桌面后不开启网络，**不启动**安装程序，插入B。从B在A中安装adb
、fastboot，复制B中刷机包到A并拔出B，将二手手机与电脑相连，执行彻底的刷机过程。将新刷得的革命设备拔下，重启A，再次进入Live Linux桌面，此时会发现之前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

(4)再次插入B，在Live中离线安装rust，开启网络并连接革命设备的热点，使用tor snowflake下载github相关仓库托管的geph源代码（最好是纯命令行版本的），在本地使用rust包管理器cargo手动编译源代码，得到包含geph可执行文件的debug包。将该debug文件夹移入B。关机并拔出A、B，开机进入日常windows，从B中移出debug文件夹(建议加密压缩)。

(5)再次启动进入A，插入B，并根据图形化Live 安装程序的指引，在U盘B内安装持久化的Linux操作系统。

(6)再次关机并拔出A、B，开机进入日常windows ，插入A并对其进行“消毒”(慢格并重新加密)，将tor linux安装包和debug包移动到A中，拔下A并清除日常windows上一切残留相关文件和痕迹。

(7)关机，插入B并重启，进入持久化的Linux操作系统。插入A，从A中安装tor linux版，移出geph可执行文件及配置，开启并连接革命设备的热点，根据geph的github文档使用geph全局VPN模式联网（出口服务器列表在github geph-exit仓库的exit.yaml文件里），并在tor browser内配置geph+tor双重代理，禁用蓝牙、麦克风、摄像头等一切不必要的功能，等等。

至此我们便完成了在最小暴露并且身份隔离的情况下转移到安全环境的大概过程。此后只要插入U盘B开机即能进入革命设备，不插入B开机即进入日常windows。
有同志可能会疑惑，既然我们只是要混入群众，上面这些麻烦的步骤是不是很多都不必要。首先以上的过程确实只是笔者所知的理论最佳的探讨，同志们可以视自己技术情况和实际需要灵活采取不同步骤。例如4中的不少麻烦步骤都是为了确保在没有geph提供的全局VPN时大部分敏感流量均能比较容易地经过tor snowflake，如果你会用redsocks等透明代理将snowflake变成全局SOCKS5代理（但是速度大概会非常慢）或者已经掌握其他代理软件并能代理命令行流量那么自然不用从源编译软件，只要直接apt或者cargo安装就行了。另外笔者想在这里谈谈安全作为技术本身和作为普及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的自由派也很重视安全，甚至他们前些年提安全要比我们多得多，当然这是因为在国内他们的思潮是更难合法发展的，也是官方可以名正言顺予以打击的。我们也知道他们因为路线上的问题，是必然不敢也不能真正地发动起广大群众的，而这种精英主义也体现在他们的安全技术上，喜欢追求高精尖难的安全手段，喜欢西方黑客线上下完全匿名那一套，对新人很不友好，就我所知他们唯一提到发动起群众的大概是号召宣传翻墙技术让群众广泛翻墙，“自行了解真相”的同时使得网警无法追查真正的异见分子。我们可以拿著名自由派编程随想举例，他“搞实践”的方式就是在墙外开设博客冲塔，搞自由派版本的“政治揭露”，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影响少部分会翻墙的人，而由于这种活动脱离群众孤立冲塔的性质他很快成为被官方注意的首要分子，接下来他的大量精力就花在升级自己的防御措施以应对国家级侦查机关的重点打击上，结局我们也都知道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去采取的，现在任何起码的马列毛主义者都知道要结成组织、做宣传、做融工，做这些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可不会专门树一个靶子告诉网警来打。所以除非是有一定规模的且具有公开门户等线上暴露面的革命组织的负责同志，大部分同志和革命群众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暂时也可以，而且就以如今普通翻墙行为几乎不管来观，专政机关面对群众性的违法根本就是纸老虎。然而这也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安全技术的钻研了，更复杂的技术对于现在的要害部分同志以及未来专政强化

下的群众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同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采用安全手段的多少好坏直接关系到他安全活动的时长以及**被侦查后能否伪装身份保守秘密以待未来再次行动**。所以对于安全宣传我们要尽量简明易懂，便于群众学习，鼓励进一步了解；对于组织内部的培训应当讲清原理，力求理解，当作一项重要学习任务布置，墙内线上组织更应该严格要求组织成员并尽快转到墙外；组织内进行相关或高风险工作的同志则要将相当的精力投入进去，更好地完成风险工作或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

必然结成革命组织，必然线下参与运动，必然要求发动群众，这是我们安全问题上根本不同于自由派或个人隐私匿名追求者的几个方面，这些特点也正要求我们采取隔离混淆、合理理由、混入群众等方法，践行安全技术的群众路线，迷惑敌人，保存自己，保卫革命成果。

关于加密

加密是一门古老的信息技术，其全部目的就在于防止经加密的信息被意外访问或者泄漏，保 证重要信息的秘密性。显然，当前阶段的革命实践处处都需要保守严格的秘密性。保守这种 秘密的最好介质本来是思维，或者说记忆，但是这种方式只对少量的且传播范围局限于人活 动范围的极重要信息适用。而一旦涉及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信息，加密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传 输过程中的加密不彻底可能导致中间人攻击或元数据泄漏，而存储的加密不彻底则会让你在 遭到入侵或审讯的情况下失去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一句话，加密技术是革命的信息安全的重 要部分，正确掌握加密技术能够极大地增强革命者的隐蔽性、安全性和抗打击能力。

不用说，现在的加密和过去革命时期的那些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电报报文的具体加密变换 通常都由密码本所规定，而纸质文件的加密还常常采用语言学的方法，有时危险的环境下还 要借助这种方式来“打哑谜”。而如今，我们需要加密的文件的存储介质是确定的，绝大多 数情况下就是数字介质，加密的方法也不再是自己设计，而是以公开的可靠的加密算法作为 基础，用可记忆的密码生成实际的加密变换，具体操作也由各种软件代为执行。所以，加密 者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就减少到以下这些：对什么数据加密，如何选取并使用合适的软件进 行加密，如何防范或应对可能的加密失效，等等。下面就具体说明这些方面。

一. 加密的对象

粗看起来，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有同志会认为，只要想，大可把所有数据，不管 是日常设备还是工作设备上的，不管和革命沾不沾边，都保护起来。甚至还有些同志认为只 要系统设置了登陆密码，里面的东西就安全了，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的 登陆密码，保护的只是登陆这个步骤而已，你所要保密的数据仍然是以明文形态存在于存储 介质中，只要绕过了这个步骤，这些数据都是完全“裸奔”的。譬如，特色理论上可以在你 使用电脑的过程中给你投一个木马（虽然定向投放成本很高一般不会这么干），或者类似地 ，让各位日常设备上的“特色专政小助手”们给你定期扫扫盘；还可以用安卓和 windows 系 统那数不清的系统级漏洞实现绕过登陆，或者直接给微软中国施加行政命令；甚至最简单地 ，把电脑硬盘一拆，安装到另一台电脑上，从另一台电脑原本的系统来看，这时的电脑硬盘和平时用的 U 盘没什么区别，文件可以随意操作。可见，加密的操作必须要精确到每一个字节 才行，任何中间间隔都只能造成风险。

然而，只是做到精确到比特的直接加密是不够的，数据加了密，最终还是要解密出来操作或 阅读，这时候的数据必然存在有明文形态，只要在输入密码的过程中记录键盘，或者在解密 之后文件处于打开状态的这段时间中读取一下内存，就能轻松地破坏加密，或者至少读取到 加密内容的明文。因此在不安全的环境，或是日常设备中应用加密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 显得很奇怪和可疑。另外，在工作设备上，加密的对象也很有讲究，毕竟是对每一个比特进 行加密，如果加密内容很多，甚至包括了无害的不需要加密存储的内容，那么每一次打开都 要全部解密一遍，既缓慢又没有必要，还会影响加密文件的迁移性；另一方面，我们的设备 上存在的敏感文件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还包括各种日志文件、临时文件、配置文件， 等等。而这些文件不仅难以全部找出，甚至有些还不能简单删除或者移走，目前并没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能够在打开保存这些文件的加密介质后自动将这些文件临时“释放”到指定 位置。所以这就引出了一种更强的加密方式，全盘加密，即将整个操作系统都加密。而这就 不是简单的像加密文件那样的加密了，不然这里的问题只会比上面的“释放”问题麻烦得多 ——怎么做到精确地在登陆系统之后只保留运行解密程序所需的“最低限度”文件和服务， 而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涉及敏感信息的任何组件呢（android 的加密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实 际效果并不好）？而用另一个系统直接加密系统盘也不管用，这只会把被加密系统的引导变 成密文，从而废掉整个系统。所以这里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一个修改的引导来在开机前提示 输入密码，并在密码正确后解密全盘数据。这就特别地提出需要，要求有专门的加密软件或 功能来做这件事，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部分。

二. 加密软件工具概述

上一节已提到了这一点，即全盘加密这样的操作需要专门的加密软件才能进行，其实对于一 般的加密这一点也是适用的，我们接下来分别讨论几种加密方法。

1. 各种压缩文件加密：

很方便，迁移性较好，但是加密算法常常比较弱或者有缺陷。在各路操作系统 (windows linux android) 之间兼容性最好的是 zip 和 7z，基本上不需要额外安装压缩软件即可打开， 但是加密算法都比较弱，而且不能加密文件名，对于加密敏感文档或许还好，可以手动改成 较不敏感的文件名，如果加密的是什么敏感的便携程序或配置文件，无法随意改名，那么隐 蔽性会大打折扣。还有一个选择是 WinRAR，这个更是一言难尽，中国特供免费版本开屏的 弹窗传奇广告让人以为是什么 360 旗下全家桶的一员，更是宣告了自身毫无疑问的闭源本质。 号称支持 AES256，然而在笔者还胆敢使用它的小白时代里从来没见到过哪里切换加密算法。 它确实能加密文件名，打开文件也确实能在 WinRAR 文件管理器内部即点即开不必手动解压，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WinRAR 的加密文件密码存储是明文的，必须要再设置一个设备主密 码才能防止随意查看独立密码？而且笔者还没有测试这样的加密文件在其他操作系统上的情 况，因为 android 不支持它，需要 RAR for android，至于 linux，虽然有 unrar 包可供安装， 但是无法解压 WinRAR 加密的 rar 文件。总而言之，压缩是压缩，加密是加密，用压缩软件 来进行文件加密一般安全性和效果都不好。

2. 系统工具：

众所周知，android 系统的加密功能表现并不好，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 windows 的 bitlocker 和 linux 的 dm-crypt。有同志可能听过 bitlocker，自从 windows 默认在第一次 启用操作系统（OOBE）时即自动启用 bitlocker 后，就能看到不少人电脑重装或其他部件 损坏换新之后读取不了原来硬盘的例子，因为这个功能是防止在检测到任何硬件或环境改变 后不经授权读取硬盘内容的行为，换句话说，主要是用来防盗的。我们这里不推荐使用它， 先不说闭源本身的安全性问题，我们早就讨论过为什么不宜选择 windows 进行活动，这里 的理由也一样。这种加密方式无法防住系统内部安装的监视软件，无法防住登陆绕过或系统 本身的预留后门，只能防止拆硬盘从别的系统启动来窥探数据。另一个弊端是，要启用 bit- locker 一般要以 microsoft 账户登陆才能取得恢复密钥，然而不使用 microsoft 账户正是我 们使用 windows 活动的底线！有能力的同志也许可以尝试找到一个保留了相关功能的 win- dows 精简版以便在 wintogo 上运行非 TPM 的 bitlocker，但是这显然超出了科普教程的范 畴，而且如此费力使用这样一款先天不足的加密工具也是不划算的。 另外一种系统工具是 linux 内核自带的 dm-crypt，这就比 bitlocker 好多了，功能更加丰富， 安全性更强（这里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由 linux 本身的安全性决定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dm-crypt 是目前唯一支持对 linux 进行全盘加密的工具，能够在装机时一键设置，这是其 他工具无法比拟的。全盘加密的重要性前面已经提到，可以确保一切敏感数据均不会“逃 出”加密之外，另外这也能防止绝大部分已知未知的固态硬盘存储特有的问题，比如文件的 一部分“逃出”加密分区的问题。另外 dm-crypt 还能用来挂载其他某些其他加密格式的卷， 后面将会提到这一点。

3. 专业加密软件：

有不少软件都号称能做到加密功能，但是真正强度足够且开源的合格的加密软件没有多少。 其中桌面端最著名的是跨平台自由开源的 Veracrypt，作为 Truecrypt 的后继者，功能非常 丰富，加密强度很高。Veracrypt 主要支持三种加密对象，创建加密文件容器（虚拟磁盘）、 创建非系统加密分区、（仅限 windows）创建加密系统分区或全盘加密。Veracrypt 的图形 化界面操作简单且有详细的帮助文档，甚至能在后两种加密对象上做到即时加解密。如果使 用的是 wintogo 且有额外的可靠 usb,那么强烈建议使用 veracrypt 全盘加密；而对于 linux 来说，我们建议使用加密文件容器的功能，以获得更好的全平台迁移性，而如果你有需要保 护的敏感移动存储介质，那么可以选择创建非系统加密分区对 U 盘进行加密。

上文提到过，android 系统的加密功能表现并不好，鉴于 android 系统本身糟糕的安全性， 这一点本来影响不大。然而事实上，我们的革命工作中恰恰比起桌面端更加需要灵活隐蔽便 宜的手机设备（不然融工的时候在桌子都没有的厂区宿舍里面躺在床上在一片短视频声里敲 键盘肯定会很显眼），这时 android 手机的安全弊端就会很致命了。因此，同志们使用手机 作为工作设备几乎都要刷入开源的第三方 ROM 来规避系统级漏洞，这就要求解开设备 oem 和 bootloader，而这两个操作本身其实还是降低设备安全性的。虽说理论上可以对 ROM 进 行适当签名后重新锁回 bootloader，但是此操作具体方法不明且变砖概率极高，这种情况 下加密成为了 android 上敏感数据的的最后保险。这里我们推荐使用 paranoiaworks 的加 密软件 Secret Space Encryptor(简称 SSE，同样也是跨平台应用，但是在其他设备上表现 显然比不上 Veracrypt)，集成了密码生成和管理、普通文本加密、文件和文件夹加密、剪切 板清除的功能，使用同样非常简单。

（关于 android 本身的加密问题，android 只在 5—9 支持全盘加密，10—12 支持升级自旧 版本的全盘加密，13 以上只支持文件加密，而所有这些加密都只是内核级别的，不同厂商 不同实现，且要求完整的 oem 等等刷机会破坏的组件）

4. 各种加密网盘：

网盘备份也是一种常用的数据保存方法，有些网盘还号称提供了加密线上存储的功能，即将 数据以加密的方式存储在网盘中。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使用这种方法的理由主要在于数据 完全不存在于本地，无从追查，然而同时这种方法也将伴随着墙外线上服务的一切缺点：依 赖于第三方、受制于网络，等等。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如果你的工作环境由于某些原因突然 损坏（被捕、丢失、意外故障），则想要重新搭建安全环境就不得不再次从墙内设法获取翻 墙工具，徒增风险。如果一定要使用网盘，唯一推荐的是

proton 邮箱配套的 proton 网盘， 使用多个免费账户勉强能凑出一点存储空间。如果只是要求较大的存储空间，可以尝试使用 mega 网盘。虽然 mega 单个账户免费存储空间达到 20GB，且号称端到端加密且对服务器 采取零信任原则，但是无论是被独立审计者曝出底层加密逻辑漏洞允许至少 5 种加密破坏攻击，还是在过去不久的西方安全机关围剿 LockBit 黑客勒索组织时配合外国政府要求停用疑 似属于勒索组织成员的存储大量密钥文件的账户（还造成了不少误伤），都证明了其安全性 十分糟糕，不仅预留了运营端的后面，甚至到了让笔者怀疑其是否能够抵挡特色国家 APT 组织渗透的地步，因此只适合存储大量非敏感文件，例如历史文献之类。

三. 进阶加密操作和注意事项

从前面的内容中已经可以看出，加密本身并不能完全保证加密者的安全，甚至不能完全保证 加密数据的安全，要考虑的因素其实非常多。我们下面简单地谈几点：

1. 关于加密的局限： 如果攻击者远程控制或监控了你的设备，或者能够在你还正常使用设备的期间物理接触你的 设备（查看并备份这时的数据或安装窃密软硬件），除非你从不在设备上设置或查看加密的 文件，否则任何加密都不会管用。加密一般只隐藏加密内容本身，通常不能隐藏加密内容的 存在，或阻止加密内容被整个删除。例如如果特色查获了你的工作设备，他们通常能发现里面有一些加密的文件，如果这时他们对你的思想状况再有一些了解，那么光是存在加密这一 点就能成为动用审讯手段的理由。或者，如果审讯无果，他们至少也能（通常特色不会这么 自毁证据，笔者只是为了例证前面的说法）将加密数据所在的区域全部抹零，加密本身不能 阻止这一操作的实施，而这还是假定你能扛住非法审讯折磨的情况下。

2. 进阶加密方案： 为了达到更高的安全性，并部分应对上述最坏的情况，可以采取一些进阶措施，本文这里只 会简短地列举一些可能性，不作详细说明。若你同时满足：(1)是高危人物 (2)对这些措施原 理十分了解并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始终遵守相应所需的极其繁琐严格的步骤 ，且在遭遇最坏 情况时使用正确的策略(3)对这些措施进行合理组合，则有可能可以抵挡最严格和最不计成 本的刑侦技术手段。若不满足以上任意条件，那么请自行评估使用风险，错误使用可能造成 反效果。

这些措施有，强加密策略下的：

(1) linux LUKS 全盘加密

(2) 强密码和 Veracrypt PIM

(3) 密钥文件(keyfile)认证或密钥密码双因素认证(2FA)

(4) 串联(cascade)加密算法

(5) “合理否认”(Plausible Deniability)策略下的：

(6) dm-crypt 操作 Veracrypt 加密盘

(7) Veracrypt 虚拟卷、加密分区和全盘加密的对于固态硬盘的区别

(8) 隐藏分区和隐藏操作系统

(9) Tails+Whonix

以及包括但不限于一切以上涉及的任何过程相关的背景知识、正确操作，等等。推荐通过各 种国外安全教程、编程随想博客、Veracrypt 用户手册等进行了解。